炎黄春秋

第 1 期
2014年

解放思想再出发

安徽“严打”的回顾与思考

公民做什么：读三中全会《决定》

我起草天津小站四清报告

目击“天鹅绒革命”

炎黄春秋杂志社出版

目　录

新年献词

1 解放思想再出发 …………………………… 本刊编辑部

沉思录

2 公民做什么：读三中全会《决定》 ………… 吴　思
7 安徽“严打”的回顾与思考 ……………… 尹曙生
13 “四个伟大”的由来 ………………………… 胡鹏池

亲历记

18 我起草天津小站四清报告 ………………… 王　辉
24 郑思群之死和重庆八一五运动 …………… 周孜仁
30 临桂县的“群众专政” …………………… 屈锡信

往事录

36 李震自杀前后 ……………………………… 晏乐斌
40 平型关战役与平型关出击战斗 …………… 王人广
47 文革道县周边大屠杀 ……………………… 谭合成
52 康生相信特异功能 ………………………… 陈楚三

一家言

53 人本思想和党文化的分歧 ………………… 张显扬
61 “毛主义”对现实政治的影响 …………… 黄卧云

怀人篇

64 习仲勋长葛调研 ………… 张继增 等 口述 王国钧 等 整理
67 由“何朗明案件”引发的大冤案 ………… 贾志珍

品书斋

72 《200位老人回忆张闻天》读后 ………… 萧　扬
76 民国思潮：中国思想史的又一个高峰 …… 窦海军

古今谈

78 从“三分疲楚”到朱毛“十六字诀” …… 沈建洪

海外事

81 目击“天鹅绒革命” ……………………… 刘天白
89 苏德同盟时期苏联的一些事 ……………… 龙　飞

编读窗

93 来信摘登 ……………………………… 中国法学会　等

顾　问
杜润生　于光远　李　锐
编委会(以姓氏笔画为序)
方　实　王俊义　冯　健　冯其庸　卢跃刚
曲润海　何　方　吴　象　吴明瑜　宋木文
张文彬　张岂之　张希清　张荣华　张惠卿
杜　光　杜导正(召集人)　李一氓　李大同
李冰封　李步云　李宝光　李维民　杨天石
杨奎松　杨继绳(副召集人)　沈志华　苏双碧
陈　敏　邵燕祥　周瑞金　金冲及　胡德华
赵德润　保育钧　钟沛璋　郭道晖　资中筠
凌　云　展　江　徐小岩　秦　晖　袁　鹰
袁伟时　高　放　高尚全　陶斯亮　钱理群
章诒和　萧蔚彬　韩　钢　董　健　曾彦修
鲁　谆　雷　颐　魏久明

社 委 会　杜导正(主任)　吴　思(副主任)　杨继绳
李　晨　徐庆全　胡竞成　张晓鸥
社　　长　杜导正
法定代表人　常务社长　吴　思
副 社 长　杨继绳　李　晨
社长助理　胡竞成　张晓鸥　杜明明

总 编 辑　吴　思
副总编辑　徐庆全
执行主编　洪振快　黄　钟

总 经 理　李　晨
副总经理兼网络总监　张晓鸥
财务总监　胡竞成
发 行 部　孔　屏(主任)
办 公 室　王海印(主任)

理 事 长　杜导正
副理事长　莊其環　李　琼
秘 书 长　吴　思
副秘书长　杜明明

主管主办单位　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
本刊常年法律顾问
张思之(吴栾赵阎律师事务所010-68083211)
步凌云(北京市华一律师事务所010-85869163)

全国各地邮局均可订阅
国内总发行　北京报刊发行局
国际标准连续出版刊号　ISSN1003-1170
国内统一刊号　CN11-2817/K
国内邮发代号　82-507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南街69号　100045
网　址　http://www.yhcqw.com
编辑部邮箱　yanhcq@sina.com
yanhcq@gmail.com
发行部邮箱　yhcqfxb01@126.com
电　话　发行部　010—68532048
编辑部　010—68534879
68523512
68539058
财务部　010—68525374
办公室　010—68522852(兼传真)
广告经营许可证　京西工商广字0296号
印　刷　唐山市润丰印务有限公司
单本定价　10元　全年定价　120元

本期：终审　吴　思　执行主编　杨继绳　校对　延　平　出版日期　每月4日

解放思想再出发

○ 本刊编辑部

全面深化改革，必须进一步解放思想、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这“三个进一步解放”，是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一个亮点。“三个进一步解放”的前提，毫无疑问，是“进一步解放思想”。

改革开放三十五年来的历史证明，我们在改革开放道路上的每一次进步，都得益于思想解放实际进程的不断拓展。

1978年的真理标准大讨论引发的一轮思想大解放潮流，对突破传统理论束缚，变革计划经济体制提供了有利的前提，为启动改革开放开辟了道路。

在改革进程中，姓“资”姓“社”的争论不断，邓小平提出，“不解放思想不行，甚至于包括什么叫社会主义这个问题也要解放思想。经济长期处于停滞状态总不能叫社会主义。人民生活长期停止在很低的水平上总不能叫社会主义。”1992年初，邓小平提出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提出“三个有利于”标准，推进思想解放。这顺应了中国改革开放进一步发展的历史趋势，顺应了人民要求发展生产力、改善生活的强烈愿望。这些著名的论断，强有力地推动了中国的改革开放。

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决定》对深化改革进行了全面的部署。习近平总书记在对这个《决定》的说明中指出：要在全面深化改革上取得新突破，“就必须进一步解放思想”。他强调说：“冲破思想观念的障碍、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解放思想是首要的。在深化改革问题上，一些思想观念障碍往往不是来自体制外而是来自体制内。思想不解放，我们就很难看清各种利益固化的症结所在，很难找准突破的方向和着力点，很难拿出创造性的改革举措。”

解放什么思想？如何进一步解放思想？怎样聚合人民的思想，最大限度地形成符合社会共识的改革方案和转型路径？等等这些问题，需要以新的理论勇气和政治智慧去面对。

第一，要进一步解放思想，首先要尊重公民的话语权。限制了话语权，也就限制了思想；放开了话语权，也就解放了对思想的限制。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说，“好的意见不那么敢讲，对坏人坏事不那么敢反对，这种状况不改变，怎么能叫大家解放思想，开动脑筋？”足见解放思想与解放“话语权”的关系。只有解放“话语权”后，才能有观点的碰撞，才能对陈旧的思维模式产生强有力的冲击，新思想方能普及，更为重要的是，才能知道什么是民意所向。没有多种意见的表达，就没有借鉴，谈何解放思想？不让讨论，人们没有“话语权”，必然导致言不由衷、言不符实的语言腐败，导致人们“口欲言而嗫嚅，足欲行而趑趄”，怎能期望“解放思想永无止境”？创造一个宽容的环境，倾听各个阶层的真实诉求，鼓励人民群众表达意见，才是思想解放的重要前提。

第二，要大胆突破人为的理论禁区。理论的突破不是任何个人或组织的特权，而是包括政治家、各级官员在内的全国人民，谁都可以发声、可以探索。思想无禁区，解放需力度。在理论发展上不能有“维稳”思维。改革意味着不能一味墨守成规，只要改革不停滞，就需要讲新话，打破重大理论问题上的一言堂，讲老祖宗没有讲过的新话，做老祖宗没有做过的新事。

第三，解放思想要破除权力意志的唯我独尊，同实事求是相结合。1949年以来，大讲解放思想有两次。一次是1958年搞“大跃进”时，口号是：“解放思想，破除迷信。”那一次，是把强制人们压抑实事求是的意见，顺从权力意志唯我独尊下的臆想，当成了“解放思想”，结果五风肆虐，损失惨重。1978年，邓小平提出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口号，从一开始就把解放思想同实事求是相统一，同尊重公民基本权利相统一，从而使解放思想扎扎实实地推进，取得了很好的成效。

解放思想要与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的观念和精神联系在一起。解放思想是使思想和实际相符合、使主观和客观相适应，是为了解决实际问题。因此，解放思想须立足于尊重公民的话语权，实事求是，以“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的科学态度，在破解难题中解放思想。

十八届三中全会描绘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新蓝图、新愿景、新目标，但每一项改革都涉及各种利益，地方的，部门的，集团的，个人的，如何执行，能否落实，能走到哪一步，都为人们所关心。但无论如何，只有解开并打碎违背历史发展要求的精神枷锁，改革才能继续进行。

在新的起点上，解放思想再出发！■

公民做什么:读三中全会《决定》

○ 吴 思

一、民力伸展与历史主动性

去年11月,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面世,雾散云开。人们看到了新鲜的语言,解放的思想,开放的政策,可观的2020年愿景,还可以看到历史的主动精神。

顺着历史的脉络看去,中国民间的经济力量和社会活力,自十一届三中全会初步得到解放,一路勤勉戒惧,自强不息,如今龙跃在渊,正在做腾飞的准备。在这个过程中,虽有曲折反复,中共中央大体顺应了历史潮流,一再发挥出历史的主动性。十八届三中全会进一步确定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新目标: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建设法治中国。

这些新说法意味着什么?所谓市场,就是社会主体之间的契约关系:遵守规则,平等竞争,互利共赢。所谓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就是平等契约关系在政治领域的延伸:这里不再有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只有公共服务的提供方和需求方。治理现代化的提法表明,上层建筑正在有意识地适应经济基础的要求,按照平等契约的原则改造自身。这种目标的确立,再次显示了历史的主动性。

二、公民的作用

《决定》得到了广泛赞誉,但也有不少人怀疑能否真正落实,改革能否成功。

《决定》在开头和结尾处,两次强调了人民是改革的主体,要求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和首创精神。这就是说,改革成功与否,取决于官民双方的努力。多一分耕耘,多一分收获,公民的努力程度,与改革成就的大小成正比。中共中央也作出承诺,建立社会参与机制,鼓励大胆探索,宽容改革失误。

现代治理和传统统治的最大区别,就是社会和公民的参与,即所谓公共治理。《决定》把现代治理作为改革的总目标,治理体系自然要向社会和公民开放,这是一个过程,也是一套现代化程度的衡量指标。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公民做什么?可能建立何种机制?遇到阻力如何应对?

三、公民做什么

从公民角度细读《决定》,六十条内容,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等各个领域,都有即将打开的空间,以及相应的权利义务。

在经济领域,民间资本已经跃跃欲试,盯住空间,计算利益,评估风险。《决定》承诺:废除对非公有制经济各种形式的不合理规定,消除各种隐性壁垒。有人统计过,《决定》中出现了21个“允许”,而且都在经济领域。

回想改革开放之初,1980年,中共中央发布了以“可以、也可以”著称的75号文件——《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表示“可以包产到户,也可以包干到户”。比起“允许”来,“可以”的口气颇为勉强,但口子一开,大包干如洪水开闸,一泻千里,数年之间,中国农村就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这是改革开放历史上官民互动大获成功的典范。

历史经验表明,中国民间,只要给自由,给空间,就会有竞争,有发展,有繁荣。真所谓给点阳光就灿烂。问题在于,既有壁垒的背后存在既得利益,还有保护这种利益的思想观念。如何破除阻力,以更加公正的规则调整权利和利益,这就

进入了上层建筑领域。

那么，在上层建筑领域，在走向现代化的治理体系中，公民可以做什么？

第一，在权力监督层面积极可为。

《决定》承诺：让人民监督权力，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决定》要求：推进决策公开、管理公开、服务公开、结果公开，并且提出推行新提任领导干部有关事项公开制度试点。

领导干部公布财产，民间呼吁已久，如今准备在新提任的干部范围内进行试点了，而且公开事项大于财产领域。面对这些进步，面对公开的信息，如果公民不关心，不了解，不行使监督的权利，民主和舆论监督机制就是空的。

但愿公民踊跃参与监督权力。个人参与，有组织地参与，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有知识出知识。

权力尚未公开信息，公民应该继续促进公开。权力公开了信息，公民不仅应该关心，还应该有人核实，有人评论，发现问题有人举报。对于政府及各个部门的权力行使状况，最好还要有精确量化的评分，长期跟踪打分。《决定》承诺改变考核评价体系，加大资源消耗、环境损害、生态效益、科技创新、安全生产、劳动就业、居民收入等指标的权重，这些分门别类的考核评价有相当强的专业性，由谁来做？大学可做，媒体可做，社会组织也可做。如果政府向社会购买评价服务，自然很好。政府自我评价，公民社会也应该跟踪核实。如果公民关心的范围超出上述门类，不妨主动建立指标，主动搜集信息，主动考核评价。

这种类型的公民组织已经存在，可惜数量不多，影响不大。媒体作为公民社会最重要的组织之一，可以与相关公民或公民组织合作，既关注那些公开的信息，也关注公民的参与行为，共同探索建立舆论监督机制。

第二，在人大和政协领域积极可为。

《决定》承诺完善人大工作机制，通过座谈、听证、评估、公布法律草案等扩大公民有序参与立法途径，通过询问、质询、特定问题调查、备案审查等积极回应社会关切。人大将通过建立健全代表联络机构、网络平台等形式，密切人民代表同人民群众联系。

既然人大准备扩大公民有序参与立法的途径，作为公民，就应该发表自己的意见。既然人大代表准备积极回应社会关切，作为公民，就应该主动表达各种关切，并且与官方共同探索建立表达关切的制度化渠道。

在当代改革史上，民众通常是问题的提出者、改革的首倡者。不过，这些改革呼声能否发挥作用，只能听天由命。现在，公民的提议和意见，有望通过网络平台，通过人大代表联络民众的机构，进入制度化渠道了。这些渠道何时建立，是否畅通，人大代表了解社会关切之后是否积极回应，公民及其组织应该紧紧盯住。

一般公民最关切什么问题？钱。控制财政税收和支出，审核预算，这是民主的核心功能。《决定》承诺，人大准备实施全面规范、公开透明的预算制度，审核重点是预算的支出和政策。这是一个重大的承诺，也是相当复杂艰巨的工作。我们不能指望一步到位，但公民和他们的代表应该特别关注相关动作和信息，仔细研究预算，和有关专家和公民组织一起研究讨论。中国现在就有这样的公民和组织，希望这样的公民和组织多起来，并且得到媒体更多的关注。关注公民最重要的关切，紧紧把住预算关口的人民代表，才

黄顺兴在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公开发表反对意见

是真正称职的代表。

试想一下，在未来七年里，将近三千名全国人大代表，如果每年有十分之一哪怕百分之一积极回应社会关切一次，向有关部门质询，问支出，问政策，问民众关切的重大问题，那将是什么样的场景？代表步步追问，高官小心回答解释的场面，以前只在有关海外的电视节目中出现过。这类场景，即使以温和得多的形式在中国出现，人大的最高权力，人民当家作主的地位，就能看出一点样子了。我国现有五级人大代表总数超过300万，来自民间的代表即使只有100万，真正称职者哪怕只有百分之一，民主监督的场面也相当壮观。

如果人大代表积极有为，公民或公民组织可以发挥配合作用，提供建议，提供材料，甚至发动或购买民意调查，精确有序地表达民意。如果人大代表不作为，公民可以监督代表，评议代表，给他们打分，公布他们的得分。韩国和台湾已有这样的公民组织。

有了公民的积极参与，可以预期，建立联系选民渠道并尽力为选民服务的代表，将会得到高分。如果他们继续当选的概率较高，逐渐形成优胜劣汰的格局，对人大的发展方向必有重大影响。

倘若人大代表持续大规模不作为，积极回应社会关切者寥寥无几，得分普遍低下，《决定》的承诺一再落空，那时候，人大代表的产生机制，必将成为下一步改革的无法回避的议题。

政协是各界各行业表达意见的重要渠道，承担着决策咨询，重大专题协商的功能，还被赋予发挥新型智库作用的期待。

既然如此，政协，政协委员，应该特别重视专题民意调查，与民意调查机构建立联系，向社会购买民意调查。许多民间组织，行业组织，NGO组织，或许可以依托政协活动，成为制度化表达渠道的一部分。

在现代化的治理体系中，民意之重要自不待言。在民主选举制度健全之前，在民意表达渠道完善之前，在公民素质大有提升之前，频繁的、规模多样的、主题各异的民意调查，有可能成为民意有序表达的特别重要的渠道，发挥重大的政治作用，作为民间力量参与推动改革。这条渠道指向单一，表达清晰，副作用小，建设性大。有违民意的既得利益集团很难利用民意调查，相反，只要有改革意愿，政协可以用，人大可以用，党和政府可以用，公民组织也可以用。公民可以通过这条渠道表达民意，媒体可以通过报道传播民意，高层可借助民意推进改革。广泛建立并发展这条专业化的民意表达渠道，或许可以成为现代治理体系的重要环节。

媒体，大学，基金会，专业公司，公民组织，都可以成为非官方的民意调查组织者。

在政协领域，各界委员可以提出专题的民意调查。尽管言论空间尚未完全打开，但是，体制内合法渠道的掌握者，可以主动开辟渠道，大规模地，频繁地，具体深入地进行各种民意调查，把民意通过这些制度化渠道反映上去，成为政策法规的内容。

对于政协委员，公民社会也不应该放弃自己的责任，监督他们，激励他们，评议他们，给他们打分，也可以通过资助和志愿劳动直接支持他们。行业协会，作为各界民间组织，应该成为支持政协委员的主力。

第三，在法治领域积极可为。

《决定》承诺：完善人权司法保障制度。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废止劳动教养制度。逐步减少适用死刑罪名。这些承诺，本身就是对民间长期呼吁的回应。这些承诺的落实，仍然需要民间的持续呼吁和关注。

《决定》承诺：进一步健全宪法实施监督机制和程序，一切违反宪法法律的行为都必须予以追究。

按照八二宪法的规定，任何公民和组织均有权向人大常委会提请违宪审查，但是，这个条款至今尚未被激活，所以被称为睡美人条款。在未来七年中，违宪行为能否得到追究，违宪审查制度能否确立，公民和公民组织至少可以发挥激活睡美人条款的作用。

《决定》进一步提出：完善规范性文件、重大决策合法性审查机制。建立科学的法治建设指标体系和考核标准。

相对违宪审查，这个承诺可以称作违法审查。进一步的问题是，由谁进行官方文件和决策的违法审查？官方聘请法律顾问审查，若能尽职自然很好，但自我审查还需要他人审查的补充。公民社会，法学院教师和他们的研究生，律师，NGO组织，相关领域公司的律师和法律顾问，都

可以在这方面发挥更加客观专业的作用。

《决定》号召加强对司法活动的社会监督，承诺改革审判委员会制度，让审理者裁判、由裁判者负责。同时，推进审判公开、检务公开，增强法律文书说理性，推进法院生效裁判文书公开，广泛实行人民陪审员、人民监督员制度，拓宽人民群众有序参与司法渠道。

人民陪审员和人民监督员制度，需要公民的积极参与，自不必说。至于公民社会如何监督，需要多说几句。

在确保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方面，最大的亮点或许是“让审理者裁判，由裁判者负责”这十二字原则。这是自作自受的原则，公正的原则。展开来说，其中就包括随后承诺的“健全错案防止、纠正、责任追究机制。”这种机制，或许比人财物管理权方面的改革更加具体实在。这种责任制度，如果像生态环境损害责任那样终身追究，其效果必定类似坚持数代的桥梁设计一样，大大增强主事者的责任心，提高质量，有效抵御并减少外来干预。

有了责任制度，再配上审判公开和文书公开制度，加上增强法律文书说理性等具体要求，最后就等待公民的关注和评议了。阅读文书，评议说理水平，追究冤假错案，给法官打分，长期跟踪，深入报道，这些都是公民发挥作用的空间。这些作用像阳光空气一样，可以调节司法领域的生态环境，抑制那些在阴暗处滋生的物种。这就是说，司法环境向何处演化，我们公民可以发挥重要影响。

第四，在社会管理领域积极可为。

《决定》提出：创新劳动关系协调机制，畅通职工表达合理诉求渠道。完善企业工资集体协商制度。

职工表达诉求，协调劳动关系，工资集体协商等等，都需要职工参与。这方面的事务，在国外常常由工会承担。中国寻求创新，如果不学习国外经验的话，就需要各方积极探索。农村也是如此。如果没有民办工会，没有农会，或许可以发明某些替代型的组织，例如专门针对工人或农民的民意调查组织，可以部分承担表达诉求的功能。这种组织，需要知识分子参与探索建立。

《决定》承诺激发社会组织活力，将适合由社会组织提供的公共服务和解决的事项，交给社会组织承担。重点培育和优先发展行业协会商会类、科技类、公益慈善类、城乡社区服务类社会组织，并且宣布这四类组织不必挂靠政府部门，成立时可直接依法申请登记。《决定》表示支持和发展志愿服务组织。

公民进入新开放的社会治理领域，可以成为政府的替代者。由于社会组织之间存在竞争，他们的服务可能更加优良有效。但他们需要动力，需要财力，还需要新知识。

有些地方的知识公民已经建立类似社会组织孵化器的机构，帮助上述各类社会组织，向他们提供知识和技能。但愿这种社会组织的孵化器遍布全国。

在财力方面，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可以解决部分问题，公民应该关注这方面的进展。企业提供财力支持具有巨大的潜力，政府则承诺完善慈善捐助减免税制度，减免力度如何，对企业捐助行为影响很大，公民应该持续关注。

对社会非盈利组织来说，对捐助者来说，金钱不是主要的激励力量，主要激励来自内心的良知和外部的荣誉。社会和媒体应该向良知奉上崇高的荣誉，甚至探索建立社会荣誉体系，向我们民族的良心致敬。

以上列举的公民在上层建筑领域的参与空间，只是一些临时想到的内容。

在生态环保领域，《决定》提出及时公布环境信息，健全举报制度，加强社会监督。在生态环保领域完成确权之后，社会监督的责任就更加重大。在这个领域里，公民社会一直相当活跃，希望有更多人介入。公民不仅应该关注环境生态信息，还可以搜集发布有关信息。

综上所述，无论在哪个领域，公民都有共同可做之事：倡导提议，过程参与，评议监督，关注传播，同时探索社会参与的制度化途径。

在公民做什么的问题上，最有发言权的，必定是在相应领域里长期活动和思考的公民，这里提到的几点，无非是抛砖引玉，引发注意和思考。

四、遇到阻力怎么办

改革将触犯数以万亿元计的巨量利益，这些

利益不仅本身拥有权力，往往还有正统观念的包装。改革必然困难重重。《决定》看到这些困难，提出“最大限度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以更大决心冲破思想观念的束缚、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

从公民的角度看，参与改革的积极性必定遭遇挫折。消极，拖延，口惠而实不至，甚至直接打击，都是可以预料的。面对困难很难讨巧，惟有不屈不挠，坚持到底。但是应该把握分寸，注意维护官民双方改革的共同基础，适当妥协，逐步推进，尽量在双方共同认可的空间内争取良性互动。改革需要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这两股力量推动，最理想的状态是两股力量形成合力，共同拆除观念和利益的藩篱。这就需要彼此配合的良性互动，避免内部损耗和相互损耗。当然，良性互动不仅意味着合作，也包含了冲突，适度的冲突是有建设性的，新制度就是在解决冲突中诞生的。

建立新制度，进入新制度，官民双方都要学习，都要摸索。学习需要启蒙。学者负有这方面责任：预测问题，介绍成熟的经验，提出建设性的建议。

民营企业家，不仅可以在新的经济空间里施展身手，还可以在财力方面支持公民的活动。作为改革的受益者，资助公民推动改革，不仅是利他，也是更深一层的自利。成熟的公民社会，现代的治理体系，完整的公民权利，是企业最安全的生存环境。

媒体在改革中可以发挥重大的推进作用。媒体代表读者关注各个改革空间，报道合作与冲突，传播并评论。在必要的时候，媒体可以唤起全社会对某个焦点的关注。

媒体传播领域存在令人担忧的重大隐患。《决定》强调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而什么叫正确，什么叫错误，在没有严格的法律规定或法规极其宽泛的条件下，恐怕只能是由官职高低决定。如果有关领导的决定符合改革精神，自然皆大欢喜。如果不然，媒体的作用就要大打折扣。有人对十几年前打压媒体的重大事件做过统计，大约百分之三四十的打压行为，只是维护了某些个人和既得利益小集团的利益。在改革中，这些利益将被大量触犯。由此推想未来，媒体的生存空间不能不令人忧虑。

传媒领域的真正出路也在法治。经济领域已有负面清单的构想，上层建筑领域不妨参考学习。这个领域将来有矛盾频发的可能，如何妥善处理，关系到改革的动力，关系到改革到底能走多远。没有媒体及其所代表的民意推动，单凭自上而下的力量，改革的万里长征能否走出三千里？

更令人担忧是：公民在《决定》承诺打开的空间内活动，但这些承诺能否兑现？如果凭借历史经验回答，只能说有可能，但不一定。说“有可能”是因为，兑现承诺不仅对当局的形象有利，也对官民双方的整体利益有利，党史中不乏信守承诺的先例。说“不一定”是因为，整体利益和局部利益未必一致，长期利益和眼前利益常常冲突，愿望和能力总有差距，违背承诺的先例也为数不少。这种风险的存在，必将抑制广大公民参与的积极性。不调整现有的制度条件，恐怕就难以激发并容纳公民参与改革的热情。聊以自慰的是，作为市场契约关系的延伸，现代治理理当信守承诺并建立保证承诺可信的制度，这是符合各方利益的。市场不是兵不厌诈的战场，一再失信，就没人敢谈生意了。

在历史学家看来，一个社会在前进中遭遇阻力，其实是有积极意义的。遭遇阻力就要克服阻力，每前进一步，都必须凝聚一批力量，完成一套计算，形成一个共识，接受一种价值，留下一个故事，激发生成新的精神力量。这才是扎扎实实的进步。这些东西将成为我们民族的记忆和财富，成为我们自身和我们后代心中最可珍贵的一部分。来得容易，失去也容易。来得艰难，才知道珍惜，才有意识也有能力抵御侵蚀，才能在民族进步的每个台阶上聚集闪光的精神和生命，形成社会肌体内部对抗疾病的长久免疫力。民众就是这样成长为公民的。

中国社会的官民关系长期紧张，冲突不断，但是，在全面深化改革决定的基础上，官民双方有了良好合作的空间，改革的乐观前景初步展现。尽管改革并不必然成功，但公民的努力大大有助于成功。■

（责任编辑　徐庆全）

安徽“严打”的回顾与思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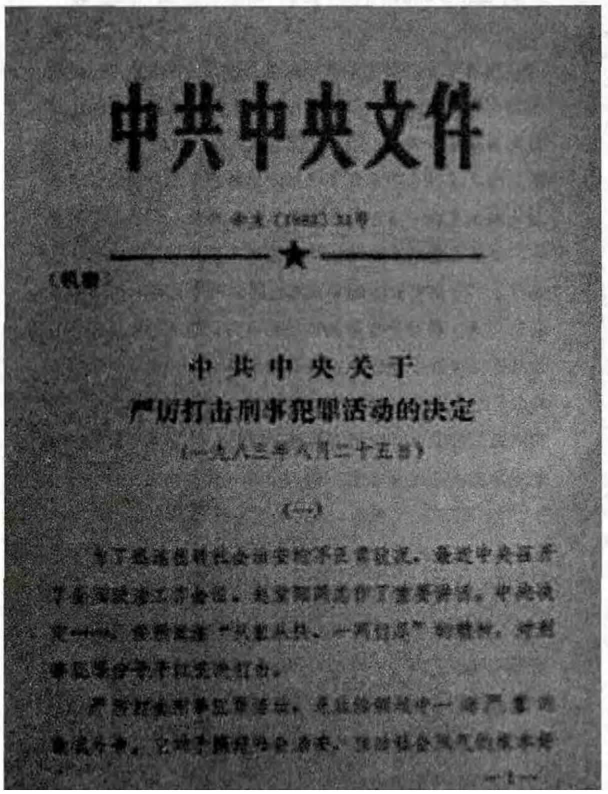
○ 尹曙生

从1983年夏、秋天开始，到1986年，历时三年，在全国范围内，实行全党动手、全民动员，公、检、法、司机关全力以赴，大规模地开展了一场轰轰烈烈的严厉打击严重刑事犯罪活动的斗争，简称“严打”。其规模之大、动用的人力、物力之多，是前所未有的；打击人数之众，仅次于1950年至1953年的第一次大规模镇压反革命运动。按照党中央的部署，这次“严打”斗争以三年为期，三个战役，对犯罪分子采取抓一批、杀一批、劳动教养一批、收容审查一批、注销城市户口一批，以达到把犯罪分子的嚣张气焰彻底打下去，实现社会治安的根本好转的目标。

三年为期三个战役结束后，刑事犯罪案件在短时间内有所下降，社会治安有所好转。但是没有达到预期效果，从1987年开始，刑事犯罪案件快速度地、大幅度地上升，社会治安秩序动荡不定。于是不得不继续开展“严打”斗争，一直打到上个世纪末。只是1986年以后开展的“严打”斗争的规模没有那三年大。直到现在，有的地方在社会治安出现问题时，领导者们首先想到的就是用“严打”的办法来对待，尽管名称不一定叫“严打”斗争，但是实际做法有许多共同之处。最大的共同点就是有意、无意地偏离法律轨道，用人治代替法治；在党委一把手支持下，公安权力无限膨胀，凌驾于检察、法院之上，实际上形成公、检、法联合办公局面，监督、制约机制丧失。原重庆市公安局长王立军在薄熙来的支持下主导的打黑行动就是活生生的例子。可见用政治运动来开展“严打”的影响有多么深远。

“严打”斗争的设计者，原来设想用三年时间来实现社会治安根本好转，可是打了近三十年，社会治安远没有达到根本好转的目的。现在的社会治安状况同三十年前相比，更加恶化了。具体表现在：犯罪案件、尤其是恶性犯罪案件大幅度、成倍、成十倍上升。全国刑事犯罪案件1983年前后每年发案在50万起以内，现在是每年500万起左右（2007年就达到480万起）；情节特别严重、手段特别恶劣、主观恶性程度特别高、造成的社会危害后果特别大的大案、要案，频繁发生；犯罪的“品种”更加齐全，外国有的，中国有，外国没有的，中国也有；群众的安全感大大下降，例如，遍布城乡居民住房的防卫门窗，使得居民像生活在监狱铁窗之内，成了中国城镇建设的一道风景线，就这样，仍然不安全，居民经常被盗、被抢、甚至被害；中国早已进入到世界犯罪最严重的国家行列。中国的黑社会犯罪活动和上个世纪意大利黑手党一样可以控制一个地方的政治、经济和人们的社会生活。

近十几年来笔者看了很多有关“严打”方面



中共中央文件

[illegible]

（机密）

中共中央关于

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的决定

（一九八三年八月二十五日）

（一）

[illegible]

“严打”期间被抓犯人游街示众

执行中不是依照宪法和法律办事，而是根据党和国家的领导人的讲话、党内的红头文件办事。这不是法治。

这次“严打”斗争，起因于1983年7月16日，公安部向党中央递交了一份报告，题目是《关于发挥专政职能改善公安装备的报告》。公安部这个报告说的是，当前刑事犯罪活动猖獗，为了发挥公安机关专政职能作用，必须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打击的重点和应该注意的事项，重点汇报了公安机关人、财、物严重短缺的状况，要求党中央帮助解决，以利于打击犯罪，维护社会治安。这个报告除送党中央外，特意送邓小平同志，希望他能关心、支持公安机关建设。7月19日，邓小平在北戴河召见公安部部长刘复之（抗日战争时期，刘复之给邓小平当过秘书，他刚刚接替赵苍璧担任公安部长），在座的有党中央负责领导政法工作的彭真。邓小平拿着公安部的报告，对刘复之说：“你们这个文件不解决问题。刑事案件、恶性案件大幅度增加，这种情况不得人心”；“为什么不可以组织一次、二次、三次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的战役？每个大中城市，都要在三年内组织几次战役”；“一次战役打击他一大批，就这么干下去。我们说过不搞运动，但集中打击严重刑事犯罪活动还必须发动群众”；“对严重刑事犯罪分子，包括杀人犯、抢劫犯、流氓犯罪团伙分子、教唆犯、在劳改劳教中继续传授犯罪技术的惯犯，以及人贩子、老鸨儿等，必须坚决逮捕、判刑，组织劳动改造，给予严厉的法律制裁，必须依法杀一批，有些还要长期关起来”；“现在是非常状态，必须依法从重从快打击，严才能治得住。搞得不痛不痒，不得人心。我们说加强人民民主专政，这就是人民民主专政。”

根据邓小平的讲话精神，8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做出了《关于严厉打击严重刑事犯罪活动的决定》；9月2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关于严惩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的决定》和《关于迅速审判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的程序的决定》。

的回忆文章，有些是领导者的文章。他们对“严打”斗争都给予了充分的肯定，有些观点我是赞成的。比如，对严重刑事犯罪分子依法予以严厉打击，是完全必要的；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只要有严重刑事犯罪活动，政法部门义不容辞，都要给予严厉打击，否则就是失职、渎职。但是，对如何打击，是严格依法办事，在法治的框架内进行，还是把法律扔在一边，采取开展政治运动的方式，人海战术、群众专政，看法就不一样了。三年“严打”斗争采取的不是严格按照宪法和法律办事，而是用我们党历来采取的政治运动的模式，按照邓小平的话来说，这次严打斗争是“不叫运动的运动”。我认为这就是为什么三年“严打”斗争没有达到使社会治安根本好转预期目标的根本原因。实践证明，仅靠“严打”不能解决社会治安根本问题，“严打”是治标的办法，解决产生犯罪的土壤和温床，才是治本的办法。当前刑事犯罪如此严重，是社会消极腐败现象的综合反映，不清除社会消极腐败现象，就不能从根本上遏制刑事犯罪。整顿治安，必须标、本兼治。

粉碎“四人帮”后，总结历史经验，党中央曾郑重宣布，今后不再搞群众（政治）运动。可是，1983年开展的严厉打击严重刑事犯罪活动的斗争，是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开展的规模最大的政治运动，而且跟解放后历次政治运动的模式一样，先是党和国家领导人针对某个问题发表讲话或作指示，然后是中共中央发文件，全国人大做决定，然后是地方各级党委发动群众，贯彻执行；在

于是，一场波澜壮阔的严厉打击严重刑事犯罪活动的斗争，在全国范围内开展起来了。打击严重刑事犯罪活动不再仅仅是政法部门的职能，而是全党的任务。党委一把手亲自坐阵指挥，抽调各行各业的人参加，调配人力、物力；公、检、法、司打破界限，联合办公，对大要案犯的处理，集体做决定，然后分别办理手续。这样就把刚刚颁布不久的《刑事诉讼法》扔到了一边，完全不按诉讼程序办事，监督制约机制完全丧失，是文化大革命后对法治建设的一次大倒退。

看看安徽省“严打”斗争第一战役第一仗是怎么打的，就可见一斑。

1983年8月11日至15日，中共安徽省委召开全省政法工作会议，贯彻中央文件精神，部署“严打”斗争第一战役第一仗，要求在8月底前后为全省集中统一行动时间，首先把浮在面上的犯罪分子统统拘捕起来；9月份集中力量进行预审、起诉、审判，投入劳改、劳教，从重从快惩处。

8月22日至27日，“严打”斗争第一战役第一仗打响。省、地（市）、县党、政一把手亲自挂帅，分管政法工作的党委副书记坐阵指挥，各级公安机关是各级党委指挥“严打”斗争的参谋部。除政法部门人员全力以赴外，从各部门、各单位共抽调21万3千人参加，并从非政法部门征调5000多部机动车辆、船舶，在几天时间内集中拘捕了41188人；仅8月22日、23日两天晚上，就拘捕了25760人。这两天晚上，笔者通宵达旦，在省公安厅值班室负责将全省陆续报来的拘捕人数字审核后，报告省委。这样大规模拘捕人，有什么法律依据？能保证不出错吗？

在被拘捕起来的41000多人中，依法逮捕的27481人，劳动教养4901人，收容审查8806人（注销城市户口100人）。对其中所谓的3673名典型案例的犯罪分子，经公、检、法领导联合办公集体研究决定刑期，判处死刑357人，死缓43人，无期徒刑79人，其他判有期徒刑，并先后召开1万至10万人宣判大会43场（次），宣判大会后，游街示众，杀一儆百。这种做法和解放初期镇压反革命运动的做法，有什么区别？在这样情况下，被告人的合法权益完全被剥夺了。

领导全国“严打”斗争的负责同志不止一次地说：“严打”就是专政。可是，安徽在抓捕的41000多人中，劳动教养4900多人，占12%（安徽三年“严打”共拘捕73360人，其中劳教13153人，占近20%），这些人受到的是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规定的行政处罚，说明他们没有触犯刑事法律，把他们也统统归为“严打”斗争对象，这不是混淆罪与非罪的界限和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吗？尤其是收容审查的那8800多人（安徽三年“严打”斗争共收容审查15000多人），由于没有证据，只是怀疑他们有罪，就把他们收审起来，关进监狱，时间少则几十天、几个月，多则几年，而最后审查有问题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只有30%，这就意味着有近5000人（三年是1万人）被无缘无故抓进监狱，关了几个月、甚至几年，最后一纸释放证明把他们打发走了，什么补偿也没有，违反了宪法规定的公民人身自由权利不受侵犯的原则。收容审查以后被取消，说明了它的不合法性。

第一战役第一仗打过不久，1983年10月21日至25日，省委召开地市党委分管政法部门工作的书记会议，政法部门领导参加，研究部署“严打”斗争第一战役第二仗。时间确定为12月上旬。在这次会议上，政法部门一些领导反映说：“过去我们也可能有右倾思想，对严重刑事犯罪活动存在打击不力现象；但是，这次‘严打’斗争确实左了，不能再这么干下去了，否则就将是一年办案、二年申诉、三年平反”；“要接受过去的经验教训。我们刚刚平反了文化大革命前和文化大革命中的冤假错案，再这样干下去，不知道又要制造多少新的冤假错案。”甚至有人提出：“如果还这么干，我宁愿受处分，辞职不干，也不参加严打斗争。”由于抵制思想普遍，于是在这次会议上，把主要力量用在统一思想、统一认识上，为防止“严打”斗争扩大化，制定了“严打”斗争的具体政策界限。针对第一战役第一仗中存在的问题，在会议纪要中特别提出：“在审批拘捕对象时，要严格区分罪与非罪的界限：把一般男女关系与流氓犯罪区别开来；把流氓罪同一般流氓行为区别开来；把制作、贩卖组织传播淫秽书画、录音、录像，同一般传看、传抄区别开来；把强迫、引诱、容留妇女卖淫同偶尔从中牵线、贪图小利的人区别开来；把采用诈骗、利诱、胁迫等手段拐卖妇女儿童的人贩子，同充当介绍人，从中收受少量钱物

的人区别开来；把盗窃犯罪同小偷小摸区别开来；把通奸与强奸区别开来；把一般民事纠纷与寻衅滋事的犯罪行为区别开来；把顶撞领导的错误行为与妨碍公务构成犯罪区别开来(这是针对一些领导趁“严打”之机，打击报复下属的特别规定——笔者)；把一般赌博行为与赌头赌棍区别开来；把介绍婚姻得到某些好处与拐卖妇女的犯罪行为区别开来。”这些规定限制了在后来“严打”斗争中的滥拘滥捕现象。但是，在当时的大环境下，还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依法办案的问题。

安徽省第一战役第一仗打击的主要都是哪些人呢？杀人犯305，抢劫犯2190，强奸犯4706(里面有很多属通奸——笔者)，重大盗窃犯4378，一般盗窃6949(多是小偷小摸——笔者)，赌头赌棍1153，伤害1660，诈骗1344，流氓犯7392……

1997年《刑法》修改后取消了流氓罪。而在1983年“严打”斗争被拘捕的人犯中，流氓犯罪的最多。用今天的标准来看，90%的人都不构成犯罪。当时对没有领结婚证而同居的，一般都按流氓罪处理。

这次会议制定的这几条政策界限虽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依法办案的问题，但是因为它有极强的针对性，有效地制约了“严打”斗争继续扩大化。因此，在紧接着的在第一战役第二仗、第三仗的两次集中统一行动中，拘捕人数大幅度下降，只拘捕了4345名，和第一仗4万多人相比，只有其十分之一。

1979年《刑法》、《刑事诉讼法》没有颁布前，公、检、法三家，监督制约机制基本缺失，公安老大的地位稳坐几十年，谈不上监督制约。文化大革命中，检察、法院撤消，侦查、起诉、审判归为一家——公检法军管会。所以文革前和文革中制造了大批冤假错案，不足为奇。1979年《刑法》、《刑事诉讼法》颁布后，打击犯罪的斗争逐步纳入法治化轨道。可是仅仅过了两三年，“严打”斗争一起，又回到了文革前和文革中的状态——公、检、法联合办公。安徽省在“严打”斗争第一战役第一仗结束后，公安部13局一个调查组到安徽调查，10月29日，他们在一份《关于休宁县打击严重刑事犯罪斗争第一战役第一仗的调查报告》中，充分肯定该县在“严打”斗争中的四个特点(一、二、三，略)：“四、公检法联合办公，依法办案(联合办公就不是依法办案——笔者)。办案小组内配齐公检法的干部，既共同办案，又有侧重。预审终结的案件由公安局预审股审核后移送起诉，(起诉书)要求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定性准确。办案按程序进行(联合办案就不是按程序进行——笔者)，每一案卷中都具备《提请批准逮捕书》、《批准逮捕决定书》、《起诉意见书》、《起诉书》、《判决书》。”

这不是“依法办案”，更不是“办案按程序进行”。公安局预审股对犯罪嫌疑人预审后认为有罪，需要判多少年徒刑，就直接移送起诉，检察院只要按公安局《起诉意见书》，照葫芦画瓢，写一个《起诉书》，然后法院写一个《判决书》，把这些东西放到犯人档案中，案子就办好了。公安局既负责侦查，又负责起诉、审判，检察院、法院完全跟着公安走，盖上两家公章了事。这和大跃进年代实行的“一长代三长(公安局长、检察长、法院院长)，一员顶三员(侦查员、检察员、审判员)，下去一把抓，回来再分家”是一路货色。

当时领导人特别强调对“严打”对象要做到“法律手续齐全”，“经得起历史检验”。他们原来就预见到将来会有人申诉，司法机关要复查，但是要让申诉人从法律文书上找不到毛病。这种弄虚作假在共和国政法工作中屡见不鲜，而且积习难改，不知害了多少人。近几年一些地方在整治社会治安突出问题时，当地领导总要在公检法内部召开大会，强调政法部门必须统一思想、统一认识、步调一致，公安独大的现象时隐时现，监督制约机制受到严重干扰。这说明1983年“严打”斗争的消极影响还在起作用。

1983年开展的“严打”斗争再一次彰显了国人“治乱世用重典”的偏颇观念和“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的刑法报复主义情绪。对严重刑事犯罪活动，不从根本上找原因，不解决产生犯罪的土壤，只靠严厉打击，是解决不了问题的。30多年来的实际情况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严打”斗争打击的面宽了，打击的人数多了，尤其是第一战役第一仗。在“严打”斗争中，全国逮捕判刑的170多万人、劳动教养30多万人、收容审查50多万人(其中有35万多人没有构成刑事犯罪，而是被称为“大法不犯、小法常犯、气死公安、难倒法院”的人物——笔者)。其中许多人，他们

1983年全国各地开展了声势浩大的“严打”斗争

没有触犯刑律，没有受到刑法的处罚，也被当作“严打”对象，还要被专政，这不是扩大化是什么？至于注销城市户口，更是荒唐可笑。在三年“严打”斗争中，每年平均拘捕、判刑人数是“严打”斗争前每年5倍左右，杀的人大体也是这个数。安徽省1980年至1983年6月，共判处死刑310人，而“严打”斗争第一仗，短短2个月时间，就判处357人死刑。全国“严打”斗争第一战役，判处了24000人死刑。为了从重从快，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关于迅速审判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的程序的决定》，将“杀人、强奸、抢劫、爆炸和其他严重危害公共安全应当判处死刑的犯罪分子，可以不受《刑事诉讼法》第110条规定的期限的限制，并将上诉期改为三日”。这样一个错误的决定，使死刑案件能够在最短的时间内审结，能够在最短时间内执行，以至有的死刑案件从审判到执行，最短不到十天时间，充分暴露了对人的生命的漠视和浓厚的报复主义情绪。当时被以流氓罪判处死刑的全国一些典型案例，其中包括国家领导人的子女，今天看来实在草率得很。他们多以聚众淫乱、聚众闹事被拘捕，有罪，但是不至于该判死刑。安徽蚌埠市一个青年嫖娼不给钱被抓获，判刑5年。“严打”中他写申诉信，被指责“流氓本性不改”，被法院改判死刑、立即执行。

1983年夏天之前，中国社会治安状况到底如何，非要开展一场大规模群众运动来解决呢？笔者一直在公安机关工作，深信有发言权。

其实，那时的社会治安状况基本上是稳定的，正常的。在一个贫穷落后、人口众多的大国，尤其是十年文革动乱的影响，不时发生一些大案、要案，是正常的，不足为奇。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人心思定，不愿意再折腾。公安机关除了正常的侦查破案，维护社会治安外，用很大的力气，复查平反冤假错案，给全部四类分子摘帽子。这当中有很多反复。由于长期受左倾思想影响，平反冤假错案有很大阻力，既有公安内部的，认为平反冤假错案，就是否定公安工作，就是否定自己；也有外部的阻力。比如，1980年，安徽省委召开地市委书记会议，在会上有的领导指责公安机关不分青红皂白，给所有四类分子摘帽，结果四类分子打击、报复贫下中农，搞反攻倒算，基层干部被搞得灰溜溜的，抬不起头，要求对表现不好的四类分子，不给摘帽，已经摘掉帽子的，要重新戴上帽子。省委要求公安厅写一个通知发到地市县公安处（局），对已经摘掉帽子的四类分子，如果有反攻倒算、打击贫下中农行为的，要开展斗争，重新戴上四类分子帽子，触犯刑律的，要依法处理。其实当时公安厅领导明明知道这个通知是不妥的，因为党中央文件明确决定要给全部四类分子摘帽，不得例外，至于四类分子有什么问题，具体问题具体对待，但不准再戴上四类分子帽子。公安部长赵苍璧还为此向新华社记者发表谈话，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向全世界作了广

“严打”中“二王”被击毙

播，反响良好。公安厅领导迫于压力，不得不这样做。好在公安部领导看了公安厅文件后，打来电话，说请示中央领导，你们发的文件违背了中央文件精神，必须坚决纠正。这样公安厅才宣布文件作废，按中央文件精神办。

《刑法》、《刑事诉讼法》颁布后，安徽省把地、市、县公、检、法、司“四长”分期、分批集中到合肥进行为期一年的培训，笔者也曾在培训班上给他们上过课。让他们懂得办案的程序和起码的法律知识。“四长”们学习是认真的、刻苦的，边学习“两法”，边总结经验教训。学习回去后基本上能够按照“两法”精神办事，办案的质量大大提高。从总体上看，不存在对严重刑事犯罪活动打击不力的问题。社会治安总体也是平稳的。

但是当时社会治安也出现了一些新情况、新问题：主要是青少年违法犯罪问题比较突出。这是因为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全国有一千多万青少年下放农村，八十年代前后他们陆续返回城市，除少数人考上大专院校和找到工作外，其他大多数人，既不能上学读书，又没有知识、文化，由于文革的破坏，经济正在恢复，城镇失业人口大增，这些人加入了失业大军的行列。他们整天无所事事，游荡街头，心灵空虚，对前途失去信心，感到自己“一无所有”，被社会抛弃了，加上在文革中受到造反的影响，于是一些人寻衅滋事，打架斗殴，寻找刺激；改革开放了，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两性关系混乱了，这些人被当作流氓对待，这就是为什么以流氓犯罪抓捕的人那么多的原因；还有一些城镇青少年，没有工作，纯粹为生活所迫，走上偷窃扒拿的道路。当时公安部门根据中央的指示精神，除对杀人、抢劫、强奸、重大盗窃等严重犯罪活动进行打击外，对有轻微违法犯罪行为的青少年，采取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依靠基层组织，成立帮教小组，进行帮教。除对他们进行思想教育、法治教育、道德品质教育外，帮助他们找工作，解决生活出路。从中央到地方新闻媒体都做了广泛宣传。安徽省安庆市、合肥市文化街18号大院、霍丘县叶集镇帮教违法犯罪青少年的经验，被公安部在全国推广，党报、党刊和新华社都做了介绍。赵苍璧部长1982年到安徽考察，亲自听取汇报。应该说这个时候公安工作的基本思路是正确的，社会治安基本上是平稳的。

可就在这个时候，全国发生了几起大的突发事件（案件）。一个就是1983年2月，王宗坊、王宗玮兄弟，在东北抢枪杀人抢劫，然后一路南下，流窜七八个省，滥杀无辜，最后在江西省被围歼击毙。这个案子对全国产生巨大影响，“二王”在没有被击毙前，谣言四起，谈“王”色变。同年5月，卓长仁等四名罪犯，从沈阳机场劫持民航班机到韩国，当时中国没有同韩国建立外交关系，民航飞机尽管搞回来了，但是四名罪犯却被送到台湾，受到英雄般接待（罪犯终归是罪犯，以后他们在台湾继续绑架杀人被重处——笔者），极大地刺激了国人的自尊心。还有发生在上海控江路青少年流氓滋扰事件，等等，使人们对社会治安感到担心，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客观分析，这是几件突发事件，并不表明社会治安就失控了，需要在全国发动一场政治运动来解决。■

（作者为安徽省公安厅原常务副厅长，曾在青海省公安厅工作）

（责任编辑　杨继绳）

“四个伟大”的由来

○　胡鹏池

“四个伟大”作为一句口号,其最完整的表达为:

“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岁! 万岁! 万万岁!”

这是“亲密战友”关于“伟大领袖”的语录,四“伟大”与三“万岁”连接得堪称流畅完美,所以自其面世后,立刻就显示其权威性,一个字、一个标点符号都是不能改的,四“伟大”的前后次序也不能颠倒。

但如此严格规范的定式毕竟也有其发展、形成的过程。

一、“四个伟大”的雏形:3+1

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闭幕后不久,毛泽东决定于8月18日在天安门广场举行《首都各界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群众大会》。

那天上午9时半左右,毛泽东、林彪以及其他党和国家领导人登上了天安门城楼。毛穿上了一套崭新的草绿色军装,头戴一顶缀有红五星的新军帽,在刚结束的中央全会上成为中共中央唯一副主席的林彪也是一身军装,摇着“小红书”紧挨着站在他身边。

10时正,大会开始,在《东方红》的乐曲声中,陈伯达宣布会议开始并致词。陈在致词中说:“我们伟大的领袖,伟大的导师,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今天在这里同大家见面。”简单的一句话,三个头衔就有了。

接着由林彪讲话,林彪说:“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最高司令是我们的毛主席,毛主席是‘统帅’。我们在伟大统帅的指挥下……”这样,林彪又给毛泽东加上了一个“伟大统帅”的头衔。

3+1=4了。这就是“四个伟大”的雏形。

二、“四个伟大”的第一次合成,康生是合成者

虽然“3+1”的雏形在8月18日的林、陈讲话中已经具备,但在第二天的新闻报道中却还没有将它们捏合在一起。

到了第三天,即8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毛主席和我们在一起》,这篇社论开头就说:

“一九六六年八月十八日,我们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穿着人民解放军军装,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以及其他同志,在天安门上检阅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百万大军。”[注1]

这是经过合成的“四个伟大”第一次面世。

第五天,8月22日《人民日报》的“报眼”又刊登了“我们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岁!”的口号。

8月31日,毛泽东第二次接见红卫兵时,仍然由林彪讲话。林彪在讲话中称毛泽东为“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注2]

这以后,“四个伟大”的说法就流行开了。

在“四个伟大”中,为什么将“伟大的导师”排在最前面? 据当时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穆欣说:这是康生的“功劳”。穆欣的回忆还有具体细节:“康生还把几本外语词典带到中央文革小组会议室来,翻查、考究、推敲的结果,认为‘伟大的导师’最重要,应放在前面。”[注3]

这就是说,进行合成操作的是康生。没有资料显示林彪或是陈伯达,或是《人民日报》的编辑参与了具体的合成。

穆欣说,“四个伟大”的发明权当属于林彪与陈伯达和康生“共有”。

曾经担任过江青的秘书与中央文革办事组组长的阎长贵先生对这一历史细节特别重视,在他的文章中详细引述了穆欣的回忆,认为穆欣的看法“这是有道理的,符合历史实际”。[注4]

三、蒯大富与“四个伟大”

1966年8月24日,贺鹏飞带领清华大学红卫

兵用铜头皮带驱使一群“走资派”和“反动学术权威”拆除了清华大学标志性建筑二校门。不久，保守派的清华大学红卫兵垮了台，蒯大富为代表的造反派崛起。蒯大富等决定在二校门原址修建一座毛主席塑像。1967年春末，毛主席塑像即将落成，就想请林彪题词。在一次中央首长接见时，蒯向叶群讲了这个意思，叶群很痛快地答应了。于是蒯就写了一个条子转呈林彪，请林彪题写“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纸条上还写着“横写竖写都可以”的话。注5

蒯大富写的条子是在《人民日报》所刊登的口号基础上去掉了“我们”两个字，又在第一个“万岁”后加上了“万岁！万万岁！”五个字及两个惊叹号。虽说主要内容是抄来的，但蒯大富毕竟作了增减字。当时的蒯大富已成为造反派的一个标志性的人物，他的名字已经无人不晓。

如果没有蒯大富之请，就很可能没有林彪后来的题词。没有林彪的这一题词，“四个伟大”的影响也不会有那么大。所以说蒯大富在“四个伟大”的口号形成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不应忽视。

四、“四个伟大”的林彪题词提前发表

既然，林彪题词原本是应蒯大富之请而专为清华大学毛主席塑像而题的，照道理说应该在塑像落成之日正式发表。当然提前或滞后发表也都是可以的，但至少应该说明这是为清华大学毛主席塑像而题的缘由。

然而，林彪题词的手迹却正式发表在1967年5月1日《人民日报》第一版毛主席像的下面。

5月2日《人民日报》以头版头条的位置称：

“我们的副统帅林彪同志为今年‘五一’国际劳动节的题词，最集中的表达出了亿万人民对毛主席无限热爱、无限忠诚、无限信仰、无限崇拜的感情，成为今天整个节日庆祝活动中最响亮的颂歌。”

从上述报道中，人们清楚地看出林彪题词的缘由是为“五一”国际劳动节，根本没有涉及蒯大富及即将落成的清华大学毛主席塑像。

三天后，即1967年5月4日，全国第一座毛泽东巨型塑像在清华大学落成。

《清华文革的大事日志》描绘了那天清华园内的热闹景象：

彩色缤纷气球云集，迎风漫展红旗林立。林副统帅的题词：“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刻在雕像上，映着骄阳金光闪闪。上午全校欢庆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塑像落成。注6

第二天的《人民日报》记载了全国第一座毛主席像落成时的“盛况”：

四日，在清华大学，万众欢呼，群情沸腾。

一座巨型的毛主席全身塑像，在清华园矗立起来了！

这座用钢筋水泥制作的毛主席塑像，加上底座，高达八点一米，像雄伟的泰山，巍然屹立在清华大学校园中心。毛主席身穿军大衣，神采奕奕，高举他老人家那雄劲的手臂，为无限忠于他的革命师生和亿万人民指出前进的方向。

通过时间的提前，缘由的变更，林彪题词的分量加重了，“五一节”的分量加重了，但清华与蒯大富的分量却降轻了。人们看不出林彪的题词与清华大学有什么关系。不明真相、不知就里的校外群众甚至会认为蒯大富与清华井冈山红卫兵只不过是抄用了林彪的“五一题词”而已。

蒯大富的同班王同学回忆说：“这个题词，确实是蒯向林彪提出的。”“在修建中，就听蒯不止一次地说林副主席答应给题词。”“到了五一前，又听说，不宜说是给一个组织提的，登到报上全国用。说是给一个学校题的不太好。”“那天题词到了清华，在西大操场向同学展示，我参加了。我们排成一排，一位举着题词左右走让大家看。去年我问过蒯，这个原字哪里去了？假如在，就值钱了。蒯说，后来也就不知道哪里去了。”

五、林彪是“四个伟大”的专利拥有者

由于林彪“四个伟大”的题词手迹首先发表在1967年5月1日《人民日报》第一版上，继之，《人民日报》又对此进行了大力炒作，紧接着由林彪题词的全国第一座毛泽东塑像在清华大学落成，报纸上又是一番炒作，“四个伟大”就成了神州大地的一股旋风，同时也催生了长达十多年的劳民伤财的“塑像风”。虽然全国各地所建造的“毛主席塑像”造型不一，尺寸也各不相同，但有一点是基本相同的，那

就是大都沿用了这一林彪题词。

从此，“四个伟大”就在全国范围内更为广泛地流传开来，与之同时也将林彪的名字与“四个伟大”紧紧地扣在了一起。

在“四个伟大”定型前，中央领导人、红卫兵、造反派、普通群众对毛泽东的称谓都是各说各的，无非是在“敬爱的”或“亲爱的”之前之后，将领袖、导师、红太阳、大救星……这些最好听的名词中任意选择并任意排列组合，形成了各种五花八门、光怪陆离的“口号”与“颂词”的“搭子”。其中“统帅”用的并不多，“舵手”的说法更是少见。但是，这些说法在中共历史上全都曾经出现过。周恩来就曾说过毛泽东是“艄公”，他在1962年年初的“七千人大会”上谈到大跃进以来的犯错误的责任时说：

“主席早发现问题，早有准备，是我们犯错误，他一人无法挽住狂澜。现在要全党一心一德，加强集中统一，听‘艄公’的话，听中央的话。中央听毛主席的话。”注7

更早在延安整风时期，陈毅也已经称呼毛泽东为“船老大”了。

无论是“艄公”还是“船老大”，这些称呼都有“舵手”的涵义了。

自从林彪作了“四个伟大”的题词后，全党、全国人民这才口径高度统一，动辄就是“四个伟大”，排序不能变，三个“万岁”一个也不能少，再也没有什么人可以自创了，也没有了自创的余地。

虽说林彪不是“四个伟大”唯一的原创，但他是原创者之一，他的地位及他所起的作用也远远超过了陈伯达与康生，所以将“四个伟大”挂在林彪的名下，不仅是“自然形成”，也是“人心所向”，更是历史的真实。

打个比喻，如果将“四个伟大”比作为一项专利，林彪就是唯一的“专利注册者”。“专利注册者”也不一定是“专利发明者”，而其他在“专利”发明过程中的参与人，又从来也没有与林彪来争抢这个“专利权”。

曾经喧嚣五六年之久的“四个伟大”是“个人崇拜”史上一件绕不过去的事，搞清楚它形成的过程，再现当时的历史，是一件有意义的事。

阎长贵先生是有影响的“文革”史专家，在他的《关于“文革”中“四个伟大”由来的历史考察》及《“四个伟大”是谁提出来的?》两文中，相继郑重指出“四个伟大”并不是林彪提出来的，它是一个集体创作。并向读者呼吁“从今以后，我们再也不要在这个问题上，以讹传讹了。”注8笔者一向对阎先生治史的严谨态度深为感佩，但对这一点却不敢苟同。

笔者认为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将“四个伟大”归结于林彪的名下，说成是林彪提出来的，都不是“以讹传讹”，而是更大、更重要的历史事实。相反，如果仅以陈伯达、康生，也包括蒯大富在内的其他人曾经参与的历史细节而淡化林彪的主导作用，这倒不是历史的真实了。有点“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意思。

诸如“四个伟大”这样的例子不止一个，关于“三个副词”的由来就是另一个典型事例。

林彪于1966年12月16日在《毛主席语录》“再版前言”里写道：

“毛泽东同志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

前面用三个副词：“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作为前置状语，后面是三个动词：“继承、捍卫和发展”，联在一起，不知有多么好！当年，凡有文化的中国人对“再版前言”无不倒背如流；即使缺少文化的，如叶群在江苏太仓搞四清时一手培养的“顾阿桃”这样六七十岁的农村老太太也能倒背如流，可见这“三个副词”的普及程度。

但是，“三个副词”也不是林彪首创的。据周恩来对吴法宪讲：

“三个副词不是林彪提出来的，而是在中央书记处开会时，邓小平总书记想出来的。我认为邓小平提出毛主席天才地、全面地、创造性地继承、捍卫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三个副词是很英明

的。”

如此说来，“三个副词”的首创者是邓小平，发现者是周恩来，林彪只是一个应用者。

随着林彪所一再推广的群众性学毛著运动的蓬勃开展，随着“小红书”人手几册随身携带，“三个副词”早就变成林彪的了。林彪既没偷，也没抢，就像“四个伟大”一样，不知不觉中就归属于他了。当年的老百姓只知道这“三个副词”是林彪说的，谁也不知道原来邓小平说在先。

邓小平虽然说过这“三个副词”，但后来归于林彪了。无论是在邓失势时还是得势时，他自己从来没有出来说明这一点。邓小平早就放弃了。

再举“一句顶一万句”的例子。

其实“一句顶一万句”不过是一句口头语，与形容封建皇帝的“金口玉言”的意思也差不多。但是这句话被林彪在“文革”前后的讲话中反复强调了：

1.“毛主席的书，是我们全军各项工作的最高指示。毛主席的话，水平最高，威信最高，威力最大，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

——1966年1月25日《解放军报》

2.“用毛泽东思想统一全军、全党，什么问题都可以解决，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超过我们一万句。”

——1966年“五一八”讲话

3.“毛主席的话，一句等于我们一万句。我们要以毛主席的思想来统帅全国，来指导我们的一切工作。”

——1967年3月20日，在军以上干部会议上的讲话

这三个版本大同小异，第一个用“顶”，第二个用“超过”，第三个用“等于”。

正是由于林彪的反复推销，“一句顶一万句”家喻户晓，在“造神运动”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所以理所当然地也归属于林彪的创造。

林彪之所以从一个长期养病的“老病号”异军突起，最终登上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副统帅、接班人的宝座，并不主要是靠他解放战争的军功，更重要的是靠他狂热地推行“个人崇拜”。当年这些“四个伟大”、“三个副词”、“一句顶一万句”与“顶峰论”、“天才论”、“四个第一”……全都是林彪“造神运动”中的“主打歌”与“组合拳”，它们在“造神”的同时也为林彪捞取了政治资本。

六、毛泽东对“四个伟大”的态度演变

前述，如将“四个伟大”比作一项“专利”，作为“专利权”拥有者的林彪当然也是“专利”受惠者。当亿万军民在对“伟大领袖”顶礼膜拜之际，这位“造神运动”的大祭司也同样享用了亿万军民“身体健康”、“永远健康”的祝词。

那么，此项“专利”有没有审批同意者呢？

笔者注意到在吴法宪的回忆中有这样的相关叙述，在1966年8月18日大会开始前，负责大会保卫工作的吴法宪看到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的休息室里和林彪、周恩来、陈伯达一起审阅和修改大会的讲话稿。

这个历史细节告诉我们：“四个伟大”中的“三个伟大”与“一个伟大”是毛泽东当时审阅时就已经分别同意了的。

在“四个伟大”流行的五年多时间内，毛泽东耳听目睹了无数次，他早就用他的“微笑”在全国军民面前表明了他的态度。虽然间或也有不满的发作，但都是在内部极小的范围内，只有极少数的人与闻，毛泽东既不强调，也不重申，更不连续。

“四个伟大”面世三个多月后，1966年12月2日，毛泽东在审阅周恩来报送的文件中，亲自将“四个伟大”删去，但却没有任何文字上的“批示”及语言上的“指示”。当然，凭周恩来的精明与细致，他不可能不注意到这个细节。但他能有什么具体动作呢？他也只能当作是伟大领袖的“伟大谦虚”了。

1967年2月3日，毛泽东在接见阿尔巴尼亚的卡博和巴卢库时说：“又给我封了好几个官，什么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我就不高兴。但是，有什么办法！他们到处这么搞。”这样一次对外讲话的记录稿，当然会有多一些的高层人知悉，但他们又能怎样想呢？

1967年7–9月，毛泽东视察大江南北时对随行的杨成武说：“我现在很不喜欢‘四个伟大’，讨嫌！”这一次，毛泽东将自己对“四个伟大”的不满情绪表达得很清晰。那下个命令不就得了吗？也没有。事涉“伟大领袖”，又涉“亲密战友”，天大的事，没有一个正式的“最高指示”，谁敢造次啊？

1968年八届十二中全会后，对刘少奇已经作了“叛徒、内奸、工贼”的决议，“文化大革命”取得

了“阶段性的伟大胜利”。于是毛泽东反对“个人崇拜”的态度才有所明朗。有一次，他交待周恩来把人民大会堂所挂的语录牌统统摘下来。当周照办以后，毛还故意当着林彪的面说：这些王八蛋的东西没有了。注9

在1970年8月的九届二中全会上，毛林分歧已经呈现在与会的党政要人面前。会后，毛泽东选择了一个微妙的时机将他对“四个伟大”的不满进一步公开表示。

12月18日，毛泽东在他的书房里接待了他的美国老朋友埃德加·斯诺，多次谈到关于“个人崇拜”和“文化大革命”的话题。

毛：现在就不同了，崇拜得过分了，搞许多形式主义。比如什么“四个伟大”，“Great Teacher, Great Leader, Great Supreme Commander, Great Helmsman”（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讨嫌！总有一天要统统去掉，只剩下一个‘Teacher’，就是教员。因为我历来是当教员的，现在还是当教员。其他的一概辞去。

斯：过去是不是有必要这样搞啊？

毛：过去这几年有必要搞点个人崇拜。现在没有必要，要降温了。

……

斯：对于人们所说的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我的理解是：必须由一位个人把国家的力量人格化。在这个时期，在“文化革命”中间，必须由毛泽东和他的教导来作为这一切的标志，直至斗争的终止。

毛：这是为了反对刘少奇。过去是为了反对蒋介石，后来是为了反对刘少奇。

1971年5月31日，经毛泽东本人审定和批准，中共中央将这次谈话纪要作为正式文件印发到“党的基层支部，口头传达至全体党员”。注10

毛泽东选择了这样的时机，用了这样的方式，让全国人民知道他对“四个伟大”讨嫌了，也就是向全国人民表示他对“亲密战友”讨嫌了。

七、结语

一、笔者认为毛泽东对林彪的讨嫌并不是由对“四个伟大”的讨嫌引起的；相反，毛泽东对“四个伟大”的讨嫌却是由对林彪的讨嫌引起的。

二、毛泽东需要“个人崇拜”的原因：

1. 享受精神上的愉悦。诚如陈毅在诗《手莫伸》中所写：“颂歌盈耳神仙乐，爱河饮尽饥若渴。”

2. 政治斗争中的工具。为了打倒刘少奇，所以他不仅容许个人崇拜，而且要制造个人崇拜，所以他批准并长期容忍了“四个伟大”。

前者是常人之人性之弱点；后者是“伟人”之所以不同于“常人”之处。

三、毛泽东对“个人崇拜”降温的原因：

1. 九大开过了，刘少奇打倒了，林彪式的“个人崇拜”已经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

2. 毛泽东一向主张“不断革命论”与“革命阶段论”，他曾这样说：“我们的革命是一个接一个的。”注11 眼下，刘少奇已经打倒了，面对军方势力的日益坐大，林彪已成尾大不掉之势，他势必要对林彪下手。于是，新的革命阶段来到了，新的革命目标也已经锁定了。

林彪是靠鼓吹“个人崇拜”起家的，对林彪式的“个人崇拜”降温，就是对这个新目标的“釜底抽薪”。

从这个意义上讲，当年“升温”是政治斗争的需要，如今“降温”也是政治斗争的需要。

四、当年毛对“个人崇拜”的“降温”，仅仅是针对林彪式的“个人崇拜”。林彪倒台后，“个人崇拜”以新的形式继续在中国大地上肆虐无忌。终毛之世，未见断绝。■

注释：

注1 阎长贵、王广宇著《问史求信集》，红旗出版社2009年10月北京第2版56页。以下简称为“阎书”。

注2 逄先知、金冲及《毛泽东传》（七十五）“支持‘红卫兵运动’”。

注3、注4，注8 阎书57页，55-58页。

注5 见于清华校友网2010年1月27日。

注6 原蜀有、邱心伟主编《清华文革亲历 史料实录 大事日志》173页。

注7 张素华：《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21人起草委员会也起波澜（6）”。

注9 逄先知、金冲及《毛泽东传》（七十八）“林彪事件”。

注10 高文谦《晚年周恩来》第五章《周旋在文革营垒的内斗之中》第三节：“毛、林交恶的根由”。

注11 毛泽东《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1958年1月。见《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349—351页。

（责任编辑 杨继绳）

我起草天津小站四清报告

○ 王 辉

小站地区在天津市的南郊，以出产小站稻闻名。小站也以出军阀闻名。1895年（光绪二十一年），袁世凯到小站接统“定武军”，扩编为新建陆军，揭开了清军编制现代化的序幕，是中国军事史的重大转折。1964年，又因一个“四清报告”得到毛泽东赏识使小站闻名全国。据我所知，这是天津解放以来得到中央批转的最重要的文件，也是影响最坏的文件。我是这个报告的起草人，同时也在小站镇参加过3个月的“四清”工作，现将这一事件记述如下。

三个“反革命集团”

1964年1月，根据中共中央部署，在全国农村地区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1月14日，天津市委召开郊区区委书记会议，部署“四清”工作，决定把南郊区所辖的小站地区（包括小站公社、北闸口公社和小站镇）列为首批试点单位。1月中下旬至2月中旬，区委派工作队先后进驻小站地区。

3月下旬，周扬来北闸口公社的西右营村蹲点，因周扬当时任中宣部副部长，河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远千里和天津市委宣传部副部长方纪也一同去蹲点，南郊区委宣传部部长陈喜荣自然也陪同参加。当时有“四进士”下西右营之说。周扬蹲点就住在西右营村党支部书记张凤琴家里。

1964年3月，在天津做调查研究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陈伯达来到小站地区，分别到西右营和小站公社、小站镇走了走，看了看，简单地听取了“四清”工作队的汇报，就断言“小站地区基层组织严重不纯，不少村子的党政领导权，落在坏人手里”。他竭力夸大敌情，说“这里的天下不是我们的”，是“反革命两面政权”，要求工作队同当地干部保持一定的距离。他直接授意在西右营村炮制了“张凤琴反革命集团”，在坨子地村炮制了“姜德玉反革命集团”，在小站镇炮制了“张玉仑反革命集团”。

张凤琴解放前当过童工，讨过饭。解放后积极参加土改运动，1952年组织了西右营村的第一个互助组，翌年又组织了西右营村第一个初级合作社。先后担任村、乡妇联主任，初级社、高级社社长及区委委员、市妇联执委等职，曾出席河北省党代会和全国妇女代表大会，多次被评为天津市农业劳动模范，1960年荣获全国三八红旗手称号。

3月26日，陈伯达来西右营了解“四清”情况，先听了工作队的汇报，然后去看周扬住地张凤琴家。陈在张家只呆了20分钟，跟张凤琴谈了一会儿话，又在屋里屋外转了转，尤其是看到了张凤琴住房的双层玻璃，发现了“问题”。原来张凤琴当时新盖了三间“穿靴戴帽”的土坯房，屋里存有一些稻谷。所谓“穿靴”，是指盖房时只在墙的底层砌有7行砖，墙壁都还是土坯的；所谓“戴帽”，就是房顶上铺一层瓦，窗户是两层玻璃。陈伯达回到工作队就武断地下结论说：“张凤琴不像贫农，她当了支部书记发了财，成了全村的首户。双层玻璃暴露了张凤琴。我看她贫农不贫、劳模不劳，是个政治化了的人物。”根据陈伯达的“指示”，驻西右营村工作队匆匆忙忙搜集了张凤琴政治上和经济上“四不清”的材料，把她确定为斗争的重点对象。罗织了莫须有的罪名，说她是“假贫农、假劳模”，“十几年来以反革命两面手法，欺上压下，骗取领导信任，取得合法地位……暗地里对抗党的政策，任用亲信，搞宗派活动，推行反革命的阶级路线，公开勾结地富分子，打击贫下中农”。

张凤琴等被打成“反革命集团”以后，陈伯达

于7月12日、7月17日、9月23日几次去西右营找工作组和积极分子谈话，鼓动批斗张凤琴。陈把矛头指向区委，说“我们要看到张凤琴有下边的根子，也有上边的根子”。他无中生有地认定张凤琴有重大贪污问题，张凤琴仅有的卖稻草的70元钱也被没收了。陈听到从张凤琴那里没有追出钱来时对工作组说：“这么多人搞一个人，才搞出70块钱来，太可怜了，这见不得人，讲不出口。秀才造反，三年不成……”他还说：“张凤琴是个顽固的石头，不大好改。不要审查材料，光看她的房子，见她一面，就知道她是什么人，是敌人还是我们的人。”“张凤琴反革命集团”88名成员中，12人被开除党籍或受到其他处分，11人被定为地主、富农分子或戴上其他帽子，4人被判刑。此外，还株连亲属138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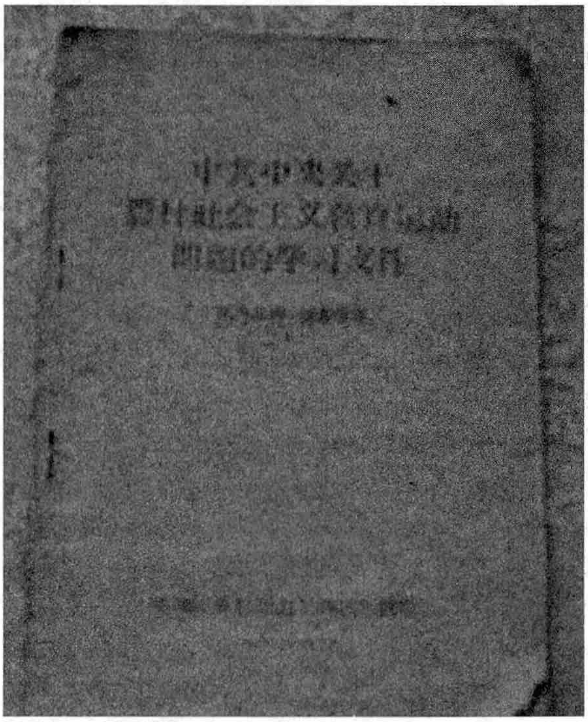
周扬去西右营短期蹲点是在3月下旬至5月下旬，以后就返京了。6月8日，周扬写了“关于西右营大队张凤琴问题的报告”，抬头是“天津市委、河北省委、华北局并报中央”，约6000余字，对张凤琴的问题也是按陈伯达给她的定性写的。

陈伯达炮制的第二个“反革命集团”就是“姜德玉反革命集团”。

解放前，姜德玉以打苇子卖钱、租种地主土地维持生活。解放后，他带头走互助合作化道路，1952年，组织农业生产合作社，曾任社长、大队党支部书记、公社副社长、党委委员、天津市政协委员等职。1954年，被评为天津市劳动模范，1956年获全国劳动模范称号，出席全国劳模大会。1958年，被选为河北省人民代表，被聘为中国科学院研究员、河北农学院教授。1959年，随河北省参观团到苏联访问。曾先后3次受到毛泽东主席接见。

姜德玉的问题，“四清”时并非是初次涉及。早在1960年，陈伯达就到过小站地区，当时曾有人向陈伯达反映姜德玉是假劳模，是地主富农，陈建议天津市委监委调查处理此事。翌年五月，陈伯达再次来这里，进一步取得了姜德玉是假劳模、富农分子的所谓“证据”。天津市委监委于1962年1月将姜德玉定为富农分子清除出党，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和所有荣誉称号。

陈伯达这次从西右营返回市区几天后，又来到了坨子地村，中午在这里吃了“忆苦饭”，又走



马观花地转了一圈，回来就发“指示”下结论，说：“姜德玉十多年来就是采取一套反革命的两面手法来维持他的统治。他披着共产党员的外衣，戴着劳模的面具，表面上积极走社会主义道路，实际上却与地富反坏勾结在一起，为反动阶级服务，对群众进行压迫剥削。”

根据陈伯达的“指示”，工作队立即把姜德玉确定为“四清”运动的重点斗争对象。“姜德玉反革命集团”77名成员中，6人被撤职，18人受到开除党籍或其他党纪处分，3人戴上投机倒把分子帽子，3人被判刑。

陈伯达在小站地区炮制的第三个反革命集团是“张玉仑反革命集团”。

小站镇党总支书记张玉仑，解放前靠扛活卖短工维持生活，解放后积极参加土地改革和农业合作化运动，成为骨干。1955年在区首届人民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人民委员会委员，还担任回民董事会会长。

1964年2月，工作队进驻小站镇。陈伯达在去坨子地之后，来到了小站镇。同前两次到西右营和坨子地一样，他只是东转转，西转转，又听了一下小站镇“四清”工作队的汇报，当场就下了断言，说小站镇党总支书记张玉仑是“出身土匪世家，是混进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还说：“张玉

仑把持的政权,是个反革命两面政权。我命令在10天之内最多半个月内撤掉张玉仑的职务,夺回政权。”在陈伯达的一手操纵下,张玉仑很快被罢了官。“四清”工作队按照陈伯达的“指示”内容,迅速给张玉仑拼凑材料,进行了残酷斗争。

工作队搜集拼凑的张玉仑的材料说:“1942年以前的20多年间,张玉仑家是土匪常来常往、落脚联系的据点。日伪时期张玉仑当过伪甲长,国民党统治时期,当过民众自卫团的班长和反共锄奸组的班长。”“张玉仑的叔叔是土匪,父亲是土匪,当过盐巡,贩卖私盐,给土匪说‘票’。”给张玉仑罗织了5条主要罪状,即隐瞒土匪家庭出身及反动历史,混入党内,篡夺了基层党的领导职务;勾结四类分子,发展反动势力;利用职权,包庇重用坏人;破坏党的政策;大搞资本主义复辟活动。说“张玉仑惯用反革命两手,伪装积极,假报成绩,骗取了区、社某些领导的信任,窃取了各种荣誉,一步步地篡夺了小站镇的领导大权”。随即,罢了张玉仑的官,清除出党。1964年12月,将张玉仑逮捕。1966年1月,以“反革命罪”判刑10年。“张玉仑反革命集团”89名成员中,9人被开除党籍,3人受到党纪处分,1人判刑。

小站地区当时参加运动的生产大队干部314名,遭受不同打击迫害的竟达258名,占82.7%。

1964年7月下旬,陈伯达通知小站地区三个点的工作队负责人到北京,编写姜德玉、张凤琴、张玉仑三个“反革命集团”材料。当时赴京的十来个人,都住在武王侯天津驻京办事处。陈伯达每天都去武王侯讨论编写材料。他们仅用一周的时间,就编造了以姜德玉、张凤琴、张玉仑为首的三个反革命集团的社会关系分布图和三个反革命头子的历史大事记。8月4日,陈伯达将“分布图”及“大事记”报送中共中央。陈伯达在给中央的信中说:“送上天津小站地区以姜德玉、张凤琴、张玉仑为首的三个反革命集团的社会关系分布图,并附这三个反革命集团头子的历史大事记各一份。这三个反革命集团的成分问题和他们的罪恶活动,群众早有所反映……但是,不论姜德玉的问题,还是张凤琴、张玉仑的问题,都只是在今年四清运动中,群众充分发动以后,才彻底暴露出来。现在运动还没有结束,他们的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还在继续清查中。主席吩咐过,这些材料可以印发到县级,供大家参考。如何处理,请中央批示。”陈还说:“除了这些图表和大事记以外,工作组还准备写一篇叙述斗争发展过程的材料,但要过些时候才能写出。写出后,当即送中央审查。”中共中央于8月12日转发了陈伯达给中央的信和所附关于天津小站地区反革命集团问题的材料,发给省委、地委、市委和县委。中央批语说:“现将陈伯达同志给中央的信和所附关于天津小站地区反革命集团的材料,印发给你们参阅。”这样就给小站地区的问题定了性。

“小站四清报告”的起草过程

陈伯达授意天津市委将小站四清夺权斗争发展过程向中央写一正式报告,当时在小站地区蹲点的天津市委书记处书记王亢之接受了这一任务。8月中旬,在一次市委常委会议上,王亢之传达了陈伯达的意见,当时指定我协助他参加起草工作。我在办公厅工作多年,包写过各种材料,但是接受这件任务则是诚惶诚恐。因为我对小站“四清”的具体情况知之不详,况且是党内“理论权威”交付的事,岂可等闲视之。

首先,我随同王亢之到三个点了解情况,先后用了两周的时间,其中在西右营村住的时间较长些。那时周扬早已回京,方纪在这里蹲点。我们都住土坯房,出门走土路,到处都是土。遇上雨天,道路泥泞不堪,行走十分困难。小院里连土茅坑都没有,上厕所都很困难。来这里岂不是受罪?不,当时是心甘情愿来锻炼的。这里的工作队有几十人,还有北京来的,有人向我介绍说,夏衍的女儿也来了。到这里锻炼什么呢?难道是锤炼整农村干部的“红心”吗?我们都住在城市带卫生间的楼房,却下来整住土坯房的农村基层干部,他们生活的小农经济离着复辟资本主义还远去啦!可是那个时代的人却那样单纯、那样虔诚。

这三个点都有强大的工作队,都写出了长篇的总结材料。我随同王亢之用了两周的时间走走看看,然后回津躲在家里起草报告。我以三个报告为基础,反复琢磨考虑工作队整理的陈伯达的谈话精神,“日间挥写夜间思”,甚至连做梦都神游到这个地方。这样用两周时间编写出了第一稿。那时候写文件都是个人单干。送王亢之

以后，他比较满意。那天上午11时他动手修改，下午、夜晚继续，直到翌日凌晨5时修改完，一气呵成。王亢之不愧是当总编辑出身，从写作技术上看，修改得甚好。他在原稿纸一侧粘贴上一张同样大小的白纸，用毛笔在上勾画、修改、增删，十分清楚。报告的题目和文中的标题修改了，观点鲜明，做了较多的修改补充，增加了部分重要内容，从文字技巧上看使报告大为增色。这个长达两万多字的文件，是我从事文字工作以来整理的最长的一篇报告，当时觉得也是领导修改得最出色的一篇报告。

报告的题目是“天津市委关于小站地区夺权斗争的报告”。第一部分是“小站地区的历史面貌”。第二部分是“四清运动以前，这里是谁家的天下？”提出“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以前这里的天下不是我们的，或者在很大程度上不是我们的”。第三部分是“这些坏人在区上有靠山”。第四部分是“工作组遇到区、社、村干部的抵制”。第五部分是“群众初步发动，革命声势不足”。第六部分是“大军压境，展开夺权斗争”。第七部分是“改组区委领导”。第八部分是“运动的重点转入清算经济问题”。最后一部分是“九点体验”。一为“集中优势兵力，打好歼灭战”。二为“工作组要旗帜鲜明，坚持三同才能取得群众信任”。三为“在斗争中组织一支坚强的阶级队伍”。四为“判明问题性质，当机立断”。五为“最大限度地分化、孤立敌人”。六为“要学会掌握运动火候”。七为“公安工作和群众运动相结合，开展斗争”。八为“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不断地训练队伍，学好基本功，取得社会主义革命的经验”。九为“一边抓运动，一边抓建设，以阶级斗争为纲，促进生产和其他工作”。

看到这里可能有人会问：“你写材料难道完全没有自我判断能力吗？这难道都是你想说的话吗？”这有两方面的原因：其一，那时自己对党的路线、政策还是深信不疑的，对开展“四清”运动是积极拥护和支持的；其二，作为我们这样的“写手”，历来是不允许离经叛道的，无论写什么必须按照上级的意图，即使有不同的看法也不得越出一点，哪怕你是身负重要责任的官员。中共十分强调和党中央在思想上、行动上保持高度一致，盖出于此。

这个报告改好后即送印刷厂排出小样，我改一遍，王亢之修改一遍，还请方纪修改过。这样反复修改了几遍，已经到了9月中旬。听说陈伯达要来审稿，重新改排成向中央报告的四号字文件。9月20日，那天正逢中秋节，又是星期日，王亢之让司机找我到他家，告诉我陈伯达昨晚来津一事。他说：“老夫子(那时党内对陈伯达的习惯尊称)看了这个报告稿，认为基本上可以，又提出一些意见……”还说：“老夫子今年60岁了，连夜看稿，今天这个中秋节你也别休息了。”我说“当然，我今天就改出来”。陈对整个报告结构没有提出什么意见，对于其中讲到的一些问题提出一些看法，如说集团的一般成员，要争取他们坦白交代，促使他们“迷途知返”等等，还提出一些文字修改意见。

我们根据陈伯达的意见作了修改以后，提交市委常委会议讨论。既然“老夫子”都过了目，市委讨论时只对个别文字提了点意见，顺利通过，于9月25日以市委名义上报中央。

10月24日，中央发出了《中央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夺权斗争问题的指示》，副题是《转发天津市委关于小站地区夺权斗争的报告》。中央的指示是刘少奇亲自起草，毛泽东签发的。“指示”首先说：“现将天津市委关于小站地区夺权斗争的报告转发给你们，请转发给县以上各级党委和社会主义教育工作队队员阅读。这个报告总结出来的经验是好的。”“指示”分析了小站地区夺权斗争的做法之后说：“小站地区的敌我矛盾，主要在形式上是以人民内部矛盾，甚至是以党内矛盾出现的，这就迷惑了一些人，并且长期得不到解决，对党和人民造成的损失也很大。但是当地的多数群众是清楚的。只有我们党脱离了当地多数群众的情况下，这些敌人的阴谋才能得逞。当着我们党同当地多数群众结合起来了，这些敌人就立即被揭露，并且受到了失败。由此可以看到，当前我们国内的敌我矛盾有一部分在形式上是以人民内部矛盾出现的，甚至是以党内矛盾出现的。敌我矛盾同人民内部矛盾、同党内矛盾交织在一起。在大量的人民内部矛盾和党内矛盾中，包含着一部分很危险的敌我矛盾。必须把这一部分敌我矛盾清查出来。当前阶级斗争的复杂性就在这里。但是，只要我们认真对待，负责干部下去认真蹲点，注意了当前阶级斗争的这个

"四清"中，群众批判"四不清"干部

出不同意见呢？这些都是发人深思的。

这场浩劫的发生，离不开当时的政治背景和社会背景，特别是离不开毛泽东关于阶级斗争的新看法。伴随着从五十年代末到六十年代初的一系列重大事件，毛泽东对社会主义发展规律的认识，发生了自"反右"、"大跃进"以来的一个

特点，提高了警惕性，又充分地发动了群众，这一部分隐藏在人民内部的党内的敌我矛盾，是能够清查出来的，并且也不是很难清查出来的……凡是被敌人操纵或篡夺了领导权的地方，被蜕化变质分子把持了领导权的地方，都必须进行夺权斗争，否则，要犯严重的错误。"

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中央发了"前十条"、"后十条"等一系列文件。薄一波后来在《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中说："这些文件的下发，进一步促使了运动中'左'倾错误的发展。其中影响最大的是'桃园经验'和天津小站地区'经验'。""这个指示和小站'经验'的下发，更加助长了当时已经盛行的夺权风，重复了土改中'搬石头'的错误，即把广大基层干部一脚踢开的错误。"

这个报告的重点是夺权，这个报告经刘少奇起草中央指示、毛泽东签发后，在全国掀起了夺权运动，成为文革夺权的预演。

"四清"夺权探源

小站地区这场浩劫是陈伯达一手炮制的。陈伯达当年不过是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又没有在第一线担任要职，他为什么不在北京养尊处优，而不辞辛劳地多次跑来天津呢？张凤琴、姜德玉、张玉仑都是农村基层干部，与他毫不相干，他为什么抓住不放，硬是把他们打成三个"反革命集团"呢？为什么当时市委有关领导人那么尽心竭力地执行他的指示呢？为什么几百个工作队员都那么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没有一个人提

重大转变和突破。

第一，毛泽东关心的领域已经从经济转向文化，从建设转向政权，从经济增长的统计数字转向国家和社会发展的根本方向。"大跃进"和"四清"运动有很大的区别。前者的重点主要是单纯的经济建设领域，后者是在大是大非的方向问题上防止走向苏联、南斯拉夫的修正主义道路。

第二，所注重的斗争对象也从党外转移到党内。毛泽东认定出现了一个党内的资产阶级，四清运动的内容渐渐地从经济领域转移到政治和文化领域，最后直指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第三，与五十年代比较而言，毛泽东进入六十年代后对社会主义"和平长入"共产主义的前景是很不乐观的。毛泽东说："无产阶级得到政权，还可能丧失政权。""不是一代人两代人就可以解决的。"

1963年5月9日，毛泽东对浙江省七个材料的批语，明确提出如果不搞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试验，那就不要很长时间，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1964年6月8日，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谈到防止修正主义的问题时说，现在世界上有两种共产党。一种是真的，一种是假的。刘少奇插话说：苏联，一个是这次出修正主义，一个是十月革命，都有伟大的国际意义。我们要想一想，我们将来会不会出修正主义呢？不注意，一定会出。毛泽东说，已经出了嘛！像白银厂，陈伯达调查的小站公社不是已经有了嘛。周恩来、彭真介绍了不少下面被敌人掌握政权的情况。毛泽东接着说：我看，我们这个国家有

三分之一的权力不拿在我们手里，掌握在敌人手里。刘少奇说：现在下边发生的问题就是不追上边，恰恰问题就出在上边。抚宁县的农民说，不仅下面有根子，上边也有根子，朝里有人好做官。这句话引起我的注意。你看，小站地区的问题已经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被列为全国修正主义的典型，这怎么得了？

陈伯达在小站地区炮制“反革命集团”的活动之所以畅行无阻，还由于他的特殊身份。他不仅是中央领导人，还是毛泽东身边的人，是党内名列前茅的“大秀才”。只因为他来小站“蹲点”，毛泽东几次讲话又提到小站问题。他的“指示”够得上“一言九鼎”，岂能忽视？记得当时只有长期在农村工作、了解张凤琴等人的原南郊区委书记刘晋峰、宣传部长陈喜荣、农村工作部长于荫田等人有不同看法，正因为如此，刘晋峰等被陈伯达视为“反革命集团”上面的靠山。在中央转发陈伯达给中央的信中，所报三个“反革命集团”的社会关系分布图，已经把刘晋峰等人作为上边的“根子”都列上了。陈伯达指令市委改组南郊区委，谁能阻挡？陈伯达提出让王亢之兼任区委书记，王亢之不同意，市委才另选派他人。事实很明显，陈伯达抓小站地区三个“反革命集团”，是为了进一步证实毛泽东关于“三分之一政权不在我们手里”论断的正确。陈伯达过去在中央没有担任过行政实职，下来只是做调查研究，处处以“小小老百姓”自居。早在1957年下半年，他来天津到市委机关大楼一楼，竟要市委书记黄火青陪他到各个办公室看看，当时我和同事王左正在办公室，陈和我们一一握手，令我“受宠若惊”。这次他在小站地区可不是只说不做了，而是真正做了，“小小老百姓”也发号施令，亲手抓出三个“反革命集团”，以此向毛主席邀功。陈伯达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的积极活动以及抓“小站经验”的所作所为，实际上为他在1966年获取“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的要职做了铺垫。

有一首流行歌词唱道：“我是一个戏子，我说的都是别人的言语。”记得过去我听后心底常漾起一种莫名的感觉，不由默默地叨咕：“我是一个文字匠，我写的都是别人的思想。”当年我编写“小站报告”就是如此。当我构思今天这篇文章时，不仅想到这场浩劫的过程及其前因后果，还想到当年参加“四清”工作队的许许多多的人。那时小站镇工作队有150人（全镇人口11000人）、西右营工作队26人（全村人口1100人）、坨子地工作队25人（全村人口490人），工作队的人数分别为各地人口的1.5%、2.5%、5%左右（参加锻炼的学生未计算在内）。我对工作队中的许多人特别是领导人都是比较熟识的。例如方纪，他是“一二·九”时代在北京大学参加革命的老同志，也是“老延安”，又是才华横溢的大作家，是令我十分敬佩的。可是历史竟如此诡谲，当时谁能料到两年后又爆发了一场席卷全国的夺权狂飙——文化大革命。多数领导人都经受了类似张凤琴、姜德玉、张玉仑的遭遇，方纪竟被迫害致残。市委书记处书记王亢之也是“一二·九”时代参加革命的老同志，他从1956年起担任市委书记处书记，分管意识形态方面以及文教工作。由于陈伯达多次来天津，他与陈在工作上联系比较多，对这个党内“理论权威”自然也是很崇敬的。历史的偶然又把他推到小站地区“四清”蹲点的岗位上，实事求是地说，他执行陈伯达的“指示”是很认真的；同样实事求是地说，他这个人并不“左”。他关心和爱护干部，不整人，讲友情，是有口皆碑的。正由于王亢之为人光明磊落，他在文革初期，1968年3月1日被迫害致死。在党内斗争中，每个人几乎都徘徊在两个相反立场之间。一位老同志离休后曾私下叹喟道：“我参加革命几十年，不是整人就是防止被人整。”这种情况如果不是亲身经历，是很难理解那个年代复杂的政治斗争的。■

（作者为天津社会科学院名誉院长）

（责任编辑　杨继绳）

本刊调价启事

尊敬的读者：

感谢您对《炎黄春秋》杂志的支持和钟爱。为缓解不断上涨的成本压力，自2014年起，《炎黄春秋》杂志每期定价调为10元，全年120元。希望您理解并继续支持《炎黄春秋》。

炎黄春秋杂志社

2013年8月16日

郑思群之死和重庆八一五运动

○ 周孜仁

郑思群，广东潮汕人，早年留学日本并参加中共，曾任著名马列主义哲学家艾思奇秘书，抗战期间在延安任“抗大”某分校教务长，解放后则一直任重庆大学校长兼党委书记。行政七级干部。

1966年6月21日，郑以莫须有的罪名被重庆市委正式点名批判，市委工作组对其进行了多次内部批判围攻之后，于7月19日将郑押赴松林坡隔离。时值山城酷暑，路地焦烫灼人，据目睹现场的同学说，老头乱发覆额，形容憔悴，被人押解赤足而行。10天后，即7月30日，工作组公布郑的“十大罪状”并正式划定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再3日后，即8月2日凌晨5时，郑在监护地用半片剃须刀割喉自尽，颈动脉血喷如注。事发，工作组匆匆清洗现场，殓尸火化；再次日，即8月3日，重庆市委宣布郑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将其开除党籍。是日晚，工作组紧急召开全校师生大会，由市委副书记鲁大东亲自到场宣布该决定并强令师生批判之。

第二日，校园内就出现了大字报，质疑市委并公然为郑思群鸣不平。重大校园里压抑既久的愤懑之情如水之决堤，一发而不可收。

又11天，即8月15日，重庆大学便爆发了轰动全川的“815事件”，并由此而在云诡波谲的四川文革舞台演绎了长达数年的政治闹剧。

1966年的中国夏天是令人激动又让人心悸的。数不清的“红卫兵”、“造反派”因为反对校领导、因为打倒老师和“学术权威”而在全国各个角落呼啸而出。而为一个冤死的大学校长鸣不平并起而造反，重庆大学的“815行动”，是一个特例。

笔者作为该事件的目击者和参与者，以为有必要把这段历史记下来。

郑思群之死是815事件的导火线

文革肇起，其势汹汹，要打倒这样横扫那样，西南局和重庆市委不主动揪出一两个“黑帮”批判打倒，何以交差？郑思群孤高自傲，很不合群，且又在无碍政局的教育部门为官，抛出他来确属轻而易举。

但是，1966年重庆大学的热血青年们对共产党崇拜备至，对共产党的干部崇拜备至：尤其郑思群。这位身居高位的老人对年轻娃娃平易得异乎寻常，对学生嘘寒问暖，和老父亲一样和蔼可亲。上课时，同学们常常会看见他悄悄坐在后排听讲，到食堂巡视，他甚至当着学生的面，把掉在桶边的饭粒儿从地上捡起来吃掉。电机系六七级有位同学叫郑志胜，家穷，没钱买鞋,就赤脚去上课,正好遇上校长了，校长问他为何不穿鞋？问他在哪个系？哪个班？第二天校长秘书给他送来一双崭新的解放鞋。文革中，郑志胜因文革中多起血案牵连而被监禁十余年，出狱后两鬓斑白，万念俱灰。我曾问他：当年，你何以要如此铁心死保郑思群？如此狠心毒打市委工作组长余跃泽？并最后参加815造反？他眼神木讷，沉思良久，极其认真地回答：“就为了那一双鞋呀！”

郑思群在少不更事的娃娃心目中既然创造了如此形象，他的冤枉和屈死对大学生的神经中枢将会带来难以承受的刺激和反应，就不足为怪了。

从617到619

重庆大学的文革和全国同步。以1966年6月1日北京大学聂元梓的大字报为发端，全校“停课闹革命”，半月多混乱愈演愈烈。6月17日这天黄昏，正当学生们在校园热热闹闹张贴大字报，批判北京的“三家村”和与之对应的本校意识形态主管：校党委宣传部长邓时泽及团委书记刘稚民，学生三宿舍门前突然出现了一张耸人听闻的大字报《以郑思群为首的校党委是一个反党反

社会主义的大黑帮》,文章既出,很快便被惊诧万分的学生围得水泄不通。大字报的作者之一、冶金系四年级学生佘国华,趁机跳上三舍前一棵榕树的石台上大发演讲,重复大字报上那几条捕风捉影的疑问,反复号召大家对“郑思群黑帮”,要“狠狠地打!狠狠地打!”佘,四川遂宁人,大学毕业后分配四川乐山大渡河钢厂,后官至该市市长、四川省经委主任。据和他共过事的同学说,几十年官宦生涯,权力所及,他对校友们很够义气的,包括文革当年反对过他的同学。

文革开始以来,这个第一次把校园搅得如此热闹的事件,叫做“617事件”。

“617事件”很快就露出了许多破绽,佘国华当晚即被前来走访的同学追问得无以对答,只能无可奈何地搪塞道,48小时之内,保证向大家公布郑“黑帮”的“钢鞭材料”。其次,有人发现,大字报的五个作者,全是校团委和校学生会的干部,于是人们开始怀疑:这篇大字报的出现,是不是宣传部长邓时泽及团委书记刘稚民“金蝉脱壳”?为了保自己而让佘国华等人写出该大字报以将祸水他引?

最先提出疑问的恰恰是佘国华的中学同学、后来815风潮的主要发起人吴庆举。吴也是遂宁人,机械系四年级学生、时任校文工团乐队队长。重庆大学党委宣传部非常重视文体工作,故而让各系各班的文工团员和体育队员全部集中居住。6月17日晚,吴庆举到冶金系宿舍质询佘国华归来已是深夜。他满面潮红敲开我的门,当时我在美术队任队长,与吴隔壁而居,吴告我说大字报肯定是个大阴谋。他说等到48小时拿不出东西,我们必须起而揭露之。他的分析让我佩服无疑,便起草了一则大字报稿,题目是:《千万,千万,千万警惕更大的阴谋》。

对于吴庆举和我,6月18日是非常漫长的一天。我们跃跃欲试,急于向全校同学公布我们的新发现,可我们又必须等待48小时的到来。更要命的是:佘国华的大字报事实上已经把大学生们革命的歇斯底里触发起来,整个学校躁动不安。月初,市委曾派有一象征性的工作组进校“协助校党委领导文化大革命运动”,6月18日当天中午,为稳定局势,市委急急忙忙宣布直接由工作组代行党委职权。此举顿时让舆论大哗。是日晚,无线电系学生在一教学楼前自发集会,宣布校党委和工作组一样,通通都是黑帮,必须通通打倒、赶走,由学生自己闹革命。于是数千人在校内连夜示威游行,汹涌澎湃几至天明。

那一晚,我、吴以及文工团和我们观点一致的学生也通宵未眠。我们看见无线电系的同学在宿舍外喧嚣而过,心情极其复杂紧张。佘国华承诺的48小时早已过去,他的“钢鞭材料”显然是子虚乌有了。但是,如果我们在目前气氛下贴出大字报为郑开脱,显然是逆流而动。游行队伍在校园里汹涌澎湃,我们却秘密地拿着那份“警惕更大阴谋”的大字报征集签名,后来在四川理工大学担任教授的美术队队员代玉松自告奋勇,主动回到他所在的电机系宿舍挨户敲门,像地下工作者一样宣传观点,寻找同志。代,四川成都人,忠厚本分,口齿木讷,但那一晚他竟然很快为我们征集到几十个同盟者,使人对他刮目相看,也使我们信心大增。天将破晓,我们壮着胆将大字报贴上一块木板,然后横架于九舍和二、三舍之间的路的正中,这是学生们吃早餐必经之地。我们躲在房内窥视动静。

不久曙色放明,打早餐的同学果然很快聚集在木板前叽叽喳喳,不少人还当场取出钢笔批注:“坚决支持你们的观点!”“我们受骗了!”“找佘国华算账去!”我们于是终以胜利者的身份从宿舍里走出来,在大字报前得意洋洋公开了自己的观点。

整个学校局面又转向了。被嘲弄了的同学再次纷纷走访佘国华,冶金系那一间斗室再次成了整个大学的新闻热点,佘国华却逃遁了。

既然大家已经认同倒郑事件是宣传部和校团委合谋的一桩诡计,当然是大家重新回过头来,继续对邓时泽和刘稚民进行“革命大批判”。当时,我刚好以优异成绩作完毕业设计,心中曾经窃想:这下好了,等到邓、刘倒台,重大的文革就该胜利结束,我们也就该桃飞李散,到社会主义的建设岗位去报效祖国了。

我根本不知道,动乱才刚刚开始呢。

市委引火烧了自身

6月21日,《重庆日报》头版头条刊登了重庆

市委关于让郑思群停职检查并派工作组进驻重大的决定。22日，以副市长余跃泽为首的高规格工作组开赴重大。余在全校大会上发表演说，声称这次他到重大，就是来支持革命师生，来揪“郑思群黑帮”摸“郑老虎”屁股的。

余的表态把学生们再次搞懵了。不是才弄明白所谓“郑思群黑帮”是某些人的阴谋吗？为什么工作组偏偏跟着起哄？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一切结论只能产生于调查研究之后。市委工作组下车伊始，什么情况都没有调查，为什么就匆匆忙忙宣布郑思群是“黑帮”，这中间莫非又有什么阴谋？于是，质问《重庆日报》和工作组的大字报再次蜂拥而至。在报纸上表态拥护市委决定的“左派”学生（这些学生后来一直成了工作组倒郑的中坚分子）受到普遍奚落。

工作组一再要求学生们把斗争矛头对准校、系两级领导，而到现在为止，学生们的矛头偏偏对准了市委及其工作组本身了。工作组员按照一贯的经典做法，他们开始在学生中“发展左派，团结中间派，孤立右派”。7月4日，余组长召开全校团干部及“左派”学生的秘密大会，再次重申必须集中火力对准校系两级干部，同时大义凛然地宣布：重庆市委是高举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坚强堡垒，书记任白戈是坚强的马列主义者，是经过考验的好班长！任何怀疑都是错误的！

7月6日，全国各地党报同时转载《红旗》杂志署名文章《“国防文学”是王明机会主义的口号》。文章在两条注释中定义：任白戈是“大黑帮”周扬的“另一个追随者”。毫无疑问，这篇文章对感觉良好的重庆市委不啻是当头棒喝，同时也是对“一小撮右派学生”的极大鼓舞。反郑和反市委两种政治力量的对比再度出现新的平衡。要想速战速决，把大学生们发动起来大张旗鼓“批郑”显然已经不再可能。工作组只好退而求其次，一边继续依靠左派学生向右派学生施压，一边组织最可靠的精兵强将对郑思群实施闭门批斗，轮番围攻。

客观地说，文化大革命到底要干什么？老于世故的市委领导和年幼无知的学生娃娃一样，都是一群白痴。毛泽东在武汉畅游了一番长江之后回到北京，次日，7月19日便指出派工作组是错误的，说运动搞得冷冷清清，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接下来，毛听汇报、发指示，给清华附中红卫兵写信支持造反，甚至直接写大字报，指责“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7月29日，北京“新市委”在人民大会堂召开首都大专院校和中学文革积极分子大会，正式传达毛指示：撤消工作组。刘少奇说自己是“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革命怎么革？我老老实实回答你们，我诚心地回答你们：我也不晓得。我想中央其他许多同志也不晓得”。

山雨欲来，重庆市委应该有感觉了，他们显然想抓紧时间给自己的工作组打一个完美的句号，然后体体面面打道回府。对郑的迫害开始提速。其时，郑已被押赴松林坡顶原苏联专家招待所看管，日日由左派学生批斗，行前全身被搜，赤足而行，仅容带《毛选》一册。郑恰恰将半片剃须刀夹带其间，上山了。

28日，工作组正式公布《关于郑思群同志的材料（初稿）》的审查材料，发全校革命师生批判。该材料为郑罗织了“反党反社会主义十大罪状”。捕风捉影的材料又在学生中遭到质疑。只是满校高压，已没有多少人敢发杂音了。

郑思群是8月2日晨5时自杀的。学生们得到消息已是晚饭时分,采矿系同学李远旭冲进我们寝室大呼:“郑校长自杀啦!”全室顿然惊骇,同学们当即将碗盘一砸,或慨然无言,或仰天长叹,甚至掩面痛哭……那一夜我通宵无眠,待同学们酣然入睡,我独个儿激愤难平,匆匆给西南局及书记李井泉写了一封状告重庆市委及工作组的信。

第二天,我一人上街,把信付了邮。

这已是8月3日的事情。那天校园里特别清静,有点暴风雨前的感觉,整个学校都停了摆。重庆市委仿照北京规模,在市中心人民大礼堂召开全市大专院校和中学文革积极分子大会,正式传达毛的指示,还有刘少奇关于“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等讲话。果然,闪电很快挟狂风骤至,开会的代表还没有回来,消息先到学校了。

午饭刚过,火炉山城毒日当头,我们美术队几位学生憋不住激情如沸,全都跑去宿舍前的马路地上写标语,就四句话:“拥护党中央,拥护毛主席,赶走工作组,自己闹革命。”

标语的轰动效应没维持多久。开会代表回校,所有谜底便已揭晓。重大的文革故事应该翻到新的一页了,只是固执的工作组,拿当时流行的话说,还不想轻易退出历史舞台。这场莫名其妙的斗争注定还要演下去,而且愈演愈烈。

815风潮山雨欲来

8月3日晚,吴庆举非常着急地找到我,问:“你那封信的底稿还在吗?”我说在。他说行,“时机成熟了。抄成大字报,公布出去”!

大字报题目是:《就郑思群自杀事件给西南局、李政委的一封信》,由吴和我联合署名。文章张贴出去已过熄灯时分。学生们闻讯从四面八方赶来,兴致勃勃地用手电筒照看、议论。第二天一早起床,二舍和九舍之间的路边已一字排开体育队好几份响应文章。其中一篇的标题我还记得清楚:“我们要怒吼一声:郑思群事件必须重审!”接下来,各系各班的大字报也如潮再起,直扑工作组。

市委马上还以颜色。当晚,工作组紧急召开全校声讨大会,由市委代书记鲁大东代表市委宣布开除郑思群党籍,接下来将所有学生领回各自班级强行表态。同时连夜组织“左派”学生赶写拥护市委决定的大字报。

有好事者从松林坡现场侦察回来,突然爆出一大堆只有福尔摩斯才能够解答的疑团,推论是:郑思群不是自杀,而是他杀!罪魁祸首不可能是别人,只能是工作组!

于是同学们纷纷涌向松林坡,在专家招待所附近的墙壁、草坪和石阶上到处查找疑点,有人爬上围墙,说是发现了血迹,于是把长满青苔的砖头撬出来,用报纸小心翼翼包好,准备送北京交党中央备查。正是大伙儿在松林坡钻头觅缝搜索工作组实施谋杀计划的蛛丝马迹时,8日下午,我和采矿系学生蔡增其秘密潜去市委党校走访了郑思群夫人、该校副校长吴耕书。秘书把我们领进她的办公室,吴非常谨慎地把门窗严闭,这才开始同我们对话。我首先出示了郑思群“十大罪状”的抄写件并自报家门,迫不及待地说明我们的观点及同学们保郑的决心。年轻人的幼稚和真诚显然把老太太征服了,那天下午,她向两个素昧平生的不速之客说了许多在当时看来十分危险的话。这些话如被告发,她的政治前途将十分可怕。

我们当然希望她能证实他的丈夫死于谋杀,因为工作组公布的材料中曾提到:将郑押赴松林坡隔离前,曾让他们夫妻有过一夜团聚。而8月2日上午,工作组通知吴回校告别丈夫遗体,却被吴明确拒绝。我们以为,老太太对郑的死因一定有足够的判断依据。不料老太太非常肯定地回答,听工作组通知郑自杀身亡,她就毫不怀疑事情的真实性。“我相信他肯定是自杀了。”她说。

这个武断的结论令我们大失所望。不用再追问,她很坦白地告诉我们,和郑诀别那一夜,他俩都彻夜未眠。郑对她发了很多牢骚。郑说他把政治看透了。郑说彭德怀、黄克诚这样战功赫赫的人都要批就批要整就整,我算得了什么?活着还有什么意义?他还说了苏联对斯大林焚尸扬灰和其他一些党史上让人齿寒的、我们这两个刚刚走进政治幼儿园的大学生听闻或不曾听闻的故事。末了,她劝我们:你们还年轻,政治斗争复杂得很呢!你们就少过问吧。那些日子,大学生目空一切,头脑发热,以天下事为己任,可面对老太太此番惊世骇俗的教导,竟无话可说。我和

蔡相约:为了保护老太太,也不至于给学校里对工作组的斗争带来影响,我们把对吴耕书的访问以及她的谈话瞒下来——一瞒就瞒了几十年,直到现在:我们自己都已年迈。

事实上,运动到了那一步,郑是自杀还是谋杀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仇恨已被激化,狂热已被点燃。8月8日晚,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十六条)在广播里宣布,校园一片欢呼。更大的动乱正式开始了。原来,市委曾通知工作组于8月5日晚24时撤除,后不知何故又宣布无休止延期,只是将办公地从党委小楼撤到七教学楼,致使七教学楼又遭到学生们好些天的奚落和围攻。十六条公布当天下午4时,工作组却悄然遁走,撤了个精光。

学校已成权力真空。学生们感到从来没有过的痛快和自由。他们可以大闹天宫了。

清华附中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一论""再论""三论"的传单在校园里四处挥洒,造反歌大行其道。批判邓时泽和刘稚民的文章当然要继续做下去,只是他们已经毫无还手之力。更重要的是,工作组及其后台重庆市委,他们有那么多极具刺激性的事情等待学生们去凑热闹哩。而要解决市委的问题,单单靠重大一个学校显然不行。于是6月18日晚上无线电系彻夜游行时提出过的命题重新被提出来,那就是:杀出校门,打向社会!毛泽东不是教导过吗:青年学生不和工农大众相结合,只会一事无成。

12日晚上,吴庆举又找到我,商量到外校串连的事。重庆的大专院校,离重大最近的是建工学院,当然该第一个去串联。于是定下来,让我连夜起草一份大字报。大字报摘要如下:

在这些日子里,我们多么幸福,多么振奋啊!

我们最最敬爱的党中央公布了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制定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纲领,我们最最敬爱的毛主席在首都会见了革命群众……

在毛泽东思想阳光照耀下,目前,我们学校"万马齐喑"的局面打破了!敢于革命、敢于斗争的同志们站出来了!千万张大字报,像狂暴的旋风、怒吼的排炮,在揪出学校牛鬼蛇神,深入揭发校系两级的同时,对于以余跃泽为首的市委工作组一月多来的许许多多违反毛泽东思想的错误言行,对于三十年代周扬的积极追随者任白戈在六十年代兜售的大连黑货,对于《重庆日报》1962年纷纷出笼的大批毒草,进行了无情的轰击和严肃的批判。

要革命!!要造反!!那就顾不上几个坛坛罐罐。老一辈打天下,抛头颅,洒热血,咱今天为无产阶级保江山,就要敢于迎困难、担风险!有毛主席领路,有共产党撑腰,还怕什么?!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他们并没有什么了不得的力量。在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面前,他们越抵抗,他们就只能完蛋得更快!失败得更惨!是革命的海燕就要敢于顶风冒雨展翅高飞!是孬种,是混蛋,就钻进你那个人主义的蜗壳里去吧!……

……不管你是谁,不管你有多高职务,多大的权威,多老的资格,只要你反对毛泽东思想,我们都要批判!都要打倒!!毫不留情!!!一个都不例外!!!

8月12日吃毕早饭,大字报就由戏剧队、舞蹈队和美术队的一些热心分子拿去铺在三舍门前的路上征集签名。大字报后的空白处签满了,又接一张纸继续签,足有百米以上,签字的人数很快上升至数千。

于是有人提议:让乐队的同学把铜管乐器统统拿去广场耀武扬威地吹起来!所有签名的人一齐开出去!

几千学生很快就举着毛的画像和语录牌从四面八方涌来,按系按班整齐有序地排好了队伍,开进了建工学院的校园。

建院毫不设防,该院的工作组还把学生全关在房间里学文件。对这一帮天外来客般的不速之徒,循规蹈矩的学生只敢把头伸出窗外去偷窥片刻,作一番无奈的感叹。重大学生在兄弟学院顺顺当当走了一圈,只在建院广场草草举行个仪式,自拉自唱地把公开信念一通,便得意洋洋地打道回府了。回得重大,余兴未尽,顺手捎带又把邓时泽、刘稚民无辜地带一回高帽游一回街侮辱一番,串联行动胜利结束。

这就是所谓的重庆813革命行动,815行动的预演。需要补充的是,事件当天下午,在文工团戏剧队的房间里,由吴庆举召集了一个总结会,各系都派代表参加了。笔者还记得的,体育队有周家喻,冶金系有熊代富、查正礼。这几个人,后来便成了声名显赫的815战斗团的主要领袖人物。

815事件记略

813当天晚上，建院一个叫何德林的学生潜来重大对我们表示感谢还要我们帮忙转交告状材料，好像我们这么一闹，就已经升格为党中央代言人。第二天，重庆师范专科学校干脆来了一帮。他们自称是该校惨遭党委压制的两个战斗队“排炮”和“轻骑”的代表，要求我们声援。我和吴庆举是在九舍门外的地坝里和他们进行座谈的。对方为首的唐忠明是该校中文系学生，口才极好，后来成了该校造反派的一号领袖。座谈会后吴马上把前一天总结会的各系代表约来文工团议事。有813经验，搞这种活动应该是轻车熟路了，很快制定好第二天行动计划，然后便各自回系分头行事。

我的任务是去师专和校当局联络，安排场地茶水诸项事宜。接待我们的是一位女士，是师专“文革领导小组”的组长。女强人态度强硬，拒不接待，我方胡搅蛮缠，吵架至深夜，最后不欢而散。回校后接着抄写大字报、印传单，又把那份后来被称为“轰动山城第一炮”的“公开信”抄写一遍，事毕已东方既白。

待中午一觉醒来，发现同学一个都没回来，知道出事了。匆匆赶去师专，没进门，就觉情景不祥。原来，对方既已知道我们将前往闹事，也连夜作好准备。学校大门口的马路上，用石灰水写满杀气腾腾的大标语：“我们不要救世主！”“重大一小撮右派滚回去！”“誓死捍卫党的绝对领导！”云云。校园内更是喧声如沸，混乱非凡。操场中间红旗标语乱摇一片，重大学生窜动其中，歌声吼声雷涌瀑响。场地四周则全站满师专的学生和不知哪儿请来的工人，一派虎视眈眈，冲突随时有一触即发之势。山城八月，气温达38摄氏度。大家在烈日暴晒下对峙数小时而毫无退意，现在想来，仍让人欷嘘！

先是，师专曾企图阻止闹事学生入校，可毕竟重大人多势众，阻止不得，只好退守回去，围在操场四周起哄，并多约些工人前来助威。我开我的会，你起你的哄，本也可相安无事，后来就出了一件小事：那时候，双方本来就都想寻事，任何一点火星都足以惹得大火燎原，这小事情自然马上就闹成大冲突了。情况是：操场前面一幢办公楼正在修缮，重大学生就想把毛主席像挂上楼前的脚手架，师专方当然反对，施工工人遂被人驱前阻止，于是冲突开始发生，双方的争辩对骂很快提升到对毛主席、对毛泽东思想、对文化大革命的政治感情、政治立场的高度。攻击愈演愈盛而显然不可能有结果，当天下午，闹事学生派出由张洪济为代表的多批代表进城请愿，张系动力系研究生，做事风风火火，胆大心细。市委人员以礼相待，客客气气让学生代表坐在大厅休闲，还请吃馒头喝开水之类，只是领导坚辞不出。事情就一直僵持下来了。这就是我赶去师专时发生的情况。

事情一直到晚上，双方学生还不依不饶。已是下班时间，前来看热闹的工人和市民如赶庙会，越聚越多，如果市委不解决，局面将更难收拾。市委副书记辛易之临危受命，硬着头皮来了。重大学生当然要他宣布这是革命行动，师专当局当然要他表态为反革命行动。事实是：文化大革命到底要干什么，市委副书记当时也绝对蒙在鼓里，他能表什么态？装聋作哑顶牛顶了几个小时，顶得重大的学生们实在没耐心了，行动只好无果而终，各自打道回府。

队伍撤回学校已是深夜，而重庆大学却无人入睡。《辛易之是屠杀群众运动的刽子手》《打倒重庆市委！》之类的大字报，从那一夜开始，就开始向偌大山城，铺天盖地地蔓延而去。其后十年，重庆再无宁日了。■

（作者简介：重庆大学电机系1966届毕业生。高级工程师。现任云南老年网络大学校长）

（责任编辑　杨继绳）

本刊启事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及相关规定，结合我刊的实际情况，凡向本刊投稿，即视为作者将作品的数字化处理权、网络传播权、电子发行权、无线增值业务权授予本刊，同意本刊将以上权利转授予与本刊合作的第三方使用，稿件采用后即自动获得上述授权。本刊向作者支付的稿酬已包括上述使用方式的稿酬。如作者对上述处理有不同意见，请在来稿中声明，本刊将作适当处理。

炎黄春秋杂志社

临桂县的“群众专政”

○　屈锡信

文革期间，我在广西临桂县五通中学任教。在广西桂林地区，特别是临桂县，“群众专政”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当时的人们真真切切见证了它的发生、发展和结局。

我所亲见的“群众专政”大致有三种模式。

第一种模式最完整，分成三步：1. 先开批斗会。发动群众揭发，列举被斗者的罪名，高呼口号“打倒×××！”一进入高潮，主持人或一名好事者会在台上大喊：“×××老实不老实？”台下只有唯一的答案：“不老实！”“不老实怎么办？”“枪毙！”这时只要有三五个声音就足够了，并不需要在场者举手表决，更没有什么简单多数的判决。2. 执行枪决。3. 出告示。告示一般由“秀才”执笔，仿照法院判决书，结尾总是：“经人民法庭判决”，“经群众表决一致通过”，“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等等，大印是没有的，红勾红叉却少不了。这张大字报往墙上一贴，就全部完事了。

第二种模式较简化，省略第一步。

第三种模式更简化，也更普遍，只剩下处决一步，连罪名也无须劳神罗织。

未经历文革大乱的人们，往往对当时的乱杀人难以置信，善良而尚具正常思维的人会对这类回忆提出质疑。笔者将这类质疑总结为如下三问，并试作回答。

一问：直接将人处死就是“专政”吗？那么当时没有法院、监狱、劳改吗？

答：别忘了当时的时代背景，文革初公、检、法已被彻底“砸烂”，“群众专政”成为最高法庭。

二问：人命关天，难道当时就没有申报审批手续吗？就这么草率处置了吗？

答：当时根本不存在审批手续，人们心中完全没有法律的概念，对组织机构也没有敬畏。

三问：被处决的人到底犯什么法？犯什么罪？怎么也得拿出证据，有个说法才杀人的吧？

答：谁敢跟他们要证据、讨说法？家属来提出还是朋友、同事来提出？至于罪名都是现成的：如国民党残渣余孽，桂系军阀李宗仁、白崇禧的帮凶爪牙，“妄图颠覆革命政权”，等等等等。

我所在的五通中学还是个知识分子成堆的单位，“群众专政”基本上就是第三种模式，更遑论没有“秀才”的地方和单位。

文革中广西形成两大派别，“四二二”和“联指”，前者成立于1967年4月22日，要打倒广西区党委第一书记韦国清，主要由学生和知识分子构成；后者是“广西无产阶级联合指挥部”的简称，以保卫韦国清为号召，以工人、农民和机关干部居多。双方由文斗转入武斗，由小打小闹转为动刀动枪，闹得不可开交。1968年7月3日，中央发布了“七三”布告，命双方放下武器搞大联合，但不知怎么回事，此后竟变成对“四二二”的围剿，“联指”与地方上的武装民兵结为一体，一方面将桂林“革大老多”（四二二在桂林的主要组织）围困在王城（原明代王府，现广西师范大学）内，向里面扫射、扔炸药包；另一方面在周边县城和乡村实行“群众专政”，从1968年6月到9月，当地上演了一幕幕草菅人命、滥杀无辜的惨剧，其中又以临桂县最为惨烈。

五通中学为临桂县一个县级中学，位于本县五通镇，当时仅有初中，三个年级有300多学生，教职工不足40人，而就在这期间竟有九名师生成为“群众专政”的冤魂。1962年到1976年，笔者在五通中学任教，亲历文革全过程。

第一位受害者是数学教师刘增民，二十六七岁，未婚，北京市人，河南某高校毕业，家庭出身虽不好，但本人无历史问题。刘老师是位很随和的人，他的宿舍学生可以自由出入，唯一一件咖啡色西装，他自己很少穿，倒常见一些调皮的男生穿着在校园里招摇。文革初期他曾被批斗，其实也多半将一些琐事上升为吓人的罪名。记得一次开批斗会，当批斗另一名教师时，主持人让

刘老师坐下，他半边屁股刚一落凳，立刻又站起来低头弯腰说："我有罪，还是站着接受批判吧。"文革中，五通中学的教职工清一色皆属于"四二二"一派，但刘老师既不是头头，也未参与任何打、砸、抢的非法活动。武斗的枪声一起，文革中小学都停课了，刘老师无所事事，便常与来自上海的镇诊所丁医生交往。听说丁医生有历史问题，也可能是"反右"时从大城市下放来的。一日，刘老师同丁医生去中庸大队一位男生家玩，却被当地刚刚集结起来的民兵抓获，关进镇派出所。本地的"群众专政"首先拿一名地主和丁医生祭旗，刘老师竟被拉去陪绑。丁医生等被杀后，刘老师还活着，但要学校派人给他送饭。学校既未将刘领回，又不肯好好送饭。一次，民兵又来催送饭，校革委某人回答说："拉出去干掉算了。"一个大活人就这样给毙了。

英语教师任绍熹，桂南人，六七十岁，身材肥硕。他自己交待很早以前当过凭祥县县长，但"四清"时还属于统战对象。"群众专政"期间，被从学校拉出直接处决，据说在车上自己咬断舌头，满嘴喷血，样子十分吓人。但笔者至今不解，他自己为何要咬舌？

历史教师莫树年，广西梧州人，近30岁，未婚，华中师范学院毕业，以一手行书著称当地。其父是桂系军阀将领，作为战犯被俘，当时还未获释。"四清"时莫老师被揭发有诱奸女生问题而停职审查。

数学教师秦守刚，四五十岁，已婚，有一子，本县宛田公社人。听说出身不好，但没有其他问题。

生物教师杨旭日，四十多岁，已婚，有一子一女。据说杨在解放前当过青年军，入过三青团。文革时又被揭发，1959年闹饥荒，他在讲到蛇与青蛙有冬眠功能时曾说："人也能冬眠就好了，起码有三四个月不会饿得难受。"

在当时看来，莫、秦、杨三人有历史或出身问题，但即便如此，也绝对罪不至死。文革一开始，他们连参加群众组织的资格也没有，便成为学校劳改队中最稳定的成员，每天打扫校园，或在学校农场干活。当地"群众专政"进入高潮之后，学校当权者突然将他们押到桂林麻袋厂，那是临桂县武装民兵指挥所所在地，而那里被关押者已人满为患，指挥所让他们带回自己处理。在回来的路上，学校当权者竟伙同民兵将三人枪杀于野山之中。

最后一名遇难的是政治教师林茂森，30岁左右，北京师范大学毕业，已婚，有一子，家在学校附近的罗江大队宅田村。林老师能言善辩，大家推他为本单位"四二二"组织的负责人，他并没有政治野心，也不过领学生到校外刷刷标语、参加大会，也并未参与打砸抢等恶行。桂林的枪炮声初起，他主持了最后一次教职工会，他忧心忡忡地说："湖南道县在搞'群众专政'，随意杀人，这种做法有可能影响广西。"因此他建议解散组织并停止一切活动。从此，林老师仿佛从人间蒸发一般消失了。然而，到"群众专政"闹得最凶时，他居然回来了。他先到公社、派出所自首，然后回到学校，当然就沦为学校劳改队的一员，当时莫、秦、杨三位老师已被处决，只见他一个人形单影只地挑大粪到地里。不久，更大的不幸降临。

文革中的群众专政大会

大约八月底九月初，公社召开大会，一个民兵负责人跳了出来，只见他身穿褪色的黄军装，腰别一把手枪，有几分像抗日电影《平原游击队》里的主角李向阳，他说："'群众专政'将要推向高潮，定于几天后某圩日处决100名'四类分子'和'四二二'坏头头，各单位各生产队都要将该处理的人送来。"圩日的前一天，我们中学召开教职工大会，负责人说："规定的日期到了，上边指定要把林茂森送去，怎么办？"多数与会者都沉默不语，终于有位同事说："各单位都在行动，我们学校怎能例外呢？"然后，大家仍沉默不语，而沉默便等于默许，报上去就变成一致通过了。当时自己也未能挺身而出，救人一命，回首往事，仍令我心有愧疚。

圩日当天上午，林老师还在清扫校园，有人叫他去公社，他二话没说，放下笤帚，也不用人押送自己就过去了。一进公社大门，他就被捆绑起来，颈脖上挂一大纸牌，上书六个大字"坏头头林茂森"。他和其他受害者先被拉去游街示众，在狭窄脏乱的旧街道上拐来拐去，一路上被推推搡搡，走得踉踉跄跄，每到人多处，便被按倒在地，逼他们磕头认罪。适逢圩日，街道两旁站满了买卖农副产品的农民，看客脸上恐惧与麻木参半。林老师非常驯服，边磕头边念念有词："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但此举未能带来生机，最后他倒在汽车站附近灌木丛的血泊中。笔者曾随人群到过刑场，只见地上有四十多具尸体横七竖八，血腥场面令人晕厥。枪弹击中林老师的背部，从咽喉出，他身旁有一身材矮瘦、头发稀疏的男子，手拿红纸堵住林老师的伤口。听说那男子是林老师的哥。

这是五通镇最后一次公开处决，被害者虽不及原计划的一半，但仍是规模最大的一次。

还有三名学生遇害。

谢某某，初三学生，本应毕业，却因大乱而未毕业，家住茶园公社。

彭锡贵，初二学生，比同龄同学高大，家住学校附近生产队。彭同学性格暴躁，同学起诨名戏称为"彭匪"。

张灵光，初二学生，灵川县人。

彭、张二生所在班曾由本人任班主任，而没教过谢某某，因而记不全其名。已记不清三名学生的家庭出身，但可以肯定不是工人、贫下中农、革命干部等"红五类"，谢、彭二人皆死于校外"群众专政"高潮中，而张灵光则在校内被捕。

人们从未在小镇上看到张灵光的母亲或其他亲属，听说他父亲解放前在国民党的重庆中美合作所干过事，也不知是真是假，但解放后他又一度是县级干部，我在五通时他已在镇供销社杀猪卖肉。张灵光本人矮小单瘦，十分机灵，文革中时兴画毛泽东头像，他不用打格子描摹，随手就能放大缩小，并画得有几分形似。但他脾气倔强，自由散漫，爱说粗话，不懂礼貌，属于大错不犯、小错不断的那类学生，在非常时期，这些小缺点却使他送命。

当年七月的一天傍晚，正是南国暑气正盛之时，我校已宣称全体倒戈易帜，即由"四二二"变为全部加入"联指"，是日全校教职工在一间平房教室开会。张灵光闲极无聊，猴坐于窗台，一边乘凉一边看热闹。会议主持人喝令他离开，可他嬉皮笑脸地赖着不走，这下惹恼了那位领导，当时便暗地派人到附近的派出所叫来武装民兵。笔者亲见民兵们手持长枪，猫着腰沿墙跟逼近窗台，将黑洞洞的枪口抵住张的脑门，不由分说就将其拽下拖走，从此该生从学校消失，旋即亦从人间消失。据说他被送到桂林麻袋厂关押，然后被拉到象鼻山被刺刀捅死，最后抛尸漓江。这位稚气未脱的十四五岁少年，他本人及在场者最初以为，他被带去只不过遭一顿训斥，最多也不过挨顿揍，他做梦也想不到自己会被本校教师塞进虎口！张灵光出事后没几天，笔者又在派出所门口看到张父被带去处决。张父被反剪双手，而他十分镇定，背靠卡车，十分配合地双脚一弹跳，任由卡车上的民兵把他提溜上去，也不知那时的他是不知即将被杀，还是已将生死置之度外，决心与儿子共赴黄泉？

上述九位师生的遇害，实在惨无人道，遇害的三名初中生都不是"四二二"头头，表现也并不突出，而张灵光之死更属偶然，那时是没人跟你讲道理的。原来有一个最活跃的学生叫杨光，"群众专政"风暴一起，校内外都叫嚷抓他，如果当时被抓，必死无疑。而该生十分机灵，"大串联"时曾跑遍半个中国，当时毫不犹豫就逃出险地，单枪匹马在外闯荡了大半年，风潮过后方回

来。后来他还回校领毕业证,再无人敢动他一根毫毛。相较而言,林茂森老师的遇害就尤令人扼腕,早在“群众专政”风暴未起之时,他便根据来自湖南道县的传闻作出明智的判断,也一度逃脱虎口,但如此聪明的他却在高潮时飞蛾扑火,最终未能躲过此劫。

五通中学仅是这场大难中的一角,还有更多的教师、学生及许多普通百姓遇难。仅据笔者所知,记录如下:文革前后调出五通中学的同事至少有六人遇害,其中两位已记不清姓名,其余四位分别是:体育教师庚起士,遇害时在灵川县某中学任教;英语教师丁毅与数学教师谢东生,在本县四塘中学罹难;语文教师梁承义,调县教育局后成为“四二二”头头,后被“专政”处决。

五通中学的师生有数名亲属遇难:教导主任朱名顺的长子、数学教师毛荣奇的岳父、数学教师邹惠卿的丈夫、数学教师于刚的父亲都死于所谓“群众专政”。而语文教师吴一鹏家最为悲惨,他父亲、姐夫、表哥都先后罹难。吴本人参加过抗美援朝的志愿军,其父解放前曾任修仁县参议长;姐夫文邦才是中共党员,当时在县教育局工作;表哥姓蒋,在四塘中学教书,情况都不一样,竟先后遇害。

学生李惠玲父亲被杀,曾在学校轰动一时。李是初一女生,能歌善舞,是学校宣传队的台柱子,因皮肤稍黑,被同学起诨名为“黑马”。李的双亲年纪颇大,似在四五十岁之间,自然视女儿为掌上明珠。其父高瘦,戴眼镜,文质彬彬,也不知干什么工作。其母不识字,但能言善辩,一度是“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常被请到机关学校作报告,可谓镇上名人。但那时的红色家庭也是朝不保夕的,“群众专政”风暴中李父被抓,也不知何故。李惠玲到学校找驻校的六九五五部队军宣队求救,但那时部队已宣称不介入地方事务,李父终于遇害。尽管生父被杀,李惠玲还得来校参与宣传队的活动,但情绪难以掩饰,往往眼泡哭得红肿,而革命是不允许温情的,一张张大字报向这位孤苦无助的女孩袭来。重压之下,她只能贴大字报检讨,其中最具时代特征的用词至今令我难忘:“某某某死得好,为国家节约粮食。”一语道破历史的天机:国家的粮食弥足珍贵,而人命贱如草芥。

最高指示

在拿枪的敌人被消灭以后，不拿枪的敌人依然存在，他们必然地要和我们作拼死的斗争，我们决不可以轻视这些敌人。

通缉令

现行反革命分子潜梦婵，又名潜华，男，22岁，浙江缙云县五云镇人。该人出身于伪军官家庭，于68年7月10日凌晨3时，抗拒交待，畏罪潜逃。该人外出时，身穿芝麻呢工作服一套，内有白衬衫、圆领衫各一件，脚穿淡棕色塑料凉鞋，留西发，脸稍带长形，身长1.7米左右，戴深褐色镜框的近视眼镜，会讲一口比较流利的普通话。

该人主要罪行是：公开污蔑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污蔑革命的大字报，组织小集团，偷听敌台广播，并在群众中多次进行反动宣传，同时企图杀害革命职工，情节严重。为誓死捍卫毛主席、捍卫毛泽东思想、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希各地革命委员会和革命造反派大力协助我们查捕，如发现，希速电告或派人送我公司，以便捉拿归案。

特此通缉

（请张贴）

浙江省丽水专区建筑工程公司革命委员会
浙江省丽水革联总工总司建设兵团

一九六八年七月十日

文革中群众组织发布的通缉令

1958年本人高校刚毕业时,曾被分配到临桂师范学校工作。在临桂师范共事过的教师,有五名在“群众专政”风暴中遇害:化学教师陈慕文辗转调至小学罹难;教育学教师邓秀昆文革前调入县教育局,妻子姓罗,任临桂县医院副院长,夫妇二人同时被处决。语文教师袁熹和魏彦魁同在四塘中学被害,魏的妻子李良英,当时曾被判与夫同时处死,因有身孕才侥幸免死。四塘中学是临桂县唯一的高、初中皆设的完全中学,离桂林较近,受害人数肯定首屈一指。周家齐老师当时已调县银行工作,桂林武斗平定后他还健在,笔者到桂林参观时尚去看望,他因看守金库而被流弹击伤,我半开玩笑说:“大难不死,必有后福。”谁知五六天后,他就被老家的民兵抓回灵川九屋,转瞬即阴阳两隔了。

据我所知,还有两位湖北老乡在本县六塘中学任教,一位为中老年,仅一面之交,故未记姓名;另一位二十五六岁,姓康,刚从大学毕业,人称“康大炮”。文革后我被调入六塘中学时,却得知二人都死于“群众专政”。

我所亲见与所记毕竟有限,其实当时屠杀的规模是相当惊人的。文革后,小小的广西临桂县

曾登上《人民日报》1984年9月10日头版，题为《广西逮捕中杀人犯胥明德》，文中说：胥明德“在临桂县亲自策划、指挥杀害了大批党政干部和无辜群众，其中有县委副书记、副县长等十九名县、区干部。”这些干部我大都不认识，只记得三位在“群众专政”漩涡中遭灭顶之灾的县官姓名，他们是县委副书记李瑾科、副县长周克仁和法院院长刘锡臣。刘院长是河北献县人，因为经常在公判会上露面，他的知名度比县长还高。9月18日，在批斗会上，他和其他四人被活活打死。刘的妻子是县医院医生，早在8月23日，她与其他20人一起被集体枪杀，他们年仅17岁的儿子刘振刚逃回河北老家，也被武装民兵抓回打死。仅县区干部就有19名被杀，那么遇害的一般干部和群众应在十倍或二十倍以上，不知当地有关部门是否有统计，何时能公诸于众呢？

所谓“群众专政”并不是自发的，被《人民日报》点名的胥明德，指挥杀人是确凿无疑的，但仅凭胥这条小泥鳅能掀起这滔天浊浪吗？胥最早在县党校任理论教员，中小学教师集中学习时他常来作政治辅导，他的口头禅是：“发言长短是水平问题，开不开口是态度问题、立场问题。”实际上是用激将法撬开教师的嘴，以便利用他们“向党交心”所说的话，进行秋后算账。其实，当地的政治明星是韦英豪，他原是临桂师范的优秀学生，毕业后留校任团委书记，为人谦和沉稳。文革前韦英豪调任县团委书记，文革中他和胥明德都成为县里“联指”的头头，后来韦成为临桂县革命委员会副主任，胥为委员，而县革委的主任是县武装部政委龙凤山。龙政委原是武装部一般政工干部，被评为“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还出席过广州或北京的表彰大会，县里曾敲锣打鼓送迎，后升任武装部政委，又兼任县革委主任。我们这些平头百姓当然不知道他的工作，但他的一次报告令人印象深刻。1968年6月底，五通公社在礼堂召开纪念“七一”大会，龙莅临发表长篇讲话，末尾发出指示：本地抓到的坏人，凡冒充解放军的交武装部，其余由地方自行处理。紧接着前述那位像“李向阳”的民兵负责人宣布，马上就要开宣判会处理“坏人”。当时本人十分纳闷，公检法已经瘫痪，谁还有权宣判呢？如果判徒刑三五年，又送往哪里服刑呢？问问身边人，知情者神秘地说：“送去土地庙呗。”我还以为“土地庙”是某个劳改农场。然而，七月初，当地竟开始自行处决两人，也就是刘增民老师被陪绑的那次，数天后，刘老师也成为五通中学第一个受极刑的人，我这才恍然大悟，所谓“土地庙”即鬼门关、黄泉路的代名词。我不知道，五通镇杀人，是否就是全县的初开杀戒呢？也未敢断言，龙凤山是“群众专政”的始作俑者。但龙政委的讲话，与这一举措的关系，却是再直接不过了。1984年，笔者重返桂林办事，听说清理“三种人”时，龙凤山和韦英豪都被缉拿归案，当时胥、韦都以照顾家庭为借口调回原籍，在当地做官，胥是在重庆綦江县委被捕的，两人被押回临桂受审，同时被处极刑。龙凤山受到什么处置，却不得而知，只知道他并未与韦、胥共赴黄泉，也许此刻正在某干休所优哉游哉颐养天年呢。

如果说韦、胥等人是因政治投机而杀人，而当时许多迫害却出于发泄私愤。一些人当上武装民兵，一旦手握钢枪，便有生杀予夺的权力，那时杀几个人是轻而易举的，无须请示汇报，也没人追究责任。记得有位许同学，从临桂师范毕业后，当上小学教师。文革后期，与笔者在桂林相遇，他未及寒暄就迫不及待地问：“毛老师调哪去了？”我问找毛老师有何事，许咬牙切齿地说：“要杀他！”我依稀记得许同学在校时受过什么处分，而毛翊翎老师就是他的班主任。许校友说，“群众专政”时他当上武装民兵，曾问遍全县中小学，都没找到毛老师的影子。其实，毛老师就在邻县的灵川大圩镇，那里也在大搞“群众专政”，民兵去引渡一个人，肯定易如反掌。幸好这位许校友蛮悍有余而机灵不足，才未能心想事成。

更为荒谬的是，加害者与被害者还会纠结在一起，有的人在此地有权对别人实施“专政”，而他的亲属却在彼地被他人“专政”。革命性、斗争性极高的人还会“大义灭亲”，本校某教师曾给武装民兵写信，告发自己的父亲在解放前当过国军的兵，他父亲不久即从地球上消失。而在文革后广西拨乱反正，曾向“非正常死亡者”的家属发放抚恤金，他也伸手领取，这时有关部门居然找到留存的亲笔揭发信，令这位儿子好不尴尬。其实，早在文革前“大义灭亲”就是被鼓励的。我所认识的被害者中，有一位的妻子早在未结婚时曾

揭发其父藏有枪支，只是当时还有点规则，其父仅被关了几个月。过去常说文革是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此说不谬，但触及的恐怕是千百年来做人的道德底线吧？

九月底十月初，桂林方向的爆炸声骤然停息，周边地区滥捕滥杀的现象也日渐稀少，许久不敢入城的人们纷纷涌进桂林，一睹经炮火洗礼的桂林城。五通中学也不甘落后，组织全校师生自带行囊前往，美其名曰："参观''成就，学习体会贯彻'七三布告'所取得的丰硕成果。"

我们步行二十余公里入城，庙头公社是必经之路，只见大道旁山麓下有腐尸横陈，不知是战死者还是被处死者，当时竟无人收殓掩埋。

按惯例我们住在临桂县干部招待所，当地人称桂林麻袋厂。我们住在二楼，师生全体打地铺。这时民兵大都被遣散，仅留一个小分队看守未处理完毕的在押人员。我们从楼上俯瞰，能看到楼下相对封闭的小院中还关有"犯人"，他们男多女少，有时出来排队打饭。其中有一位白发老人，上身佝偻，稍上年纪的人几乎都认识他，他是县医院的中医，姓黄，在当地较有名气，干部都乐意找他治病，那时都客客气气的，好一派礼贤下士的模样。而这时县太爷也都成过河的泥菩萨，再无人保护这位落难的老郎中。仅过一晚就见不到这位古稀老人了，他没有逃过劫难，还是被处决了。一次外出归来，看到院中停有一具中年女性的尸体，脖子上套有绳索，显然是自缢身亡的。胆大又无聊的男生捞起绳索拖着尸体追逐嬉戏，吓得女生惊叫四散。那时身为教师已不能喝斥学生，只能在心里想：小小年纪，竟敢亵渎尸体为戏，还能指望他们成人后为善类吗?!

到桂林的第二天上午，吃过早餐就直奔广西师范学院，这是此次参观的重头戏。师院位于明代靖王府遗址，武斗后的桂林王城，大门依然高耸巍峨，气宇轩昂，正殿端坐在高台之上，飞檐斗拱，排列有序的幢幢建筑物，一律为大屋顶结构，古朴庄严，显现出昔日的皇家气派。仅少数屋顶被炸开一两个洞，屋脊有个别地方坍塌，墙壁有弹洞，整体来看，王城损坏并不十分严重。出乎意料的是，前后门洞开，无钢枪把守，并无森严恐怖的气氛，任何人都可自由出入，大学生似乎销声匿迹，来来往往的多是一队队中小学生，孩子们有说有笑，有如旅游团队。

然而，正待步出后门，心情陡然沉重起来。后门的右侧便是桂林的标志性名胜之一 ——独秀峰，山峰依然苍翠挺拔，而山脚原本绿草如茵的草坪已变成乱葬岗，高不盈尺的黄土坎上胡乱放些砖头、石块，表明是遇难者的临时坟茔。可见，在"联指"与武装民兵的合围下，参加"老多"的大学生插翅难飞，必然死伤惨重。今日桂林又成为旅游胜地，想必王城内的独秀峰下又游人如织了吧，不知还有几人能知晓其下有多少冤魂？ ■

（作者简介：1958−1978年先后在广西临桂县师范学校、五通中学、六塘中学任教，1978年秋调回原籍湖北，退休前在襄樊市第五中学[今襄阳中学]任教，退休后于深圳居住。）

（责任编辑　杨继绳）

社科人文　文学小说　党建管理　经济管理　书画摄影

正规出书　约稿通知

书稿内容：(一)社科人文类书稿：回忆录、自传或人物传记、年鉴、社科著作等；(二)管理和学术类书稿：党建管理、行政管理、经济、金融或企业管理等研究专著；(三)文学类书稿：散文、诗歌、杂文、时评、游记、通讯等；(四)小说类书稿：历史、当代、言情、武侠、反腐等长篇、中短篇小说；(五)美术类：画册、书法作品集、摄影作品等。

书稿要求：书稿(作品)内容健康，艺术性强，底蕴丰厚，文笔流畅。字数为6-8万字以上，个人专著、多人合集均可，公开发表或未公开发表均可。

出版发行办法：以丛书形式或独立书号形式出版，以畅销书或合作出版方式运作；达到畅销书要求的，签订标准出版合同，按版税或买断方式支付稿酬；根据作品和作者意愿，面向国内或海外公开发行。其中国内公开发行的，由专业权威出版社出版，国家标准书号，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备案查询。

全国免费投稿热线：400-680-8368

投稿地址：北京朝阳区八里庄东里3号654信箱

综合编辑部 收；邮编：100025

电话：010-57192223、57733086、57192229、57733087

传真：010－89506878；在线投稿：bookbj@126.com

联系人：牛萍萍、文馨、顾娜、高晶(编辑)

新书欣赏、订购，请登录：http://www.bookhk.net

北京东方朝阳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李震自杀前后

○ 晏乐斌

1973年10月21日晚，主持公安部工作、党的核心小组组长的李震，突然自杀身亡，吊死在他住房地下管道上。李震自杀来得突然，引起人们的种种猜测与疑问。纵观公安部在文革中的经历，不难看出李震自杀的前因后果。

文革中公安部的处境

文革十年浩劫，公安部是个重灾区。新中国成立时的公安部第一任部长罗瑞卿，为保卫毛泽东的安全，保卫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安全，为维护社会治安，惩治犯罪，维护和巩固国家安全，功不可没，1959年9月他被任命为解放军总参谋长。公安部编辑出版的《建国以来公安工作大事要览》(2003年1月《群众出版社》出版)一书记载："1965年12月8日–15日，毛泽东在上海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罗瑞卿被打倒，成为'文革'中最早受害的高级干部之一，公安部也就成了文化大革命的重点部门。(1966年)8月19日–29日，公安部召开部机关文化大革命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诬蔑彭真为'大党阀'，罗瑞卿为'大军阀'，十二局局长狄飞为'反革命分子'，常务副部长、中共八届候补委员徐子荣为'右派分子'，诬蔑副部长刘复之、凌云，部党组成员、政治部主任尹肇之等人是徐子荣为首的'反党宗派集团'和'罗瑞卿地下公安部的主要成员'。会后，徐、刘、凌、尹及一批局级干部相继被批判斗争，停职检查。"

文革之初，在全国掀起了"砸烂公检法"的高潮，公安部首当其冲，在北京，被煽动起来的造反派、红卫兵，1967年冲击公安部机关、北京市公安局机关达数十次之多，人数多的一次达万人。全国各地出现了冲击公安机关、监狱、劳改队和看守所，出现了打砸抢公安机关，抢公安机关档案，揪斗公安民警和领导干部，曾一度使一些地方的公安机关工作陷于瘫痪。在公安部，先后以"61个叛徒集团"罪名，逮捕关押了副部长徐子荣和副部长杨奇清、汪金祥、凌云、严佑民，党组成员、政治部主任尹肇之，1960年已调任青海省省长的原副部长王昭，亦遭逮捕关押；曾任罗瑞卿秘书、1960年调任青海省委秘书长的王仲方被逮捕关押，并在公安部和全国一些地方的公安机关，以罗瑞卿、徐子荣划线，深挖、追查"罗瑞卿分子、爪牙、帮凶"300多人；五十年代初曾当过罗瑞卿警卫员的吕亭阁，1957年3月调到贵州省贵阳市一家企业工作，文革中当成"罗瑞卿爪牙"揪斗、批判，徐子荣、王昭在狱中遭受残酷迫害，折磨致死。

1966年9月，中共中央决定，调沈阳军区第四政委李震主持公安部工作，任党组副书记、常务副部长。同年12月调21军政委施义之任公安部党组成员、政治部主任。1968年初，谢富治将党组改为领导小组，后又改为核心小组，中央又调北京军区工程兵政委曾威、空八军副军长赵登程为部领导小组成员。

1967年2月11日，北京卫戍区司令部接管北京市公安局，建立军事管制委员会。随之，对全国公安机关实行了全面军事管制，除一些地方公安机关内部造反派夺权，军管会人员支持造反派夺权外，全国其余地方公安机关的权力一律归军管会，军管会控制着公安机关的一切，推行极左路线，在各地公安机关已达到了为所欲为的地步。仅北京市，据《建国以来公安工作大事要览》揭露："11月3日，李震和北京卫戍区(军管会)负责人向中央文革小组作《关于北京市公安局内少数暗藏的坏人进行破坏活动的情况和措施的请示报告》，把北京市公安局一大批党员干部诬陷成叛徒、特务、资本家。报告说，仅北京市局(不包括分局、县局及附属机关)即查出'三反'分子109名，地富反坏右分子、叛徒、特务、资本家和

敌伪军政警宪人员286名。10名正副局长全是‘三反’分子”。“11月18日，在谢富治的授意下，北京市公安局军管会拟订了一个《关于北京市公安局问题的提纲》，诬说原市局是‘旧市委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招降纳叛，实行资产阶级专政的工具’。汇报声称，共查出‘三反’分子111名，特务、叛徒、地富反坏右分子258名，敌伪军政警宪、资本家人员306名，本人有重大政治历史问题，家庭被杀、关、管和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抄家、斗争的1018名，以上共计1693名，占全局干部总数的12.7%。其中正副科长124名，占科级干部总数的18%；正副处长、分局长117名，占同级干部总数的80.7%；10名正副局长，全是‘三反’分子。提出彻底砸烂公安局，大砍组织机构，大量精简人员。”

李 震

1967年11月5日，谢富治、吴法宪、汪东兴三人到公安部机关，查封了公安部的全部档案，先后从军队抽调710名干部、战士到公安部清查档案，1968年7月3日正式开始。公安部领导小组向中央文革小组作《关于组织清档队伍几个问题的请示报告》中说：“完全由军人参加，原公安部干部一个也不参加，完全由军队干部负责。”报告称，“清档任务主要是清查刘少奇、邓小平、彭真、罗瑞卿及徐子荣、汪金祥、杨奇清、凌云等人‘资敌、通敌’，矛头指向毛主席的罪行”。其次是为“指控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提供线索、证据”。清档工作由曾威领导负责，到中央政法干校进行。1970年1月，李震、施义之、曾威向周恩来、汪东兴、谢富治报告称：公安部的清档工作现已结束，历时一年半，清理了全部档案31.2万卷，挖出罪证233件，俱已送中央各有关专案组，还接待了各省市专案调查2万人次，向他们提供了罪证6000余份，其中有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地主、富农和资敌、通敌等类罪证与线索。同年3月初起草的《关于完成审查、清理公安部档案情况的报告》上报中央，从报告中可以看出，李震、施义之、曾威、赵登程等人，利用清理档案搜集的所谓“罪证”，都是颠倒是非，诬陷中央部分领导同志和罗瑞卿、徐子荣等公安部领导，以及地方上的一些领导与干部的不实之词。清档工作在极左思想指导下，不仅销毁了大量内部资料、图书，对档案材料造成了严重的破坏，档案中凡涉及到对“毛泽东、林彪、江青等人有不敬字句、言论”，都从案卷中将字迹挖掉，或干脆将案卷销毁。

1968年初，谢富治与李震、施义之、曾威等人，将公安部工作人员，除挑选40人配合、协助调入公安部的军人工作外，其余1500多人全部调到中央政法干部学校举办学习班，集中审查一年之久。开始进学习班的人，不准回家，通过审查，作出如上述处理之后，才有所放宽。到1969年春节后，将这些工作人员全部，连同100多户的家属、子女，共近2000人发配到黑龙江省集贤县笔架山劳改农场“五七战校”，安家落户，要他们作好“长期安家落户当农民”的思想准备，“五七战校”白天下地劳动十二三小时，晚上集体学习，检查、汇报思想，有言语不慎，或表现不满的，受到批判斗争。当年3月底，珍宝岛事件爆发，谢富治等人怀疑公安部这些人中有投奔苏军的嫌疑，便将其中的20多人转移到湖北省荆门县沙洋劳改农场监督劳动。

1970年8月23日-9月6日，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在江西庐山举行，毛泽东就陈伯达抛出的“天才论”，发表了《我的一点意见》，严厉批评了陈伯达，实际是敲山震虎，警告林彪一伙，接着在全国开展“批陈整风”运动。

据《建国以来公安工作大事要览》记载：“1970年12月12日–1971年2月11日，公安部召开第十五次全国公安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各省、市、自治区党委、革委会主管公安工作的负责人

和公安机关军管会的负责人，以及公安部机关各单位负责人。军队各军兵种、各大军区保卫部负责人和最高人民法院也参加了会议。会议由公安部党的核心小组负责人李震主持”。“会议开始后，与会的一些人员对建国后十七年的公安工作猛烈批判，全盘否定。毛泽东听说座谈会开得很紧张，找纪登奎等人谈话，要求进行引导，并指出：‘对公安工作要一分为二，还有好的，不要批得灰溜溜的。’会议气氛有所缓和，但基调仍未能改变。1971年2月8日，周恩来接见了会议全体代表……对建国以来公安工作和公安队伍的状况作了基本估计……他指出，‘对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的公安工作，要看主流，要看红线。这十七年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这条红线领导全国，不然怎么会有今天？一共开过十四次公安会议，主席亲自过问的有十次，而且还有许多具体指示。各条战线，主席管得最多的，一个是外交战线，一个是公安战线。不要说文化大革命前是黑线统治着。这种说法简直是不可想象的，等于否认主席的领导，否定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还指出，‘整个公安队伍，还是好的，不要以为公安干部都不好，那就危险了’。”

1971年“9·13”事件，林彪外逃摔死，当即在全国开展“批林整风”运动。

批陈整风、批林整风运动一经在全国开展，公安部和一些地方的公安机关受左的思潮的冲击有所缓和，气氛活跃起来，开始批判林彪极左路线。中央决定对林彪集团成员进行专案审查，便从公安部下放黑龙江省笔架山劳改农场劳动的工作人员中抽调一部分回来参加此项专案工作，加之几年来公安部工作荒废，从1972年开始，也陆续从那里调回工作人员到部机关开展公安工作，对全国的公安工作加强领导与指导。

1972年3月26日，谢富治因患胃癌不治去世，终年63岁，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了追悼会。1980年10月16日，中共中央批转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谢富治与林彪、江青等人篡党夺权的反革命阴谋活动问题的审查报告，决定撤销对谢富治的悼词，开除他的党籍。

1972年7月9日，周恩来原则批准以中央名义，公安系统抓紧解放干部，撤销军管。八、九两月，周恩来多次公开发表讲话，批判极左思潮，反对无政府主义，等等。公安部的政治环境有所宽松缓和，1972年、1973年从黑龙江省笔架山劳改农场劳动的工作人员陆续抽回一部分。被抽回的人中有参加中央一办（查办中央一级领导人专案）、二办（军事系统专案）、三办（中央和国家机关副部长以上一级的）专案的，一部分调回部工作，使荒废了的工作慢慢恢复。这时，工作人员的言语行动慢慢放松起来，开始议论一些话题，在一些学习会上批判林彪等人的极左路线和极左政策。到了后来被纪登奎、施义之等人当成“算旧账”，上纲上线为“发泄对文化大革命不满”。

李震自杀

就在这时，1973年10月21日晚，主持公安部工作的李震突然自杀身亡，吊死在他住房地下热力管道上。李震自1966年9月从沈阳军区第四政委的职务上调到公安部，担任公安部党组副书记、常务副部长，掌握公安部文化大革命运动，充当谢富治最得力助手，最可靠的骨干。谢富治通过依靠李震掌握、控制公安部的全盘工作，李震自杀时是中共中央委员、公安部党的核心小组组长、部革委会主任。

在中国医学科学院副院长吴阶平主持下，医学专家林钧才、董炳琨、吴蔚然、陈敏章，以及上海、广东、天津、北京省市公安厅局的法医李延吉、陈仲芝、吴声屯、韩木林和北京药品生物制品检验所检验师朱燕、首都医院内科医生张孝骞等专家，对李震尸体解剖、检验和现场勘察，1973年11月9日，由这些专家签名，写出的书面报告，报送中共中央。这个由专家写出的报告肯定是自杀身亡，列举的证据确凿，事实清楚，李震是自己走向地下管道间吞服“速可眠”药品后上吊自杀的。可是施义之等人不顾现场勘察、医学专家尸体检验、解剖的结论，硬说李震不可能自杀，说没有自杀的理由，一口咬定是谋杀的，把自杀当成谋杀案件来侦破，将公安部副部长、核心小组成员于桑、刘复之当成“谋杀”主要嫌疑人，由施义之、曾威、赵登程等公安部核心小组成员，于10月25日向中共中央政治局汇报（事先将于桑、刘复之撇开，不让他们参加）后，周恩来总理明确

指定施义之为公安部核心小组牵头负责，并指出李震之死，存在自杀和他杀的两种可能。25日当晚，中央办公厅副主任、警卫局副局长杨法中对于桑、刘复之宣布：“中央决定对你们保护审查”，关押到北京安定门外交通干部学校监护所。于、刘在拘留期间，施义之等人组织人搜集整理了于桑、刘复之1970年在“批陈整风”和1971年“9·13”事件后开展的“批林整风”的一些大小会上，他们发表的一些不同的意见与看法，上纲上线为他们“对文化大革命不满”，印发了《于桑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攻击中央领导同志的材料》、《刘复之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攻击中央领导同志的材料》各一份，于桑的这一份3000余字，刘复之这一份4000多字，发给公安部各单位，发动公安部机关工作人员开展了对他们的大规模揭发批判。

《建国以来公安工作大事要览》记载：“10月21日夜里，李震吊死在部机关大院地下热力管道沟内。一时间原因未明，‘四人帮’及其党羽借机滋事。23日至27日，周恩来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决定，此破案工作，委托华国锋负责，纪登奎、吴德协助，重大问题报政治局解决；同时在公安部内进行动员整顿工作。于桑、刘复之等蒙冤被关押审查。党的核心小组由施义之牵头负责。11月11日，正在中央举办的‘读书班’学习的祝家耀（王洪文一起造反起家的十届中央委员）和杨贵（中央候补委员）被派公安部工作，任核心小组成员，与施义之等人一起，也认定李震是被人杀害的。侦查人员经过大量调查研究，现场勘查，解剖尸体化验，现场痕迹检验，以及各种方式的模拟试验，完全证明李震自杀而死。”“围绕李震死亡的原因，在公安部展开了尖锐激烈的斗争。王洪文等人未经调查就说是被阶级敌人谋害的，要追查凶手。施义之、祝家耀等人封锁事实真相，硬说李震不是自杀，是被害死的，甚至一口咬定是被于桑、刘复之等谋害。他们以破案为名，在公安部大搞逼、供、信，实行白色恐怖。”出差去外地工作的人，电话通知他们立即返回机关，讲明情况，接受审查。受审查的133人，其中局级干部29人，处级干部31人，弄得公安部机关人心惶惶。

《建国以来公安工作大事要览》记载：“在侦查人员肯定李震是自杀的以后，施义之等人不让宣布这个结论，说什么‘即使不是他杀也是被逼死的’。施义之等人长期掩盖李震自杀和他们借机诬陷于桑、刘复之的真相。”

在粉碎“四人帮”以后，1977年3月，经公安部党组向中央报告，中央批准了破案组关于李震自杀的结论。据调查证实，李震因追随谢富治积极参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在林彪问题败露后，有几件涉及到他的罪行受到追查而畏罪自杀。在1977年12月公安部召开的第十七次全国公安会议期间，向到会的省、市、自治区党委负责同志和公安厅、局长，以及公安部全体干部传达了中央批准的公安部党组关于李震自杀问题的报告，李震自杀的真正原因才大白于天下，揭开了数年的谜底。

历史往往会捉弄人，无论是李震，还是罗瑞卿，既是时代的紧跟者、害人者，也被时代所捉弄。罗瑞卿在任公安部长10年间，以莫须有罪名冤枉了不少好人。1951年1月24日罗到广州，以“英国特务”罪名，逮捕中共华南分局社会部长兼广东省公安厅长陈泊，同时以“暗藏的英国特务”、“中统特务集团的黑后台”罪名，逮捕广州市公安局副局长陈坤。因两陈被捕株连而逮捕审查的广东省公安厅700人、广州市公安局300多人，两陈屈死监狱；1952年2月，罗瑞卿的一份调查报告上讲湖南长沙市公安局长王丕敏的一些劣迹，后此报告罗报送毛泽东，后毛在此报告上批示：“此人该杀”，罗令将王丕敏逮捕，“三反”中王被处决；1955年4月3日，罗奉命将潘汉年以“内奸、叛徒、特务”罪名逮捕，株连逮捕100多人，潘被关押22年病逝，株连其妻董慧，也冤枉坐了15年牢，病逝。1954年底罗将上海市公安局副局长扬帆以“内奸”、“反革命”罪名逮捕，关押28年，株连上海市公安局700人逮捕审查；1955年5月奉命将胡风逮捕，株连逮捕、审查2700多人；1957年整风反右运动中，在公安部打右派64人，定中右（准右派）49人。

以上两陈、王丕敏、潘汉年、扬帆、胡风、公安部反右等冤案，七八十年代均已纠正平反。■

（作者为公安部退休干部）

（责任编辑　杨继绳）

平型关战役与平型关出击战斗

○ 王人广

平型关战役是指1937年9月下旬，中国第二战区部队与日军在山西省东北部的内长城线上进行的一次大规模的作战行动。这次战役从9月20日日军第5师团长板垣征四郎下令所部，以大营为目标，向平型关进攻开始，至当月30日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下令，在内长城防线上的守军全线撤退为止，共计10个昼夜。在战役过程中，初入山西前线的八路军与战区部队协同作战，共同对敌。八路军第115师取得了平型关大捷。

八路军与第二战区指挥关系的确定

八路军改编以后，按照1937年8月20日大本营发出的训令中，战斗序列系统表记载，八路军（第18集团军）属陆军直属单位，与各战区平列。这样，八路军进入山西前线就发生了与第二战区的指挥关系问题。对此，毛泽东于8月31日致电周恩来、秦邦宪、林伯渠："周恩来宜即赴太原、大同晤阎锡山，商量好八路军入山西后各事，即活动地区，作战原则，指挥关系，补充计划等。"9月12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在晋在冀在京，均着重解释我军'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这个基本原则，取得他们的彻底了解与同意。"此原则中包含（一）依照情况使用兵力的自由。（二）红军有发动群众创造根据地组织义勇军之自由。（三）南京只作战略规定，红军有执行此战略之一切自由。（四）坚持依傍山地与不打硬仗的原则。

9月11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明令，八路军改为第18集团军，朱、彭为集团军总、副司令，编入第二战区战斗序列。朱德、彭德怀于14日通令全军。按照常规，八路军此时起即归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指挥。但八路军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队伍，并明确声称执行"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出现了新的指挥关系问题。9月16日，八路军驻太原办事处主任彭雪枫赴位于雁门关南的太和岭口行营与阎锡山会晤，商谈了指挥关系问题。关于今后指挥八路军问题，阎锡山明确提出拟用两个原则："一为事先相互商议；二为临时将计划部署通知八路军，由八路军自行酌量行动。"这种指挥关系的确立，为以后双方在处理作战方面的问题，明确了基本原则。当然，八路军的计划和战斗部署也会发生一定的影响。

第二战区砂河决战计划的实施

华北日军第5师团于8月下旬攻占了南口地区，接着沿平绥铁路西进，并与占领张家口的察哈尔派遣兵团会师。接着第5师团南下，直逼内长城沿线。察哈尔派遣兵团由张家口西进，9月13日占领大同。14日，日军第21旅团占领广灵，当即派4个大队分别向浑源和灵丘追击。这时，阎锡山发觉，日军是进攻平型关，以抄击雁门关后方。他即制定了一个把日军放进平型关以内进行围歼的作战计划。其方针是：拟诱敌深入到砂河以西地区，从恒山、五台山两方面发动钳击，并截断平型关要隘，歼灭敌军于滹沱河上游盆地里。据此，阎又按他的决战设想，调整军事部署：在平型关正面，以第6集团军总司令杨爱源（由孙楚副总司令实际负责指挥）指挥第33军、第17军，布防于平型关、团城口南北线上，右起五台山东北，排列独立第3旅、第73师、独立第8旅，迄于平型关正面；北亘团城口，并列第17军的第84师和第21师。此外，对南、北机动兵团也作了具体部署。

彭德怀将阎锡山的砂河决战计划电告中共中央。毛泽东回复彭德怀电报中说："阎锡山现在处于不打一仗则不能答复山西民众，要打一仗则毫无把握的矛盾中，他的这种矛盾是不能解决

的。你估计放弃平型关,企图在砂河决战的决心是动摇的,这种估计是完全对的。他的部下全无决心,他的军队已失战斗力,也许在雁门关、平型关、砂河一带会被迫地举行决战,然而大势所趋,必难持久。”这种分析与预见,实践证明是完全正确的。

林彪(左一)、聂荣臻(左三)在指挥战斗

林彪提出集中兵力侧击进攻平型关之敌的主张

9月14日,林彪率115师343旅、独立团和骑兵营到达平型关西南侧的大营镇待机。

当日,林彪向中央军委和八路军总部发出在当前情况下115师行动计划的电报。他在电报中说:“在广灵失守,灵丘附近到敌之情况下,原定115师经灵丘到涞源的计划已不执行。现拟将343旅及师直集中大营,准备待敌侧攻大营东之平型关友军阵地时,我相机袭击敌之左侧后,歼敌一部,以扩大战果。”

毛泽东收到林彪的电报后,于16日致电林彪,指出:“日寇某军自天镇向广灵、关东军自蔚县急进。晋阎拟集中14个团与敌决战,希望我115师参加作战。我军应坚持既定方针,用游击战斗配合友军作战。此方针在京与蒋、何决定。周、彭又在晋与阎当面决定。基本不要动摇此方针。”

17日,林彪致电毛泽东,提出他对当前115师行动原则。他说,“我目前采取的行动原则,是在敌目前正在进攻的情况下,我先头旅以作战灭敌为主要任务。关于第115师目前行动方针,不只343旅应在现地域协同友军作战,师直及344旅亦应同样任务而靠近343旅,暂不应以做群众工作为中心任务而进驻阜平。理由是:(一)目前敌正在前进中,运动中,作战中,为我进行运动战之良好机会。我友军目前尚有抗敌人之相当力量,为能得到友军作战之良好机会。现地域为山地,为求山地战之良好机会。倘过此时机,敌已击破友军,通过山地并进占诸主要城市时,即较难求运动战、山地战及友军配合作战。(二)目前军民正在看我军直接参战,如我参战兵力过少,则有失众望。(三)兵力过小则不能将以绝对优势兵力消灭敌之一部以上。(四)目前须以打胜仗、捉俘虏,提高军民抗战信心,提高党与红军威信。(五)目前第一仗实以集中约一师的兵力为好,待尔后客观情况上已失去一师兵力作运动战之可能时,再分散作群众工作和游击。”

就在17日这天,毛泽东《关于敌情判断及八路军之战略部署致朱、彭等前方将领电》,请各将领提出意见并电复。林彪复电完全同意。可惜林彪复电的内容笔者没有看到,不过从9月21日毛泽东致彭德怀电中对于林复电的内容有所披露。电文中说:“林彪同志来电完全同意我十七日的判断和部署,他只想以陈旅集中相机给敌以打击,暂时不分散。”

“陈旅”即指陈光为旅长的115师343旅。该旅只有两个团,这与林集中全师兵力打仗的主张不够一致。

林彪集中兵力打运动战的主张显然与毛泽东的思想相悖。

毛泽东强调“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

毛泽东的战略思想与八路军的作战原则,是洛川会议通过的“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为了贯彻落实这一方针,他对党内外、军内外,从各方面展开了一系列的说服工作。

对国民党当局和地方实力派表明八路军的作战原则。早在1937年8月1日,毛泽东致周恩来、博古、林伯渠电指出:“在整个战略方针下,执行独立自主的分散作战的游击战争,而不是阵地战,也不是集中作战……”8月10日,毛泽东致彭

雪枫电。指示彭“同各方接洽，在积极推动抗战的总方针下，要有谦逊的态度，不可自夸红军的长处，不可说红军抗日一定打胜仗……不可隐瞒红军若干不应该隐瞒的缺点，例如只会打游击战，不会打阵地战。”9月12日，致电彭德怀：“在晋在冀在京，均着重解释我军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这个基本原则，取得他们的彻底了解与同意。”

告诫前方各将领，必须认识八路军在当前抗战中的地位和作用。他在9月17日致朱德等前方将领说：“红军此时是支队性质，不起决战的决定作用。但如部署得当，能起在华北（主要在山西）支持游击战争的决定作用。”在9月21日致彭德怀的电报中，再次强调：“今日红军在决战问题上，不起任何决定作用，而有一种自己的拿手好戏，这种拿手好戏中一定能起决定作用，这就是真正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不是运动战）。”

必须坚持“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既定方针。他说：“为真正进行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为广泛发动群众，组织义勇军，创造游击根据地，支持华北游击战争，并为扩大红军本身起见。”对八路军的部署作了重新的规定。他电示第115师：“我应坚持既定之作战方针，用游击战争配合友军作战，不应动摇这个方针。”

强调分散做群众工作。“集中打仗则不能做群众工作，做群众工作则不能集中打仗，二者不能并举。然而，只有分散做群众工作，才是决定地制胜敌人，援助友军的唯一无二的办法。集中打仗在目前是毫无结果之可言的。”

教导前方将领：“不管决战胜败如何，太原与整个华北都是危如累卵。个别同志对于这种客观的必然的趋势，似乎还没有深刻认识，被暂时情况所诱惑。如果这种观点不变，势必红军也同阎锡山相似，陷入被动的，应付的，挨打的，被敌各个击破的境遇中。”他教导大家：“目前情况与过去国内战争根本不同，不能回想过去的味道，还要在目前照样再做。”

9月25日，毛泽东致电周恩来并转刘少奇、杨尚昆、朱瑞，并告朱德、彭德怀、任弼时：“整个华北工作，应以游击战争为唯一方向，一切工作，例如兵运、统一战线等，应环绕于游击战争。华北正规战如失败，我们不负责任；但游击战争如失败，我们须负严重的责任。”

以上笔者引用了毛泽东1937年9月25日前有关我军的战略方针与八路军的作战原则的电报。从这些电报的字里行间，都表现了他反对集中兵力打运动战而强调打游击战的思想。

八路军计划调整战略部署

9月16日，毛泽东关于调整八路军各师活动地区致朱德、任弼时电：“（甲）日寇分两路进攻广灵、灵丘，晋军已放弃大同，绥远全境实际已失。以五台为中心之晋东北，日寇将以重兵进据，并继续进攻取太原。在此情况下，我三个师已无集中晋东北一处之可能，更无此必要。（乙）拟以115师位于晋东北，以五台为活动重心，暂时在灵丘、涞源，不利时逐渐南移，改以太行山脉为活动区。以120师位于晋西北，以管涔山脉及吕梁山脉之北部为活动地区。以129师位于晋南，以太岳山脉为活动地区。”

9月17日，毛泽东关于敌情判断及战略部署致朱德等电，其中除敌情判断外指出：“过去决定八路军全部在恒山山脉创造游击根据地的计划，在上述敌我情况下，已根本不适用了。”“为战略上展开于机动地位，即展开于敌之翼侧，钳制敌之进攻太原与继续南下，援助晋绥军使之不过于损失力量，为真正进行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为广泛发动群众，组织义勇军，创造游击根据地，支持华北游击战争，并为扩大八路军本身起见，拟变更原定部署，采取如下之战略部署：（一）我120师应集结于太原以北之忻县待命，准备在取得阎之同意下，转至晋西北管涔山等地区活动。（二）我129师于适当时机，进至吕梁山脉活动。（三）我115师则以自觉的被动姿势，现时进入恒山山脉南段活动，如敌南进，而友军又未能将其击退，则准备依情况逐渐南移，展开于晋东南之太行、太岳两山脉中。（四）总部进至太原地区，依情况决定适当位置。”

9月18日，毛泽东致朱德、任弼时电：“恒山山脉是第一战区与第二战区接合部。敌主力必从此进。我林师现已当了正面，处于完全的被动地位。贺师决不能再用此方，应速向晋西北转进。”“兄应速去太原转雁门关与阎商贺师防地。”

当日，彭德怀关于华北战局及军事部署致毛泽东电："目前部署：甲、以115师进到灵丘及涞源以南，相机侧击敌之一部。乙、120师及总直属队进到阜平、五台及灵丘以南，加紧发动群众及组织游击队。丙、129师在南京承认宣言及边区政府发表，即出动晋西北，小部向绥远发展游击战争。""上项布置请立即考虑电复，以便明午后往代县见阎，具体商定繁、五、盂、寿、平五县部署及晋西北、绥远部署。"

平型关战役计划的策定

9月19日这天，恰好阎锡山由岭口回到太原。当日晚间7时，彭德怀偕彭雪枫一同与阎锡山会晤。参加会晤的还有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主管作战的黄绍竑部长。他是专程前来指导第二战区作战的。

这次会晤，实际上成为策定平型关战役计划的十分重要的谈判。

谈判进入正题以后，阎锡山提出，决定以24个团的兵力，在砂河与繁峙之间与敌决战。就是将进攻平型关的日军放进关内来打。要求八路军两个师集中在灵丘东南地区，袭击进攻敌人的左侧背。

阎锡山与朱德会晤

彭德怀根据毛泽东调整八路军战略部署的指示说明，第115师已经向灵丘以南地区集结，120师出晋西北，位于大同与太原之外翼向绥远省与大同游击。对此阎不十分赞成，黄绍竑则坚决反对。彭德怀再次坚持120师出晋西北的意见。阎锡山提出了一个折衷方案，即120师直属队带一个旅出晋西北，以神池为指挥的中心，主力集中在神池、宁武地区整训，以一部兵力伸出左云、右玉向敌游击。于是，彭德怀提出一个具体方案：以115师343旅集结在灵丘及上寨地区，相机协助战区正面守军袭击敌之侧翼。师直及344旅进至阜平地区待机。第120师师直及358旅出晋西北，以神池为中心，主力集中在神池、宁武地区整训，一部伸出左云、右玉向敌游击，并且在晋西北地区发动群众。120师359旅进击五台东北，阜平以南地区，依情况逐渐向南发展。这一方案阎表示同意。至此，一个完整的平型关战役计划定了下来。彭德怀于20日将会谈结果电报毛泽东。

这时，晋北前线的形势正在迅速发生变化。

9月19日，占领蔚县的日军第5师团长板垣征四郎决定以一部兵力进入大营镇，以保障师团主力第9旅团向保定方面转移。20日，板垣命令在广灵的步兵第21旅团长指挥第42联队第2大队及野炮兵一个大队向灵丘进攻。这时，阎锡山听取了第6集团军副总司令孙楚的建议，放弃了将日军放进关内在砂河决战的计划，重新调整部署，以当时在平型关、团城口的部队固守在这一地区，并将第17军的第21师向北翼延展，与恒山第15军相连接，掩护恒山东侧。孙楚遵照阎锡山的指示，向所属各部发出坚守平型关、团城口并相机出击的命令。

八路军第115师，按协商好的平型关战役计划，将位于大营镇集结待机的343旅、独立团和骑兵营，向便于侧击进攻平型关的上寨、冉庄地区转移。林彪师长于20日乘车出平型关，在关沟、老爷庙、蔡家峪等地勘察。当日还进到灵丘城侦察敌情。

这样，一个完整的平型关战役计划已经实际完成。

平型关出击战斗的决策与实施

9月21日，日军第5师团第21旅团长三浦敏事率领第21联队第3大队和第11联队第1大队及炮兵一部，由灵丘出发，以大营镇为目标，沿灵丘到平型关的公路追击后撤的第73师部队。22日晨，该部日军在蔡家峪附近与正在破坏公路的新编第11团的一个营遭遇，该营与日军战斗半日，遭受严重伤亡后撤退。接着该部日军又与第84师派往蔡家峪地区的掩护部队一个营遭遇。日军将该营击溃后，即向平型关进攻。在平型关守军阵地前，日军与守军独立第8旅第623团前进阵地上警戒的一个连发生战斗。该连伤亡过半，被日军击溃。当日夜，日军猛攻东、西跑池南北侧各高地。守军第623团第2营第5、6两连坚守阵地，与日军数番肉搏，阻止了日军的攻击。

进占浑源的日军第21旅团第21联队主力，于21日经小道沟、西河村向大营西北地区进攻。22日，该部日军也加入了平型关方面的战斗。

23日晨，日军一部绕蔡家峪转攻团城口，第17军第502团迎击日军，阻止了日军的攻击。日军随即以一部迂回东、西跑池南北高地。独立第8旅在此防御的两个连全部殉国，高地被日军占领。孙楚急忙组织部队反击，至下午1时，将上述地区收复。攻击团城口的日军也在当日下午停止了攻击。

这天，阎锡山决定用总预备队中的第71师附新编第2师，共8个团的兵力，从公路以北地区，向东、西跑池、小寨间迂回，侧击日军的右侧背；以八路军第115师从平型关东面的山地夹击日军，断敌后路；以第72师和第35军的两个旅为总预备队，以第7集团军总司令傅作义为出击战斗总指挥。出击计划决定以后，当即电告八路军朱德总司令：“我决歼灭平型关之敌，增加8团兵力，明拂晓可到，希电林师夹击敌之侧背。”电令第71师即时集结，于晚间速向大营东北地区前进，归孙楚副总司令指挥；电令72师，迅速向砂河前进待命。出击时间定为24日拂晓。

进到上寨、冉庄地区的115师343旅于23日上午召开连以上干部会，林彪师长作战斗动员讲话，他在讲话中说明当时情况，我军胜利的条件和作战应注意之点。最后他说：“我们一定要在这一带打一个大仗，给兽军一个打击，给友军一个配合，给部队一个兴奋！”这时，接到了朱德、彭德怀的电报：“林并告聂：据阎电，敌于昨夜以来忽袭击我平型关阵地，现在激战中。115师即向平型关、灵丘间出动，机动侧击向平型关进攻之敌，但须控制一部于灵丘以南，保障自己之左侧。”接到电报后，动员会即结束，林命令部队下午即向冉庄地区开进。

当日晚间，朱德、彭德怀电报毛泽东：“灵丘之敌于昨晚返平型关附近，正在激战中。我115师今晚以三个团集结于冉庄，准备配合平型关部队侧击该敌。另以师直属队并一部及独立团出动于灵丘以北活动。”同时，电报蒋介石、阎锡山：“我部主力已集中平型关东南之冉庄附近，准备明拂晓协同友军侧击进攻平型关之敌。另组一独立支队3000人，已从涞源、灵丘间向广灵及广灵以北袭击敌之后续部队，消灭敌之后方警戒部队。得手后即转向紫荆关西北，袭扰进攻我第一战区之敌，我骑兵支队已向涞源南及涞、蔚间袭扰，抑留该敌东进。”

傅作义赶往前线指挥出击战斗

傅作义接到阎锡山让他担任出击战斗总指挥的命令后，于23日中午赶到第6集团军总部所在地东山底，这个小村位于大营镇西南数十里。此时，大营镇为第33军军部所在地。因为孙楚为第6集团军副总司令，所以大营也成为第6集团军的前方指挥所。

傅作义到达东山底后，由于距24日拂晓出击仅有半个白天和一个夜晚的时间，而担任出击的部队尚在砂河地区，因而傅急忙命令第71师并指挥新编第2师，由砂河迅速向大营东北地区前进；第72师迅速向砂河前进；第35军之211、212旅集结在阳明堡待命。

第71师郭宗汾部共3个旅6个团，配属一个山炮营，于9月22日经过繁峙城东进。他们在23日中午刚刚到砂河待命，就接到傅作义要其向大营以东地区开进的命令。郭立即通知各部用饭后出发，并通知原已在砂河的新编第2师立即出发，向大营以东开进。当日下午，第71师部队正在开进途中，又接到命令要求他们必须在下午6时前到达大营

平型关前线总指挥傅作义

以东齐城一带。郭宗汾便一方面催促部队加速前进，另方面自己带了几名随从乘马到前方指挥部受领新的任务。下午5时许，郭到达指挥部后向傅报告，由于部队连日行军疲劳，今日下午6时前，无论如何也来不到指定位置。

在这种情况下，傅作义便与杨爱源、孙楚商量，改变原定计划，将出击敌人的时间延长到25日。并发紧急电报经阎锡山批准。然后傅亲自给阎打电话，说明推迟的理由。傅还请阎将改变时间的决定务必立即转告八路军第115师，并请115师于24日派一联络军官，带该师侧击敌人的计划到东山底联系。

24日9时，傅作义、杨爱源、孙楚与115师联络参谋商定了25日拂晓出击的具体作战计划，策定作战指导如下：

（一）正面以第71师附新编第2师为主攻部队，第84师仍固守原阵地。

（二）第71师以一个团自团城口至2141.96高地间沿山麓向东攻击，再向南旋回，以蔡家峪、小寨为攻击目标；以两个团由2141.96高地至西河口间向东攻击，并掩护团城口正面攻击部队之左侧背，截断敌人向浑源撤退之道，以王庄堡为攻击目标；以一个团为预备队，由团城口附近前进。

（三）独立第8旅以一部协同第71师攻击，以辛庄为攻击目标。

（四）第115师担任敌后各地之攻击，以东河南、蔡家峪为目标。

上述计划立即下发，并送第115师。

笔者用灵丘县地图，对照这一计划，可看出，正面出击部队的攻击目标，辛庄、小寨、蔡家峪均在关沟至蔡家峪的十余里长沟以内，实际上与担任侧击任务的第115师的作战地域，形成了一条战斗分界线。这一分界线对115师的战斗部署造成了严重影响。

大战前夕

出击战延缓一天，这给部队有了较多的准备时间。

24日晨，日军继续向平型关、东跑池、1886.4高地和讲堂村守军阵地猛攻。两军激战终日。

担任出击的第71师于24日晨抵达大营镇，进行战前准备。当日下午3时20分，郭宗汾发出“战字第10号”命令，命令的要点如下：军以歼灭东、西跑池及1884.6高地敌人之目的，于明（25）日拂晓保持重点于右翼取1884.6高地，同时向左席卷，歼敌于小寨村以西谷地。第202旅附炮23团2营（欠一连）为右翼队，向1886.4高地及东西跑池之敌攻击。第428团为中央队，掩护第202旅左侧，相机向上、下铺西之敌攻击，为协同密确，受陈旅长指挥。新编第2师为左翼队，由团城口向寒水村以北及1760高地出击，相机占领小寨村，断敌归路。

命令具体表明了三个队的战斗分界线。攻击开始的时间为明（25）日上午4时。

担任侧击任务的八路军115师，24日全天继续进行战斗动员。上午，聂荣臻率领部分旅、团干部到现场进一步进行了地形勘察。黄昏后，师部接到出击指挥部“25日平型关出击计划”，要求115师依计划进行侧击。林彪和聂荣臻在烛光下把军用地图详细研究以后，就用电话下达了“本晚24时出发向白崖台前进！”的命令。命令

下达以后，林、聂又将执行出击计划的战斗部署通报了出击指挥部。

9月24日夜间，平型关地区大雨。

因东山底距团城口前线较远，傅作义于下午7时率总部幕僚进驻大营镇附近的河南村，子夜12时到达后，得到了下列情报。

（一）郭宗汾第71师正向攻击位置运动中，因天雨行动困难，明拂晓之攻击开始，恐须延后2小时，郭师长因顾虑正面兵力薄弱，以金宪章师担任对王庄堡之攻击。

（二）第72师陈长捷部，夜12时抵大营齐城村附近，准备支援第71师之战斗。该师归71师郭宗汾指挥。

（三）最令傅欣慰的是看到115师的通报，通报中称：对各攻击目标派出之兵力如下：东河南步兵一团，蔡家峪步兵一团，关沟村控置步兵一团。此外，并派遣其教导营向灵丘、广灵推进，扰乱敌之后方。

平型关大捷

24日子夜12时以后，日军第21联队第3大队对平型关守军第84师阵地发动了夜间袭击。守军抵抗后即向后撤退。使日军占领了团城口与西跑池之间二公里的地段。这给第71师出击战斗造成极端困难！

担任出击任务的第71师按原定计划出击，郭宗汾师长于25日凌晨4时、4时30分，发出攻击命令。这样，中、日两军即在长城线南侧的鹞子涧、迷回村、1850高地等处展开激战。原出击计划整个被打破。这一情况的出现，给115师单独消灭敌人创造了有利条件。

担任侧击任务的115师，于25日拂晓到达预定的作战地区时，却未遇到日军的活动。约在上午8时，意外地发现了有大批日军乘汽车沿东河南镇进入小寨、关沟向平型关前进。林彪、聂荣臻抓住这一歼敌良机，机动灵活地立即指挥部队展开，并向敌人发动攻击。在此平型关外的山沟及两侧，部队充分发挥出山地战的特长。林彪、聂荣臻也展现了他们指挥作战的才能。

115师消灭了沟内的敌人后，又主动地对东跑池地区的日军进攻。战斗仍在进行中，林彪、聂荣臻即发出胜利的捷报。

“（一）敌原分布在东、西跑池，关沟，辛庄一带，小部在小寨村。（二）我自晨至夕激战终日，关沟、辛庄一带阵地完全夺取，并将东跑池以北之1886.4高地阵地占领。东跑池以南阵地亦夺取。敌现陷于我之包围中。目前正夺取小寨。（三）计缴获汽车六十，摩托车三架，钢炮一门，炮弹二千发，其他军用品甚多，正在清查中。被我包围之敌军均被我打死。敌虽负伤，亦以刀刺我，死不缴枪。（四）打了一天，至黄昏始见晋军之出击部队，所谓二路出击全是鬼话。（五）现战况已成对峙中。能否解决，要看晋军能否出力。（六）我伤亡约三四百名。（七）我正整理队伍，配合友军再战。”

26日，林彪、聂荣臻电报毛泽东、朱德、彭德怀等：“（一）昨日与敌第21联队战斗一昼夜，将敌歼灭一千余人，缴获军用汽车七十四辆，炮一门及其他军用品甚多。敌颇顽强，负伤自杀非死不缴枪，故无一生俘。（二）我军伤亡三四百。负伤副团长二，营长二，其余待查。（三）昨晚和今晨敌由灵丘继续增援。故于今晨我将部队撤至白崖台附近集结。钳制援敌，以便晋军消灭残余敌一部。（四）汽车及一部军用品今晨已全毁。”

这就是“平型关大捷”。

平型关出击战斗，以主攻部队（第71师）的失败、侧击部队（第115师）的胜利结束。

在战后的第五天，即9月30日，林彪、聂荣臻在致朱德、彭德怀并告毛泽东的电报中说：“本师因采取了将当前任务放在打仗上，而不放在扩红上；因集中了兵力，未将徐旅及师直开驻关沟、阜平；因把部队放在冉庄、上寨敌之侧面荫蔽，而未放在大营、灵丘正面暴露；因采取了袭击，而未采取正规战，故取得平型关战斗的胜利。”

林彪在《平型关战斗的经验》中说：“利用敌人攻击友军阵地时，袭击敌人后方，这是最好的战法。比在其行动中和刚到阵地而未站住脚时袭击还要好些。这次就是利用敌人以全副兵力注意对付友军时，突然在他们后方大打起来。”

平型关出击战斗结束了，但是平型关战役仍在继续进行，直到9月30日阎锡山下令内长城线上的军队全线撤退为止。■

（作者为军队离休干部）

（责任编辑　杨继绳）

文革道县周边大屠杀

○ 谭合成

1967年8月13日到10月17日，湖南省道县经历了66天的大屠杀，被杀死4519人，被杀绝的117户，道县大屠杀通过各种媒介，已广为人知。当时道县周边地区也大开杀戒，知道的人不多，现作简单介绍。

宁远县

宁远县1967年8月18日开始杀人。

梅岗公社小欧家大队与道县杨家公社郑家大队一山之隔。郑家大队杀人后，一些四类分子(子女)跑到宁远这边山上躲藏。小欧家大队的一个社员上山打柴，听到冲里有人说话，走过去一看，没有人，却看到地上有人坐过的痕迹，还有几颗“喇叭筒”的烟蒂子，赶快回去向大队支部报告了，很快流言四起：

“道县黑杀团在我们县里开会了，要‘先杀党、后杀干，贫下中农一扫光，中农杀一半。’”

“道县的四类分子和我们这边的四类分子串联，准备‘八月大组织，九月大暴动，十月大屠杀’。”

8月18日(农历七月十三)，小欧家大队一个在外面做手艺的外流人员(非四类分子)回家过节，带了两个身份不明的陌生人，引起人们的高度警惕。大队党支部和群众组织“红联”召开联席会议，决定对该外流人员和地主分子欧涛玉等四人采取革命行动。当晚便将4人杀害。

自此，杀人风从道县刮到了宁远。

接着，麦地公社路田大队，以公社贫协主席、文革主任为首，把38名地富分子及子女像柳条儿串鱼一样捆在一起，推下废红薯窖，放火熏死后，盖土掩埋。

晓睦塘公社党委书记李远生当时在晓睦塘大队蹲点，听到杀人风声后，立即召集大队干部开会研究杀人问题，大队干部问他怎么搞，他笑而不答，从地上捡起一根稻草，以掌代刀，做了个砍的姿势。但下面有人还没有理解深透，又问了一句：“李书记，你是说……？”大队会计有点文化脑子活接了一句：“死蠢，这都不懂，李书记是讲斩草除根。”李远生高兴地在他肩头拍了一巴掌：“聪明！”当即分工，全大队按照自然村分为两片，均由支委负责，分头行动。农历八月二十二早晨，以召集地富分子及子女分萝卜田为名，将其骗至预定地点，突然袭击，全大队地富分子及家小共68人被推入地窖活埋。

在屠杀中有的家被全家不分老小全部杀绝。清水桥公社吕家大队吕成高一家灭门案中被杀了10人。

弯子里大队是宁远杀人最血腥的一个大队。这个村子不大，村民多数姓郑。1967年中秋节后的第五天，仅仅一个早晨，小小山村就有50多人(主要是地富及子女)被大队干部指挥民兵用乱刀砍死，抛尸地窖。被害人中，身材高大的郑工金被砍死后，身子进不了窖眼，杀人凶手用锄头将其切断成三段，塞进窖里。12岁的少年郑山壮为了逃命，跑到山上，爬到一棵树上躲起来，结果还是被抓了下来，他跪在地上，拼命磕头：“叔叔伯伯莫杀我，我一世替你们做牛做马都要得。”这话成了这个少年的遗言。17岁的少女郑翠云，因为长得秀气，被本村的几个人拖到大队小学里面轮奸后，活活砍死。12岁的女孩郑见品，慌乱中爬进一条寒气逼人的阴沟，在里面躲了三天三夜，总算留下一条小命。村里三个光棍汉，趁机将三个有点姿色的地富家的女人关起来，等到杀了她们的丈夫，就“堂堂正正”地娶回家来。其中一个女人，已怀孕9个月，因肚子太大，一时不便娶回家，准备生产之后，再娶，后设法逃脱，在外面重新嫁了人，总算逃脱了刀口嫁人的命运。

因隔河较远，河汉分布不及道县丰沛，杀人方式多为刀砍和活埋。

文革中的杀人场景

社长、文革主任。大石桥公社立即顺藤摸瓜，严刑逼供，大肆追查，并成立公社“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院”，召开万人大会公开审判，杀了14人。曾参加过桂东游击队、担任过江华地下解放武装分队长的老地下党员唐家雄也在其中被执行了“死刑”。

原国民党起义将领、黄埔军校四期毕业生虞上懃（原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江华的堂兄）被反复批斗，刑讯逼供，逼他供认江华是叛徒、假党员，虞因不堪凌辱被逼自缢身亡。

该县文革杀人从1967年8月18日开始至10月25日结束，共杀1092人（含被迫自杀），全地区排名第二。

江华瑶族自治县

江华县文革杀人事件1967年8月29日始至10月25日止，历时57天，共杀898人（含被迫自杀）。

8月下旬，道县洪塘营公社地主（子弟）杨铁桥全家5口被杀4口，仅杨只身逃脱，逃跑到江华县湘江公社苗子园大队亲戚家避难。洪塘营公社多次派人前来追捕，同时散布道县杀人情况。苗子园大队干部开会讨论，认为“调皮捣蛋”的四类分子，道县杀得，我们这里也杀得。于是在8月29日把大队上一名有男女作风问题的富农子弟拖上山投了天坑。在全县首开杀戒。

贝江公社贝江大队，有人提出“阶级敌人全杀光，从此天下就太平”的口号，把全大队所有的地富分子及有各种历史问题的人全部杀光。

大石桥公社妇女主任在回公社的路上，看到几个地富分子坐在路边抽烟、聊天儿，认为是四类分子开黑会、搞暴动（实际上是出义务工修路，工间休息），立即到公社报告了。公社领导马上组织民兵将人抓来公社，刑讯逼供。连续吊打三天三夜。其中一个名叫江光芳的富农分子熬刑不过，瞎编乱造，供认参加了所谓“反共救国军”，同时供出成员131名，其中竟然包括公社书记、

该县杀人起步稍晚，动手时6950部队已进驻道县制止杀人，封刀时已到是年深秋，数量上虽然比不上道县老大哥，造成杀人的深层原因却极为相似。当时，实际行使政府职权的江华县“抓革命促生产”领导小组和县武装部的主要领导，对杀人事件或明或暗地采取了纵容态度。

江永县

江永县文革杀人事件开始于1967年8月17日。该日上午，桃川公社石砚大队下放知青王××在江永县城被杀。同日晚，江永县铜山岭农场跃进大队召开全场职工大会，枪毙两名老“地主”和两名“地主狗崽子”，并吊死一名丧失阶级立场嫁给“地主狗崽子”的青年妇女。农场数百名职工和近百名知识青年被通知到队部禾堂看处决，“经受阶级斗争的洗礼”。

将该县文革杀人事件推向高潮的是界牌公社党委书记杨修玉。杨修玉系道县祥霖铺人，大屠杀期间，他回道县探亲，沿途看到河里飘着死尸，树上挂着死尸，又到道县的同僚那里取了点经，很受启发和鼓舞。回公社后，于8月25日召开全社各大队“五巨头”（书记、队长、民兵队长、公安员等五人）会议，把在道县看到的一些情况和道听途说的一些谣言，向各大队的“五巨头”们吹了吹风。所以这次会议又被称为“8·25杀人吹风会”。

第二天，公社又召开各大队贫下中农造反兵团（即贫协）负责人会议，分析形势，研究对策。正在开会，文革大队党支部书记刘自进带领一些人，敲锣打鼓进了会场，向公社报喜：

“具有高度阶级斗争觉悟的文革大队贫下中农，粉碎了一次阶级敌人的暴动阴谋，镇压了6名阶级敌人，特向公社报喜！”

会场顿时开了锅，人们再也坐不住了。

“还开什么啰，文革大队走在我们前面了，我们落后了。”

“说一千，道一万，不如实际干一干！”

“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还等在这里干什么？赶快回去行动哦。”

一哄而散。纷纷赶回大队部署杀人。三天之内，全社共杀126人。

紧接着允山公社公安特派员张文德为首策划，趁允山赶闹子的时机，以允山公社“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院”的名义，枪毙了该公社的3名四类分子，围观者数以千计。张文德亲自起草杀人布告，布告的落款也很值得玩味：

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贫下中农

副院长造反派

这张布告，张文德命人抄写几十份，从允山一直张贴到江永县与广西搭界的龙虎关，沿途六十余里，经过允山、回龙圩、夏层铺、桃川、粗石江、源口六个公社，整个江永县为之轰动。

江永县文革杀人事件中共杀325人（含被迫自杀）。

双牌县

双牌县文革杀人事件共杀345人（其中被迫自杀48人）。杀人的特点是零星、分散、残忍。

双牌县是1970年以后新建的一个县，文革“杀人风”时期叫潇水林业管理局。1978年行政区划调整，原属道县的理家坪公社、车头公社的双峰大队划归双牌县。该县文革“杀人风”主要集中在理家坪和江村两个公社。潇水林业管理局开始杀人的时间是1967年8月23日，最先杀人的是现已划归永州市管辖的何仙观村（大队）。相传该地为何仙姑修炼得道之处，现为零陵地区一个著名的旅游景点。

由于采访任务的需要，我们每到一处都特别关注那些没有杀人的公社（农场、林场）或大队。在双牌县我们看到了一只十分值得解剖的麻雀——阳明山林场。这里山深林密，社情复杂，外流人员多，一直是潇水林业管理局狠抓阶级斗争的点，也是阶级斗争抓得最得力的点。文化大革命中，该林场派性斗争十分激烈，抓的人最多，批斗的人也最多，但是在四面八方都在杀人的情况下，却一个人也没有杀。为什么呢？就是林场武装部长和党委正、副书记在杀人问题上意见一致：他们杀他们的，我们这里没有上级的指示，坚决不动手。

新田县

新田县文革杀人事件以召开万人大会著称。1967年9月8日开始杀人，动手较晚，但声势浩大，不留死角，从9月8日起到10月18日止，历时40天，全县21个公社全部都杀了人，其中18个公社（包括城关镇）由主要领导（公社书记3人，公社主任4人，武装部长12人）为首策划、部署、组织召开了19场万人大会杀人。那段时间，基本上是杀人就要开会，开会就要杀人。全县共杀786人（其中被迫自杀180人），占当时全县总人口的0.35%。

与道县不同的是，新田最先大开杀戒的地方是城关镇，即新田县城。是从城镇杀向农村的。9月8日，新田群众组织“联总”在城关镇召开全镇革命群众大会，枪毙了5名“阶级敌人”。“联总”总指挥王雄宏在大会上说：“我们城关镇是全县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我们在这里杀几个坏家伙，将对全县产生深远的影响！”

王总的估计非常正确。这种开大会杀人的方法马上便为下面各区社效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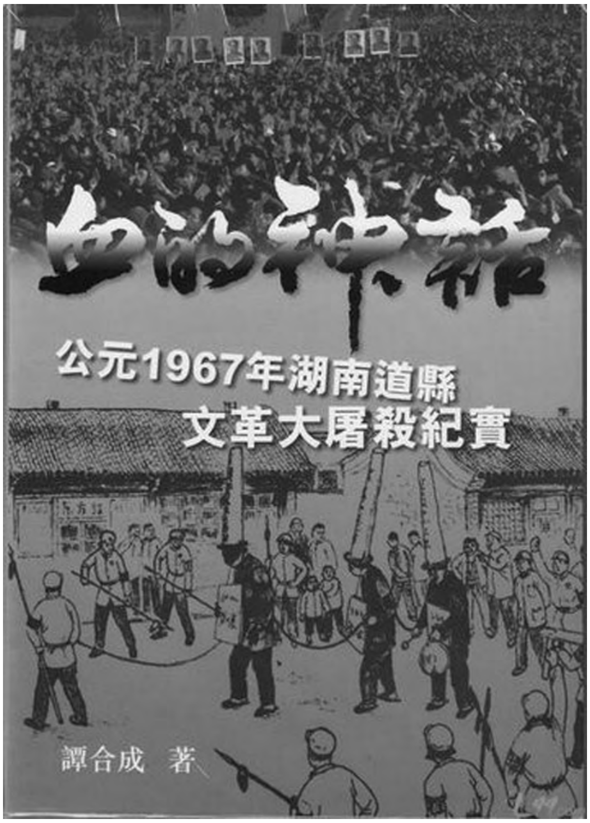
时任县委副书记的“革命亮相干部”肖德雯在他的讲话中没有直接表明对杀人事件的态度，但特意引用了一段毛主席语录：“我们应当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

城关镇万人杀人大会之后，“联总”下属的一个群众组织新田县“湘江风雷”的头头肖邦久起草了一份《紧急倡议书》，在全县范围散发，鼓吹杀人。另一个头头副司令兼县文攻武卫指挥部

指挥长雷玉荣，专门组织了一个手枪队，哪里杀人就到那里去支援。

在新田县文革杀人事件中，当时实际掌握政府权力的县武装部又做了些什么呢？

1967年8月2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47军下发了一个《社情电报》，新田县人武部收到后，专门拟了个通知传达到各公社，该通知只引用了电文的前一部分，即“根据各方反映和部分查证，道县近来四类分子活动嚣张，散发反动传单，凶杀贫下中农，进行反攻倒算，组织反革命组织，阴谋暴动。在县武装部和公安机关处于瘫痪的情况下，广大贫下中农唯恐四类分子翻天，有的主动采取行动。”而对后一部分“我们认为对杀人凶手和四类分子中作恶多端，活动嚣张，企图变天的可以依法严惩外，四类分子不宜滥杀，四类分子子女不能视作四类分子，必须按政策团结教育，不能混淆了专政对象和非专政对象的界限，这样才便于争取四类分子子女……”只字不提。此时新田县还未出现杀人现象，通知传达到各公社后，不少公社写报告、打电话，或派专人来县请示杀人。其中新圩公社反映，他们那里挖出了“501、502、503反动组织”（假案），要搞暴动。陶岭公社反映，他们那里出了个反革命组织“复兴会”（假案），气焰嚣张，企图复辟，扬言要杀干部、贫下中农。骥村公社武装部长接县人武部通知后，于9月8日，主持召开大队支部书记、文革主任、民兵营长、治保主任紧急会议，传达县人武部通知。并在会上说：“道县的四类分子进行阶级报复，杀贫下中农，阶级敌人兴风作浪，贫下中农遭殃。我们公社敌情复杂，对罪大恶极的四类分子，该杀的要杀，该管的要管，不杀几个，这股歪风刹不下去。”会后，各大队分头行动，基本上是仿照道县模式，开始杀人，全社共杀48人。枧头公社也在同一天（9月8日）召开公社干部紧急会议，会议由公社武装部长主持，并在会上说：“我们公社四类分子很猖狂，他们在秀凉山开黑会成立了反动组织‘205独立师’（假案），他们的纲领是：‘8月15日砍高粱，先杀党，后杀干，中农杀一半，贫下中农全杀光。’我们民兵要武装起来，镇压阶级敌人。再不动手，我们贫下中农要吃大亏了。”会后，给三个武装民兵排发了子弹，这些民兵背着枪杠着红旗，敲锣打鼓下到各大队去支援杀人。全社共杀113人，是全县12个公社中杀人最多的。



从县人武部的这个通知发下之后，（1967年）9月8日至12日，短短4天时间，全县已有15个公社出现了杀人事件，被杀人数为129人。各方面反映十分强烈。直到这时，县人武部才于9月12日召开全县各公社武装部长会议，传达47军《社情电报》的后半部分，但没有具体提出制止杀人的措施。不但没有起到任何制止杀人的作用，反而在会后出现了第二次杀人高潮，从9月13日到15日三天时间，全县又杀230人，占杀人总数的40%。

冷水滩市、永州市（零陵县）

这两个市文化大革命时期尚未建市，统属零陵县。

冷水滩市文革杀人事件，除受道县“杀人风”影响外，1967年8月12日的一起刑事案件也起到了某种导火索作用。该日，现属冷水滩市的郝皮桥公社庄冲大队尹村生产队队长雷付生与邻居地主子弟郑荣垒因小孩玩火引起纠纷，发生斗

殴。打斗中,郑荣垒失手将雷付生打死。郑闯下大祸后,惊慌失措跑到山上躲藏,被大队民兵搜山抓获,当场用石块棍棒打死。8月16日,郝皮桥公社召开群众大会隆重追悼雷付生,声讨四类分子的滔天罪行,要为阶级兄弟报仇雪恨。会上提出"阶级敌人要翻天,我们要坚决镇压"!要求各大队贫下中农行动起来,对郑荣垒这样罪大恶极的四类分子采取"果断措施",打掉阶级敌人的嚣张气焰。追悼会后,各大队开始杀"四类分子",并迅速地引发全市性的杀人事件。

永州市文革杀人事件应当说是从富家桥杀开的。虽然此前,早在7月23日,已经发生了黄田铺公社双江桥大队支部副书记胁迫3名地富子弟将地主分子蒋德生父子3人沉河的事件,但该事件一开始并没有被认为是贫下中农的革命行动,而是视为报复杀人的刑事案件,因而对全市性的杀人事件几乎没有影响。8月下旬,富家桥区富家桥公社永兴桥大队受道县"杀人风"影响杀了该大队3名四类分子。区武装部长唐××接到报告后,感到有必要召开一个会议讨论制止滥杀的问题。于是专门召开了一个全区大队以上干部会议。但是会议的气氛与原来的设想有些格格不入,大谈阶级斗争,大谈各种道听途说的敌情,谈到激动处有的干部甚至捶胸顿足、热泪横流。湖南一带农村干部有个好喝几口小酒的习惯,当年的会议餐不像后来安排得这样周到,一般不安排酒水,所以休会的时候,一些干部打平伙买酒喝;酒买了,没有酒碗,就跑到区供销合作社去借。站日杂柜的营业员是个地富子弟,说:"我们这里的碗不能借,只能买。"借碗的干部不高兴了,说:"你一个地主崽子神气什么!"该营业员仗着自己是吃国家粮的,不把农村人放在眼里,说:"不能借就是不能借,这是国家的财产,借给你用过了,还怎么卖?"结果激起了与会干部的愤怒,把他从柜台里拖了出来,拖到旁边的河边上,从二十多米高的桥上扔进河里,淹死了。

这件事如一粒火星落到一大堆干柴上,立即引起一场大火。"屌他老母亲的,一个地主崽子都敢欺负我们!"与会的社、队干部议论纷纷,越说越气,会也不开了,一声喊,纷纷赶回各自社、队布置杀人。三天功夫杀了158人,占全市杀人总数的一半以上。

蓝山县

蓝山县是整个零陵地区开始杀人最晚的县,(1967年)9月10日才开始杀人,整个文革杀人事件中共杀145人。该县杀人的特点是基层干部阶级斗争觉悟高,大队一级自发追查反革命组织,继而杀掉其中的"骨干"。现已查明,全部系假案。

该县最典型的杀人案例发生在清水大队。该大队杀人时,大队"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院"派了村子里一个"蠢子"(脑筋不太灵活的人)去执刀。因这里杀人也跟道县一样有"手续费",就是给钱或给谷子,这个"蠢子"杀了19个人后,找到大队干部要分谷子。大队会计说:"19个难算,干脆再杀一个凑个整数。"于是这个"蠢子"又跑回去,找到本村一户地主家,把地主家的小孩子随便捉了一个杀掉,凑了20个整数。

祁阳县

该县原属衡阳地区管辖。1967年文革杀人事件中,该县毗连零陵县的周塘公社用捆绑吊打的办法,逼供出一个所谓的"黑杀团"。公社组织委员李新明等人扩大战果,组织深挖广查,很快将该组织成员"发展"到600多名。其他各公社积极响应,追查风扩展到全县33个公社,其间共杀218人,刑讯逼供致伤致残1000余人。

东安县

1967年受道县"杀人风"影响,全县仅杀11人,这在当时根本不算一回事。但是,大规模的道县"杀人风"平息八个月后,1968年6月上旬,该县展开三查(查叛徒、查特务、查走资派)一清(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川岩公社在审查一名有作风(男女关系)问题的妇女时,审出了一个反革命组织"反共救国军"的线索,顺藤抓瓜,抓住了一名叫蒋梧生的外逃地主分子。川岩公社如获至宝,公社书记亲自挂帅,对蒋严刑逼供,"一定要审出点名堂来",蒋梧生受刑不过,交待参加了"反共救国军",而且还是个副司令,司令是井头

康生相信特异功能

○ 陈楚三

1965年五一节期间，我去康生家。康生刚从广州回来不久，兴致勃勃，招呼大家到他的办公室，讲了很长时间。他说，他到广州送别日本共产党总书记宫本显治之后，广东省公安厅领导向他汇报了一件关于“眼睛透视”的事。

有个十多岁的小女孩，一次从学校回家，问爸爸“周总理访问缅甸是什么时候啊”？爸爸回答了她，又很奇怪“你为什么问这个问题”？女儿说学校里要进行时事测验，这是一道测验题；爸爸问她怎么知道的，她说在老师办公室看到测验卷子，是翻过来背面朝上的，但她看到了；爸爸认为她撒谎，批评她不应该偷看卷子，她很委屈。后来有一天，小女孩和爸爸一起走过一座楼房时，小女孩无意间往天空看了一眼，突然问爸爸“爸爸你看，楼顶上为什么有两门炮啊”？爸爸抬头，却只看到楼顶的砖墙。这座楼是当地的政府机关大楼，她的爸爸就在楼里上班，但从来没有上过楼顶，他很惊奇，一问才知道，为防台湾飞机空袭，楼顶配置了两挺高射机枪，女儿不认识，说是两门炮；但女儿连楼门都没有进过，怎么知道这件事的呢？难道她真的“看”到了？爸爸向有关部门汇报了这件事。

公安机关很重视，对这个小女孩进行了多方面测试，发现她可以“透视”很多种材质，例如纸张、木头、布料、砖等等，但不能透视肌肉，不能“看”到握着的拳头内有什么物件。

康生听了汇报后，马上安排亲自测试。

康生首先在一张纸上工工整整写了“我要做毛主席的好学生”几个字，然后把这张纸折了两次再放入一个信封，信封也折起来让小女孩认，女孩开始可能比较紧张，用了较长时间才写出来“我要我要做毛主席的好学生”，多了两个字；康生又在另一张纸上写了“毛主席万岁！万万岁！”并折两次放入信封再折起来，这次小女孩很快认出来，一个字也没错；接着，她“看到”旁边一位工作人员的裤子口袋内有个钱包，钱包里有几枚硬币；公安厅长在她对面，她“看到”厅长的上衣口袋里一件东西，不知道是什么，于是画了出来，一个长长的椭圆，两头有两个点，拿出来一看是一把折起来的小刀。

康生一面向我们讲述，一面把他亲笔写了字的那两张纸拿出来并当场“演示”怎么叠两次、怎么放进信封后再叠起来。康生说，这个小姑娘要特别注意培养，可以为我们的情报工作做出贡献。

康生讲述时，他的孙女张立、张丹，曹轶欧妹妹苏枚的儿子小苏（苏涵）和我在场。■

（责任编辑　杨继绳）

圩公社的历史反革命分子伪连长徐嘉，下设三个团，川岩一个团，井头圩两个团，并供出地富子弟黄春恩等15人为该组织成员。情况汇报到县里，县革命委员会高度重视，在县革命委员会统一部署下，全县普遍开展以追查“反共救国军”为中心的三查一清运动，从1968年6月10日到9月13日，95天中，挖出了一个有2258人参加的庞大的“反革命组织”，追查、刑讯中，打死141人，被逼自杀278人，致伤致残1132人。

在追查“反共救国军”过程中，大搞刑讯逼供，实施了36种刑罚，这些刑罚残忍致极。这些县的大屠杀有几个特点：1. 屠杀规模空前，残忍无比；2. 被杀者为无辜百姓，纯系冤杀；3. 屠杀指挥者为基层政权如武装部、革委会（或革筹）、人民公社和生产队的领导机构；4. 阶级斗争是屠杀的指导思想，屠杀前制造谣言，说阶级敌人要杀人等。因而被屠杀者中多是历次政治运动中制造的政治贱民，如地、富、反、坏、右及其子女。■

（责任编辑　杨继绳）

人本思想和党文化的分歧

○ 张显扬

1987年夏天，胡耀邦下台半年左右，一位友人去看望他，安慰他说："您在人民心中是不会磨灭的。"他回答说："我问心无愧，我的问题二十年以后才能见分晓。"

现在，二十年过去。他的"问题"见分晓没有呢？有的见分晓了，有的还没有。

下台以后，他把在位前后十年间的全部讲话、文章、报告、发言稿，集中清理出来，约数百万言，花三个月时间，从头至尾查看一遍。结果，"没有查到原则性的错误"，他很感安慰。但是，他没有去深思：自己说过写过的东西，讲过做过的事情，从意识形态高度看，和几位超级老人以及参与整他的其他人之间，有没有什么相左的地方。实际上，正是意识形态方面的分歧，才使得他们不仅把他当作犯了大错误的人，而且把他当作离经叛道的异端。

他下台时看到了某些落井下石的人的丑恶行径。但是，他只觉得他们这样做很不正派，却没有把这些做法和他们的意识形态背景联系起来。其实，这正是他们所服膺的党文化使然。见利忘义，出尔反尔，趋炎附势，落井下石，是这个党文化在党内斗争中很正常的表现。几十年来，党内斗争无数，有哪一次不是这样对待不幸沦为斗争对象的人？何况，他不是别人，而是被认定为离经叛道之人。

由于没有把自己的所言所行，上升到意识形态高度去反思。他也没有意识到，自己心中，还深藏着一个与党文化完全不同的以彰显人性为指向的人本思想。这个人本思想，类似于一种潜意识，看似默默无闻，实际上一直在引领着他的思想和行动：或者对党文化作出好意的、人性化的解读，或者和党文化发生龃龉，甚至对立，并最终酿成悲剧。

这就是胡耀邦和他们之间的意识形态分歧：一边是以彰显人性为指向的人本思想；一边是顽固而虚伪的党文化。这也就是胡耀邦下台的意识形态背景。

一、真诚的"人民主体"论者

胡耀邦的以彰显人性为指向的人本思想的核心，是对人民群众发自肺腑的敬畏和关爱。他说过，一个人"不要把自己轻易地依附于什么人，不要把自己轻易地绑在一个什么车上"。但是，要"附属于人民，归根到底还是个人民，还是个人心。"又说："共产党人不能忘了人民这个主体，忘了人民要垮台。今天不垮，以后也会垮。"又说，我们党领导的人民革命事业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都是人民自己的事业。"革命胜利以后，人民就是国家和社会的主人。"又说："作为一个领导干部，要时刻关心人民群众的疾苦，切切实实帮助群众解决问题。要走出办公室，到群众中去，调查研究，了解群众的情绪，倾听群众的呼声。"

类似这样的话，其他领导人也不是没有说过。但是，胡耀邦说了是要照着去做的；而许多人是说给别人听的，说的和做的往往相反。胡耀邦是一个真诚的"人民主体"论者，一切以人民的利益为转移。他们则是"权力至上"论者，一切以党国的权力、实际是他们自己的权力为转移。林彪说过："有权就有一切。"这句话，言简意赅，深刻地揭示了他们的内心世界，为党文化作了非常精准的注脚。

胡耀邦担任党的总书记以后，抓住一切机会到全国各地去调查考察，去贴近民众，去感受他们的气息，他想"走遍全国所有的县"。在位期间，除西藏5个、青海2个、云南3个地区外，他踏访了全国331个地区（州、市）；在1600多个县（占全国2112个县的四分之三）留下了自己的身

影。1980年到1987年的七个春节，有六个在基层，同人民群众一起度过。这在中共领导人中，是极为罕见的，甚至是绝无仅有的。胡耀邦走访基层，并非像批评者说的“呜呜走一圈”。“呜呜走一圈”是面上的调查，他还深入到点上去研究。他走到一个地方，就出一个政策，推动全国工作。他到太行山调查后，看到人民很贫穷，感到对不起人民，就出了一个“扶贫政策”。他到东北调查后，就出了中苏边境贸易政策。许多政策，都是在外地，在基层调查研究时酝酿出来的。

胡耀邦的人本思想，有着鲜明的时代特色和个人特点：他所关注的，是社会实践中的实际问题，不是一般的理论问题。他是革命家、思想家，不是理论家。他的人本思想，不成体系，甚至连“人”这个人本思想的核心概念，都是借助于“人民”、“群众”或“人民群众”这些普通的政治术语来表达的。但它绝对符合人本主义的基本精神。他所理解的人民，不是抽象的集合概念，更不是可以拿来自我标榜的符号，而是由一个一个活生生的人组成的实实在在的群体。所谓人民的幸福，人民的痛苦，都是一个一个活生生的人的幸福和痛苦。他的这种思想，在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干部政策的过程中，表现得最为鲜明：他强调，政策要落实到每一个人，不允许用“多数”或“大多数”这类空泛的言词去搪塞。他说：“落实党的干部政策，要一个人一个人地解决，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地解决，光说空话不行。”他的“人民主体”思想，真正是以“人”为本的，是人本主义在当代中国条件下的独特体现。

文化大革命后，人们从痛苦的反思中提出两个问题：一个是国家和人民的关系；一个是“党性”和“人民性”的关系。两个问题的实质是，究竟党国至上，还是人民至上？提出这两个问题的目的，是想为人民群众争得一点权利，以避免文化大革命那样的灾难重演。这两个问题，即使在今天，仍然具有相当的尖锐性。胡耀邦从他的“人民主体”论出发，对它们都作了合乎民意的解答。

胡耀邦说：我们的同志一定记住，“我们共产党要时时刻刻为人民着想，使人民富裕起来。只要人民富裕起来，我们就有办法了。决不能把人民的利益同国家的利益对立起来，国家的利益离开了人民的利益，就是抽象的，没有意义的。试想，离开了人民，还有什么国家”？

认为国家利益同人民利益相一致，这是传统的党的观念，是党国自己创设的不容争辩的说辞。问题是谁跟谁一致、怎么一致？是人民利益在上，国家利益服从人民利益这样的一致呢，还是国家利益在上，人民利益服从国家利益这样的一致？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政治文化。前者是民主主义，主张人民至上。后者是国家主义，主张国家至上。如果把这种观点塞到社会主义名下，那就是国家社会主义了。“党国主体”论者故意把二者的真实关系掩盖起来：只讲国家利益同人民利益相一致，不讲谁的利益在上，谁跟谁一致。

“党性”和“人民性”的关系问题，是胡绩伟先生1979年3月在全国新闻工作会议的讲话中提出来的（当然，往早说，上世纪四十年代延安时期就已经有这个问题了），他认为“党性和人民性”是一致的。以后又作了进一步解释和发挥，认为“党性来源于阶级性和人民性”。就为了这个“人民性”，胡绩伟遭到胡乔木严厉批判。胡乔木认为“党性来源于人民性”的观点是错误的：“人民性”是一个“含混不清”的概念。其实，“党性”何尝不是一个“含混不清”的概念？问题不在于概念是否清晰。真正使胡乔木不能容忍的是，在奉为至尊的“党性”旁边，胡绩伟居然给安了个“人民性”，而且还是“党性”的来源。这岂不是说，“人民性”是老子，“党性”是儿子，“人民性”高于“党性”吗？这个问题的实质，同国家和人民的关系是一样的，说直白一点，是党大，还是人民大？胡乔木显然认为党在人民之上，党比人民大。

既然争论这么激烈，胡耀邦不能不表明自己的观点。他说：“我们的新闻工作有很高的党性。党性和人民性是一致的。离开人民性就不叫党性。”

在胡耀邦看来，党和国家是为人民服务的工具。人民理所当然地应该在党和国家之上。和胡耀邦不同，“党国主体”论者，平时把“为人民服务”的口号喊得山响，一碰到“国家大还是人民大”、“党大还是人民大”以及“党大还是法大”这类问题，就原形毕露，毫不迟疑地把党和国家置于人民之上。人民，在他们那里不过是工具

而已。

胡耀邦的人本思想，和哲学史上的人本主义，例如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或人本学不同。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是一种哲学，是用来解释世界，揭露宗教本质的。它的对立面是神学，或者也可以说是神本主义，用他在《关于哲学改造的临时纲要》中的话说，“神学的秘密是人本学”。意思是说，不是上帝创造人，而是人创造上帝：上帝是人按照自己的形象、愿望和想象创造出来的虚幻的存在。费尔巴哈是哲学家，而且仅仅是哲学家。在他那里，人只是他的哲学的出发点，具有解释学的意义，并不是他在实践中为之效力的对象。哲学世界以外、现实生活中的人，在他的视野之外，不是他所关心的。

胡耀邦的人本思想所包含的思想内容和社会功能，和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不可同日而语。胡耀邦的人本思想，不是哲学，不是用人来解释世界，说明历史的，而是一种道德理念和做人的原则，是对人的合乎人性的看法和态度。胡耀邦生性善良，不是好斗的人。但是，凡属违反人性，不把人当人的事情，他都毫不含糊地与之斗争。可以说，这是他生平事业中最辉煌、最感人的篇章。

二、反对一切违反人性的东西

在我们国家，对人民群众危害最烈、最可恨的东西，就是官僚主义、个人崇拜、终身制、封建主义，以及以这些东西为基础的制度安排和连绵不断的政治运动。中国人一生中遇到的烦恼、困扰和痛苦，主要不是来自于私人领域，而是来自公权力。官僚主义、个人崇拜、终身制、封建主义这些违反人性的东西，就寄生在这个公权力之中，并且以公权力的面貌出现，因而使人无可逃遁。胡耀邦深知这些东西的危害和人民群众的痛苦，特别是经历了文化大革命以后，认识更加深刻。他在党的最高岗位上这些年，几乎无时无刻不在和这些东西作斗争。

胡耀邦平生最痛恨的是官僚主义：高高在上，当官做老爷，不关心人民群众的冷暖痛痒，颐指气使，把人民当作可以任意使唤的工具。他给官僚主义画像：“忘记了自己的权力是人民给的，忘记了共产党员为人民服务的神圣职责，把自己主管的单位或地方视为独立王国，独断专行，压制民主，破坏法制，侵犯人民的民主权利和人身权利；或者做官当老爷，把自己主管的单位或地方变成一潭死水，无所用心，不关心人民痛痒，遇事不负责任，不分是非，对好人好事不支持，对坏人坏事不处理……”

至于那些贪污腐败、以权谋私的官僚，他更是痛恨有加。有一个地方的官员铺张浪费，违反财经纪律，他严厉批评说：“把人民的钱拿来供自己和少数人享乐，这是什么思想？这是历史上的腐朽没落的走下坡路的阶级的思想，危害很大。凡是统治阶级到没落的时候，都是这样。”“封建上升的时候也不是这样。”某市为了迎接一个中央领导，在半个城内戒严三个小时，群众反映强烈。胡耀邦说，为了一个领导人的某种方便，竟然置人民生计于不顾！随即在一份情况简报上批示：“行为恶劣，无法无天。”每逢看到这类扰民行为，他都很气愤。他坚决主张废除那些助长封建意识的东西。他说：“我们领导干部，包括中央领导干部到下边去，不要那些前呼后拥、戒备森严的做法，也不要组织什么群众欢迎。”他自己率先垂范，出门轻车简从，不事张扬。对亲属子女严格要求，从不利用手中的权力，为他们提供哪怕一点小小的方便。他兄长胡耀福去世以后，家乡父老送一副挽联，上书24个大字：“国中有典型，两袖清风作赤子；天下无先例，一代皇兄当农民。”

胡耀邦反对个人崇拜，非常坚决。不仅揭露它的危害，而且提出一些防范措施。在1980年11月19日的一次政治局会议上，谈到个人崇拜，他开列四大罪状，予以讨伐：“搞个人崇拜这个东西，是我们党的一大教训。搞个人崇拜，第一，根本谈不上民主生活；第二，根本谈不上实事求是；第三，根本谈不上解放思想；第四，不可避免地要搞封建复辟。可以说，危害之烈，莫此为甚。个人崇拜永远不能搞了。”此前，1978年8月中旬，他出席并主持全国信访工作会议，谈到个人崇拜必然要搞封建复辟时，引司马迁《秦始皇本纪》中的话说：“秦俗多忌讳之禁，忠言未卒于口，而身为戮没矣！故使天下之士，倾耳而听，重足而立，钳口而不言，是以三主失道。忠言不敢谏，智士

不敢谋,天下已乱,奸不上闻,岂不哀哉!”“天下已乱,奸不上闻”这两句,不就是文化大革命的生动写照吗?他引历史经验,告诫全党,个人崇拜搞不得。

为了制止个人崇拜借尸还魂,卷土重来,胡耀邦提出和支持三条措施:一条是,今后二三十年内,一律不挂现任中央领导人的像。一条是少宣传个人,多宣传人民。再一条是,坚决不搞终身制。三条措施中,废除终身制是最为关键的,他不仅赞成,而且身体力行。他曾打算“成为党内首先自觉退下来的一个”。

现在,我们国家终身制是没有了,这是一个进步。但“变相终身制”还在,这就是退而不休,垂帘听政,操控高层人事,特别是指定接班人,甚至指定隔代接班人。指定接班人,就是权力私相授受,就是用另一种方式延续自己的权力。这比我国古代的太子制度、君主制国家的王储制度,有过之而无不及。因为有这个“变相终身制”在,退下去以后,照样有人吹喇叭,抬轿子,仍然被排在一人之后众人之上,称为“党和国家领导人”。下台了,怎么还是“党和国家领导人”?这究竟符合党章,还是符合宪法?不过,我相信,这种格局不可能延续太久。一个文明世界怎么能容忍这等封建遗毒长期存在?

个人崇拜、终身制、家长制、一言堂,是专制制度最直接最赤裸裸的表现,其社会历史根源就是封建主义遗毒。胡耀邦坚决主张肃清封建主义遗毒。

1979年底,李维汉因病住院,胡耀邦去探望他。谈到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教训,李维汉说:“文化大革命历时十年之久,据我看,关键在于封建余毒在我们党内、在我们国家实在太深了。”

胡耀邦对李维汉的看法深表赞同。他说,自己也考虑过这个问题,感到此事关系重大,建议李维汉向邓小平直接谈谈。李维汉接受胡耀邦的建议,和邓小平作了交谈。

1980年6月10日,中央政治局常委开会,讨论政治体制改革。胡耀邦说,要从两个根本问题上考虑肃清封建主义影响,一个是制度问题,一个是思想舆论问题。从制度上说:十月革命到现在63年了,从我们自己讲也30年了,革命成功以后,党没有搞好,国家制度也没有搞好,权力过分集中,终身制,铁饭碗,能上不能下,这方面我们比资产阶级差。这个问题必须从制度上下决心解决。思想舆论方面,我们没有经过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洗礼。资产阶级民主同封建专制来比,是很大很大的进步。我们革命成功后,无形之中发展了封建的东西。我们现在的宣传再不能搞封建这一套了,再搞下去就有亡党亡国的危险。

现在看来,李维汉、胡耀邦的讲话,以及1980年8月18日邓小平关于《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充其量只是提出问题,唱了个开篇。但是,即便如此,如果真正循着“清算封建遗毒”这个方向,去进行政治体制改革,那还是有很大意义的。

三、平反冤假错案:人本思想的杰作

胡耀邦在位七年,加上此前三年,前后十年,在拨乱反正、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做了大量工作,内政外交,经济文化,各个领域,无不留下他的业绩。其中最为重要的,是三件大事。一件是组织和推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一件是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干部政策;一件是发展生产,改善民生。三件大事,件件见证他的人本思想。这里我想着重讲一讲第二件大事。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干部政策,直接关系人的命运,这是胡耀邦人本思想的杰作,将永垂青史。

冤假错案,堆积如山,令他寝食难安。他说,1957年开始的二十来年,一个又一个莫名其妙的政治运动,坑害了一批又一批的优秀人才,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更是弄得到处是冤假错案,人人胆战心惊。没有被坑害的只能装哑巴,甘当“白痴”;因为“有道难行不如醉,有口难开不如睡”,谈不上还有什么建设社会主义的热情和激情来充分发挥他们的真才实学。那么剩下来的,则多半是些庸才、奴才和鹰犬了!他说,这样的社会,还能谈得上什么突飞猛进?这二十多年在经济上,为什么我们会落在日本、韩国、新加坡后面?甚至连台湾、香港都赶不上?最根本的原因就是把人心搞散了,把是非善恶的界限搞混了,与我们原来的宗旨背道而驰。这些年为什么求神拜佛的人越来越多?他引顾炎武的话说,就是因为

“小民有情而不得申，有冤而不得理，不得不诉之于神”嘛！他说：“做梦也没有想到，我们立志改天换地的共产党人，竟也会像历朝历代封建统治者那样，制造出大量的让人有冤无处申的冤假错案！”

为了替受难者申雪冤情，解除痛苦，他下定决心，敢于担当。他引但丁《神曲》中“我们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诗句取譬：“我们不下油锅，谁下油锅！”后来，他又引孔子《论语》中的话说：“见利思义，见危授命”，又引李大钊的名句“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来勉励所有参与平反工作的人。他自己则抖擞精神，废寝忘食，夜以继日，争分夺秒地工作。

在他的领导和推动下，从1978年到1980年底，在全国范围内平反文化大革命中的冤假错案290万人；到1984年底纠正文化大革命前的历史遗留案件188万件。复查改正错划右派54.7万人，纠正右倾机会主义分子12.5万人。这些案子牵涉的人，不是几百万，也不是几千万，而是上亿之多。

1977年10月7日，《人民日报》发表胡耀邦组织和指导的《把“四人帮”颠倒了的干部路线是非纠正过来》一文，这是落实干部政策的第一声春雷。文章提出，要敢字当头，敢于冲破阻力，敢于推倒四人帮一伙在审查干部中所做的错误结论。一切强加给干部的诬蔑不实之词，一定要推倒，颠倒的干部路线是非一定要纠正。文章引起了热烈的反响。而有的领导当天早晨听到文章摘要的广播后却说：“简直是一派胡言！通篇都是右派言论！”当天刊登这篇文章的《人民日报》，他不屑一顾，随手扔进垃圾箱，连声说“大毒草！大毒草！”

还有更高层的领导，在接见组织部核心小组成员时说：“这篇文章有错误，在适当的时候要纠正。”他利用手中的权力和“两个凡是”的声势，不准中组部召开全国组织部长会议布置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为了冲破他的壁垒，胡耀邦轮流召开省、市组织部门的小型会议，名曰“疑难案例座谈会”，号召“不愿意亡党亡国的同志，都必须挺直腰板与这种错误思潮斗争。”他毅然提出“两个不管”以对抗“两个凡是”。他说：“凡是不实之词，凡是不正确的结论与处理，不管是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不管是哪一级什么人定的、批的，都要实事求是地改正过来。简单地说，就是用‘两个不管’的矛，去对付‘两个凡是’的盾。”这是何等气魄，何等的责任心！

一样是共产党人，一样喊着“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口号，为什么有人拼命阻挠和反对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干部政策，而胡耀邦却把这件事情看得比天还大，“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你可以说，因为那些人仍然坚持文化大革命的极“左”路线，而胡耀邦已经从这条极“左”路线中摆脱出来了。这当然不错，但还远没有说到根子上。

极“左”路线从哪儿来？证诸历史，没有一次不是起因于对人的命运、人的生死祸福的漠视。为了贯彻某种“主义”，或者反对某种“主义”，或者实现某种“理想”，全然不顾人民群众的死活，发动一个又一个政治运动，推行一条又一条极“左”路线，一个大跃进，就饿死三四千万人。1959年，彭德怀“彭大将军”在庐山会议上提出来，要顾一顾人民的死活，竟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的头子，批得死去活来。实际上，凡属极“左”路线，都是蔑视人，不顾人死活的，都把非人的东西置于人之上，把人置于非人的东西之下，因而都是违反人性，都是反人类的。

拒绝和反对为冤假错案受害者平反、落实政策，就是因为漠视人的命运，不把受害人的痛苦当一回事，和那几个被批评为“见死不救，见冤不申”的人，一样冷酷无情。

作为人本思想者，胡耀邦的道德风貌，还表现在遭人迫害而不计前嫌。最典型的，是为刘澜涛平反。1964年11月16日，胡耀邦任职陕西省委代理第一书记。到任后，他敏锐地发现，陕西四清运动过火，打击面宽，抓人多，开除党籍多，开除公职多，广大干部群众心情紧张，生产形势十分严峻。他与省委研究后，采取果断措施，纠正这些过火做法，受到广大干部群众热烈欢迎。不料，却遭到刘澜涛为首的西北局和陕西省委的严厉批评，直批得他突发大脑蛛网膜炎，医生说有生命危险，才被抢救住进医院。1965年6月20日，他搭乘叶剑英元帅的军用专机回京。临登机时，叶帅说：“耀邦走吧！这个地方不好搞啊！”一到北京，他就住进医院。

刘澜涛文革中在劫难逃，也被打倒了，文革后成了平反对象。谈到他的平反，胡耀邦说，人家在文革中吃的苦也不少。况且整人的人自己挨了整，一定会从中吸取教训的。以前的事一律不许再提。他指示，把刘澜涛接到北京治病，要抓紧时间为他平反。胡耀邦不仅为他平了反，而且，推荐他担任中央的重要工作。胡耀邦担任总书记后，刘澜涛到家里当面赔礼道歉。胡耀邦说："这件事我早就忘了。""早就忘了"，当然不是从记忆中消失了，而是融化在他那博大宽厚的人道主义胸怀中了。

四、他的人本思想是去世后被发现的

胡耀邦的人本思想是一个藏量颇丰的宝库，但至今没有被充分发掘出来。这有三个方面的原因。一是话语方面的原因。他和我们大家一样，生活在党的话语系统里。他的人本思想，其中包括"人"这个核心概念，不可能直截了当地加以表达，只能涵盖在"人民"、"群众"、"人民群众"这些概念之下。二是身份方面的原因。作为共产党的官员，而且还是一个大官，他不能不受到党员和官员双重身份的制约。在他的文章、报告、谈话、批示中，特别是在他主持起草或定稿的文件中，官方意识形态的概念和术语出现的频率，不比其他人少。三是在一些问题上，他仍囿于党文化的藩篱。正因为如此，他的人本思想是不完整、不成体系的，有时还自相矛盾。例如，他说过"无产阶级专政最文明"。他这个话是在批评"一提专制就是镇压，一提镇压就是杀、关、管"时说的，本意是希望这个专政文明起来，因而明显的是一个"应然判断"，而不是一个"实然判断"。实际上，只要是专政，包括法国大革命时期雅各宾主义者圣茹斯特、马拉和巴贝夫的"革命专政"，都不是文明的。

由于这样三个方面的原因，如果不仔细加以鉴别和分析，不从他的实际倾向上去体察，并把他与其他人加以比较，他的人本思想便难以凸现出来。所以，他生前的形象，充其量只是比他的同僚开明一些，多一些人情味，多一些民主作风，待人接物比较热情，好打交道。

直到1987年1月，从总书记的位置上下台，特别是1989年4月离开人世后，人们才从他的生平事迹，为人处世，以至音容笑貌中，逐渐认识到，胡耀邦是一位与众不同的伟人，是一个充满人道主义精神的人。

对于许多人来说，胡耀邦是去世后被发现的。这和美国总统林肯的情况颇为相似。马克思在评论林肯时写道："这位出类拔萃和道德高尚的人竟那样谦虚，以致只有在他成为殉难者倒下去以后，全世界才发现他是一位英雄。"胡耀邦也是如此。生前，人们只知道他是"红小鬼"出身，是革命家。去世后发现，他原来还是一位人本思想者。他力图把共产党官员和人本思想者两种身份统一起来。对他来说，这是"自以为可为而为之"。每当两种身份发生矛盾，他都非常为难，非常痛苦。这就陷入了"道德冲突"：党命不可违，人心更不可违。他左右为难，进退维谷。

胡耀邦是一个忠实于信念的人。为了共产主义理想，他贡献了毕生精力；为了践行他的人本思想，他不惜扮演悲壮的殉难者的角色。人们重新发现了他，也就更加深刻地理解了他。

"我死了，不想去八宝山。"胡耀邦在和夫人商量后事时，这样说。这是一句非常激愤的话，说明他对身后之事有一种冷峻的思考。对身后之事的思考，就是对生前之事的思考。他不愿意死后和某些人为伍。这种决裂当然是有限度的，只是和某些人决裂，并不是和党、和他为之奋斗的共产主义理想决裂。在他看来，这些人违背了党的宗旨：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的共产党员，尤其是党的领导人，怎么可以把党和国家置于人民之上，怎么可以只讲阶级性，不讲人性？他认为，他和他们的分歧，本质上是他们和党的宗旨的分歧。他没有错，是他们错了。可以想见，纠缠在这样的思想死结中，胡耀邦生命中最后那两年多时间，内心该有多么痛苦！

在时代交叉点上，扮演悲剧角色，要比扮演喜剧角色崇高而有震撼力。在这个意义上，胡耀邦不仅伟大，而且荣幸：他是一个时代的代表，一个即将回归人性时代的先知先觉。今天，人们早已不把他当作一位受屈的共产党领导来看待，大家敬仰他，爱戴他，因为他是一个高尚而善良的人，一个真正的好人。他的声望，他的形象，下台后比在位时更高，死后比生前更高。

五、可以不做事，但是还要做人

为了更好地理解胡耀邦，追踪一下他的心路历程，也许并非多余。

1989年1月6日，胡耀邦在湖南省委一个招待所会见一位作家。谈话临近结束时，他神色凝重，目视前方，轻声地说："我可以不做工作，但是，我还要做人。"

"还要做人"，四个字，掷地有声，道出了一个人本思想者一生的人格追求：不管位高位低，顺境逆境，都坚持"做人"；现在下台了，做不了什么事了，但"还要做人"。在他看来，"做人"是人生头等大事。所谓做人，就是坚持正直、善良、热爱人民、有同情心这样一种道德理念和为人处世的原则。

胡耀邦一生，有四样宝物与他相伴，帮助他从一个苦孩子成长为一个革命家，一代共产党人的领导人，一个悲天悯人的人本思想者。这四件宝物是，出身、经历、读书、思考。

胡耀邦是从贫困山区走出来的苦孩子。参加革命以后，他经历了艰苦卓绝的对敌斗争，也经历了残酷的党内斗争。他经历了太多的不幸和痛苦，内心不断受到震撼，渐渐地形成了关心人的命运，同情遭遇不幸的人这样一种思想感情。他常常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告诫大家，不能搞过火斗争，对犯错误的同志，搞稳一点好。他说："我很小参加革命，当时18岁，被人家诬为AB团，被逼供信，真是举目无亲。我对这件事情印象深得很。一个党内斗争，一个社会斗争，都有深刻的教训。"一次，和来访的客人谈起整人的问题时，他说，在这个问题上，自己觉悟得比较早。他反复强调，"要实事求是，不要整人"。他对两种人特别关心和同情：一种是贫苦农民；一种是在政治斗争中被冤屈的人。这和他的出身经历显然有直接关系。

出身经历，对于胡耀邦形成自己的人本思想起了重要作用。但是，仅仅有这样的身世，还不足以造就他那样的思想品德。这其中，多读书，勤思考，至关重要。

胡耀邦参加革命前，只读过半年初中，被那些自命不凡的人称作"小知识分子"。但是，他好学深思，博览群书，终于成为一个能诗善文、长于演说的大知识分子。他读马列的书，也读《圣经》，读洋装书，也读线装书，各个知识领域，都尽量涉猎。读书是他一生的爱好，是他的生活方式。即使在文革那样的动乱年代，他也坚持读书。他说：关"牛棚"也是一种锻炼，靠边站了，正是读书的大好时机。文革中他总结了12个字的读书箴言："靠边站，别闲着，多读书，想问题。"

1987年，下台以后，他仍坚持每天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当读到第21卷《卡尔·马克思在科伦陪审法庭面前》一书序言时，被两段话深深吸引了，他把它们抄了下来。其中一段说："对历史事件，不应当埋怨，相反地，应当去理解它们的原因，以及它们的还远远没有完全显示出来的后果。"他认为，"这是马克思的一个重要观点，一种历史现象的发生，要寻找根源，发现隐藏在事物后面很深的东西。"接着他举了文革这件事，末了又说，"对自己的事件亦作如是观"。看得出来，他一边读书，一边思考，时刻感到胸中那郁闷的块垒。可惜，没有一本书，可以解开他的心结。直到去世，他也未能找到"自己事件"的根源，发掘出"隐藏在事物后面很深的东西"。现在，他已经作古，这件事情只能由后人来做了。

胡耀邦是一个善于独立思考的人。他不止一次地说过，"学习要独立思考，不用听什么风"。他读马列的书，但不迷信马列。他说："不能把马列主义看成是迷信的东西、宗教的东西，（否则）很危险啊！"文革结束以后，他在理论方面的勇气和才能，得到了比较充分的发挥，对几十年来许多重大的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作了深入的思考。

他是中共党内最早起来批判"两个凡是"的人。1977年1月1日、2日，连续两天，他和来访的朋友谈话时，就进行了批判。他说，现在的问题是，只要是毛主席说过话的、点过头的、画过圈的，都要一切照办，都要"继承毛主席的遗志"，"都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继续"批邓"、继续文化大革命那一套。在这种情况下，你要出来工作，就得说违心话，做违心事。他说，我才不干哪！与其去做违心事，不如在家抱儿孙吧！

文革中，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是一个压倒一切的口号，多少坑国害民的事情，都是在这个口

号下进行的。1976年11月3日，胡耀邦在和一位朋友谈话时，明确指出，中国从来没有经历过资本主义社会，不可能复辟资本主义，要复辟只能复辟封建主义，搞法西斯专政。对于四人帮的罪孽，他也不纠缠于什么左呀、右呀、形左实右呀，而是一针见血地指出，他们有“两大政策”，一是愚民政策，把思想、理论搞乱了；二是恐怖政策，大办两个“工厂”，扣帽子、打棍子，任意迫害好人。这就把他们的专制主义、法西斯专政的面目一下子揭露出来了。

他对赫鲁晓夫和中共《九评》的看法，也比较客观，不再重复过去的老调。他说：1957年，（毛）主席的锋芒转了，从反“左”，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一下转到反右，对准了资本主义，对准了铁托、赫鲁晓夫。到写《九评》时他就转不回来了。赫鲁晓夫这个人是不大好，批斯大林也批得不深，但主席开始还是肯定他批斯大林是“揭了盖子”。后来全盘否定赫鲁晓夫，给教条主义，给林彪、康生这些人开了绿灯。现在看来《九评》的基本方向是错误的，这恐怕就是文化大革命的国际根源了。粉碎四人帮不过半年，思想理论方面，基本上还是文革时流行的“防修反修”那一套。胡耀邦能这样看待赫鲁晓夫和《九评》，真可谓大智大勇了。

1978年9月9日，他和中央党校理论动态组开会，谈到经济问题。他说，经济问题很多。如农业，理论上没有搞清楚。把个体农民和资本主义等同起来，是很大的错误。如果个体农民就是资本主义，那不是说几千年就是资本主义？我们从1955年开始，把农业社会主义改造提得太高了，以为合作化了，不管内容怎样，就是社会主义。只要是单干，不管内容怎样，就是资本主义。正是在这种思想指导下，1955年以后，一直高喊割资本主义尾巴，剥夺农民。他明确指出，个体不等于资本主义。个体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只能是引导的方法。胡耀邦讲这个问题的时候，列宁关于“小生产每日每时产生资本主义”的论断还深深地禁锢着人们的头脑呢。

同年初夏，他在和一位来访的客人谈到我们这个民族不自由的生存状态时说：禁锢我们这个民族创造力的，一个是精神枷锁，一个是“组织枷锁”，“这样一个精神上、组织上被禁锢、被压制的不自由的民族，怎么可能与世界上的发达国家进行自由竞争呢”？

胡耀邦在读书思考的时候，非常自觉地用美好的、高尚的东西，来丰富自己的精神世界。例如，读《爱因斯坦文集》序言时，他感悟到，爱因斯坦“有一种独特的精神力量、思想方法。他主张独立思考，我们要从伟大科学家那里吸取一点营养，吸取一点思想要素”。又比如，一次出席民盟中央的迎春茶话会，胡耀邦说到张澜先生。他说，张澜先生有两条是值得钦佩的，第一条，他有很高尚的精神，这就是他的顽强的民主精神、民主思想；第二条，他有一个很优良的气质，就是他有强烈的正义感。

胡耀邦就是这样一个人：一生都在完善自己的人格素养，努力使自己成为一个无愧于人民、无愧于天地的人。

中华民族是一个缺乏民主、自由、人权和人道主义传统、而封建主义流毒特深的民族，胡耀邦留下的这份人本思想遗产，显得格外珍贵。它对于我们沿着由普世价值铺就的世界文明大道，进行现代化建设，尤其是进行政治改革，具有重大指导意义。现存的政治制度是按照党文化，即“阶级本位”论和“党国至上”的国家主义建构起来的。胡耀邦的人本思想和“人民至上”的民主主义，正是改革这种政治体制的最好的指南：它们既是“阶级本位”论和“党国至上”的国家主义的对立面，又是封建主义遗毒的强大的消毒剂。■

（张显扬先生是中国著名学者、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列所前研究员，2013年9月18日因病去世，享年77岁。）

（责任编辑　杨继绳）

启　事

《炎黄春秋》杂志尚有少量往期刊物零售，有需要的读者可电话咨询购买。

联系人：崔秀岭

手机：13611159388

电话（传真）：010-60342528

汇款地址：

北京市房山区102488信箱3分箱

邮政编码：102488　收款人：崔秀岭

“毛主义”对现实政治的影响

○ 黄卧云

毛泽东主义在过去的30年中经历了一个低潮后，随着中国社会矛盾的激化，其影响又开始与日俱增。毛泽东无疑仍然是当今中国最有影响力的人物。“崇毛”派和“反毛”派经常在网上鏖战，民间崇毛派把中国今天的贪官横行、贫富悬殊归之于资本主义的腐朽和对毛泽东的背叛。反毛一派则认为，他建立起来的极端专权体制对现实中的种种罪恶和荒谬负有全部责任。

我这里说的毛泽东主义不是毛泽东思想，也不是毛泽东理论，它是一个时代，是毛泽东时代社会生活的总和，在今天，它更是指那个时代的记忆。

人们的记忆总是与他们的想象混杂在一起。每个人从自己的记忆和想象出发理解到的毛泽东时代，就是毛泽东主义。对过去的记忆与想象，不但与他当时的经历密切相关，也与他当前的处境和生活状态密切相关，这样，毛主义不仅同过去有联系，也同样与今天有联系。一个“红二代”心中的毛主义与一个普通人心中的毛主义不一样，一个富豪心中的毛主义与一个农民心中的毛主义也很不相同。我们常常听到一些成功人士大谈文革苦难是自己人生一笔巨大财富，却没有听到哪位至今依然贫困潦倒的人感谢苦难。在今天，毛主义有完全不同的含义，它们甚至相互对立。

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是信奉毛主义的最大群体。他们曾经是“工人阶级”或“贫下中农”中的一员，作为政治上的领导阶级，他们虽然从来没有发挥过领导作用，但在阶级斗争中，他们处于阶级秩序的上层，是斗争者，斗争地、富、反、坏、右分子。靠不断的斗争，他们感受到了翻身做主人的政治地位。他们体会不到被斗争者所承受的从精神到肉体的各种苦难，往往认为那是反革命分子的罪有应得。工人阶级的优越感更加明显，他们作为城市工人，在一个农业国家有着令广大农民十分羡慕的经济地位。邓小平等一批党内改革派上台，停止了无休止的阶级斗争，为地富反坏右摘帽平反，采取了经济发展至上政策，削弱了根红苗正的出身优势，穷也不再光荣。政策的变化导致利益格局的改变，过去被批斗、被改造的对象成为时代新宠，知识分子开始吃香。恢复高考结束了工农兵上大学的极左制度，同时也就终止了农村基层干部代表贫下中农推荐上大学的决定权。“万元户”是致富道路上的最初成功者。

改革的核心是政治权力的重新调整，即原先的权力班子出局并搭建起新的权力班子，在毛泽东时代被打倒或被边缘化的权势人物回到政治舞台的中心，他们以务实的态度看待政治，看待社会。权力完成了调整后，在没有了毛泽东的时代，它进入了按照自身逻辑运转的阶段，不断强化自我，由于缺乏有力的权力制约体系，权力的野性得到最大程度的发展，它在有利可图的方面为自己创造寻租机会。政府和官员成为改革开放的最大受益者，工人阶级在国企改制中则是首当其冲的利益受损者，大批工人失去了岗位。普通大众是社会财富的创造者，他们把中国变成世界工厂，但自己的财富增长较少，而且成为环境污染的主要受害者。权力在财富分配和占有上表现出来巨大能量，它创造出了一个新的群体——“官二代”。

对于陷入绝望的人们，毛泽东是反抗之神，是反抗者的旗帜。“造反有理”，在语言大师毛泽东创造的一系列铿锵有力、极富鼓动性的经典之句中，这是经典中的经典，它所包含的真理比“告别革命”、“大赦贪官”之类的一孔之见多得多。对邪恶与不义的反抗是人类的天性。毛泽东的一生就是造反的一生，年幼时造父亲的反，年长时造政府和社会的反，年老时造他手下官僚的反。正是在造反精神上，他与鲁迅有共通之处，他给予鲁迅极高的评价，也由此奠定了鲁迅在当

代文学界的至尊地位。鲁迅用笔杆子造反，毛泽东用枪杆子造反，鲁迅的战斗性和不宽容，与毛本人有几分相似，也是毛非常欣赏的。只要社会处于官僚的压迫之下，毛泽东的价值就会被重新发掘，就会是被压迫者一面不倒的旗帜，更不要说受他直接影响的几代中国人了。

农民出身的毛泽东对底层民众存有好感，而对民众对立面的官僚缺乏信任，这就造成了他政治上的矛盾，一方面他要依赖官僚体系贯彻他的主张和方针政策，一方面他不信任他的官僚队伍。当他决定要自上而下地对官僚队伍进行全面清理时，他把希望放在发动群众上。他意识到新建立的官僚队伍同样会变质，成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所以必须七八年搞一次文化大革命，对官僚队伍进行一次清理。他是在进行一场永远不可能取胜的战争。他的民粹主义同个人崇拜教育结合，产生了不同寻常的政治后果，成为民众广泛拥戴的大救星。即使在毛泽东时代之后，毛泽东的神位在民间也一直没有动摇过。民众对现实的不满，感到亟需一位毛泽东式的救星降临对邪恶进行复仇式的大清算。

许多官员信奉的毛主义完全是另一番意义上的毛主义。首先它代表的是政权的法统和正统，可能更加重要的因素，是毛创建的权力体系使他们获得了巨大利益而且将继续获取利益。毛泽东是无与伦比的权术大师，他的权术不是简单地对宫廷权术的抄袭和继承，而是对过去的决定性超越。他对群众的驾驭和指挥能力，前无古人。满朝文武对他服服帖帖，他们不仅是屈服于毛的绝对权力，也是慑于他的绝对威望。这是一种居高临下、所向披靡的权势，对于视权力为生命的官员，毛泽东的魅力不可抗拒，但他可望而不可即，权力的崇拜者只能自叹不如。

“红卫兵”一代完全是毛泽东主义的产物，从他们一开始接受教育到他们的世界观形成，都处在毛主义的沐浴下，文革对他们的影响至为深远。他们缺少良好而系统的教育，人文教育欠缺，对无限权力、斗争哲学和暴力的狂热崇拜，已经渗透到他们的血液中。即使他们中很多人在文革后努力学习新的知识，但思维中的文革底色难以消除。

崇拜毛的权威和权术，与仿效毛的权术和权威是不同的，薄熙来是毛泽东之后力求模仿毛泽东极权治理的高层政治人物，但对一种最高境界的模仿，往往失之毫厘，谬以千里。毛泽东运用权力出神入化，不但是他在几十年党内残酷斗争中修炼的结果，也是其杰出的军事才能、过人的心术和在权力中心长期苦心经营得来的。薄熙来凭家庭的荫庇获取大权，他虽然在体制内按照要求从基层一级一级地走向高层，但庇护下的升迁对个人修炼不利。在盘根错节的权势网络中，他的行为显得鲁莽，另类，不智。即便是毛泽东的忠实崇拜者，也会对毛泽东式的人物出现感到恐惧，因为他对官场既有秩序是一种威胁，必须对他保持警惕。官场上的众多崇毛者实际上只是叶公好龙。

毛主义代表了一种治理和控制社会的方法。毛时代的民众对权威的绝对服从，可能是令某些高层管理者十分神往的境界，是他们膺服毛主义、学习毛主义的强大动机。毛对社会的控制术是一个非常复杂和极为庞大的系统工程，并镶嵌在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之中。政治高压、言论和思想的绝对一律、群众的盲从、群众相互监视和斗争，都是这个工程的组成部分，它们结合在一起形成相互勾连的立体控制体系，所有这些，今天和以后都无法复制到现实中去。毛泽东建立的社会秩序，虽然在一定时段内保持了某种表面稳定，但这种秩序后潜藏着极大的风险，以致对自己身后如何实现权力交接，是在和平中交接还是在腥风血雨中交接，毛泽东也只能听天由命。

用“毛左”来称呼崇毛者并不恰当，对很多人来说，崇毛并不代表他们的政治态度，而只是表示他们的一种情感，即对远去的青春的怀旧。在30年中，毛泽东主义占据了中国人的全部思想，绝大多数人都以他的思想为思想，以他的喜怒为喜怒。那个时代有它独一无二的特殊仪式和标志：革命神话，乌托邦理想，集中的劳动场面，反帝反修的激情，政治风云突变，忠字舞，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斗志昂扬的歌曲，等等，当然还有饥饿，群众批斗会，大串联，生产队，人民公社，在今天看来，所有这些虽然显得既疯狂，又荒唐，但那个时代的人当时都虔诚地接受了它们，他们总认为自己是为革命献了青春献子孙。这是他们个人的成长史和奋斗史，对自己的历史，他们可能有懊悔，但要完全自我否定却不可能，因为那等于否定了自己的生命。他们肯定

自己的过去,不是肯定过去的政治。他们的生命都与毛泽东相关,毛泽东在数十年中就存在于他们的生命里。在无数人的生命里,毛泽东是一种负面存在,但在另外的无数人生命里,毛泽东被视为正面存在,后者对毛泽东仍然怀有景仰之情,但他们不是今天通常所说的“毛左”,说他们是“毛粉”要更加贴切。

反毛派与崇毛派并不是像平日里在网上争吵和相互痛斥的那样不共戴天,他们在一些重要的政治和社会问题上有着基本的共识。反毛派同样受到个人情绪的影响。真相与和解同样重要,揭示毛泽东时代的真相仍然是重要的,但揭示真相要与仇恨划清界限,揭露真相是为了面向未来,激发仇恨则不利于未来。

今天的各种矛盾的源头很多都可以追溯到不受约束的权力。毛泽东是该体制的创造者,但毛泽东已作古很久,体制依然没有改变,批评毛无助于改变这一切。毛泽东不但已无法为自己的行为承担责任,更无法为他之后的30年承担责任。检讨我们自身的行为更有助于影响现实。以为复活毛主义就能恢复社会公平,同以为彻底否定毛主义就能推动民主一样是不现实的。

毛主义对现实的影响,远没有反毛派想象的那样大,没有崇毛派和反毛派在争吵中显示出来的那样大。造成中国社会分裂的不是主义,而是利益,是权力垄断和由此而来的利益掠夺导致了贫富两极分化。中国今后的政治是如何明智地处理和填平利益鸿沟,民主政治的顺利实现同样有赖于此。无论是崇毛,还是反毛,或者是想借助毛主义进行社会治理,都不会对现实政治造成实质性的影响,他们实际上都是利用毛主义表达自己的思想和立场:反对既得利益者,或者维护利益的既有格局。

毛主义不会复活。毛泽东主义随着毛泽东时代成为了历史,如果我们把毛主义当做历史遗产对待,会使我们更加理性。当今的毛主义者顶多只是毛主义不及格的小学生。毛主义是一个整体,集民粹主义和极权主义于一体,首领的绝对统治权和官僚集团对首领的绝对忠诚是极权治理的必要基础,绝对的领袖魅力和民众对领袖的狂热追随是极权治理的重要保障。在毛之后,上述基础和保障已不再存在,极权治理在中国失去了土壤。虽然邓小平说“毛在毛说了算,我在我说了算”,但毛、邓之间的权力已经很难相提并论,邓小平必须同其他主要元老合作共同行使最高权力,新的权力集体通过改变毛主义赢得了自己的合法性。邓小平对权力进行了大幅度收缩,放松了对社会的控制。邓小平的高明之处在于知进退,他认识到倒退已不可能,他懂得只能为可为之事。■

(作者单位为新华社四川分社)

(责任编辑 杨继绳)

图书介绍

《思痛录》:这是一部血泪凝成的历史,这是一本说真话的书。作者痛定思痛,用知识分子的良知来记述她所经历的时代。回忆是真诚的,反思也是深刻的,以新的视角,给人们启发和教益。文章以深刻反思和强烈的批判意识,表现出作者愤怒、痛苦、懊悔、自省的复杂情感。当愤慨地谈到那场荒谬的“反右”运动,“盲目的、毫无法律根据的‘中央精神’,随时变化的‘领导意图’,就可以随便支配几十万人乃至几亿人的命运”。作者当时已痛悔自己走错了人生道路,错误地加入共产党、投奔延安,“如果在一二九的时候我知道是这样,我是不会来的”;“参加革命之后,竟使我时时面临是否还要做一个正直的人的选择。这使我对于‘革命’的伤心远过于为个人命运的伤心。我悲痛失望,同时下决心不这样干,情愿同罪,断不卖友”……她以理解和同情的态度谈到民主党派中那些被打成右派的知识分子,如储安平、章乃器、罗隆基等人时说:“他们参加政协,哪里晓得只有吃饭和鼓掌的权利……”

作者追述往事,也反省自己,痛恨自己被党性所迫,在“反右运动”中“也干了些违背良心”的事,也“写过违心之论的文章”,这些沉痛真言、是对荒谬年代里人情世态和政治风云、民族悲哀的剖析。直面惨痛历史,勇敢的暴露黑暗,思考和总结我们的历史。显示出一个有头脑、有个性的知识分子所具备的真诚品格。

为建立一个民主自由的新中国,知识分子付出的不仅是鲜血、生命,甚至是泣血的灵魂。知识分子的悲哀在于,为革命不仅牺牲了一切,还牺牲他们自己的良心,穷尽一生的努力和奋斗,得到的却与自己的理想相悖,怎不痛彻心扉?历史是世代的血肉之躯所锻造,而中国知识分子用旷古罕匹的特殊牺牲,铸成了一页当代最沉重的历史。(价格及邮购方式见第94页)

习仲勋长葛调研

（此文是原长葛县委副书记张继增与当地农民的回忆，王国钧、晁保欣、李林河记录整理）

1961年4月10日，习仲勋带领中央工作组一行12人到河南长葛蹲点调研。到长葛的第二天，习仲勋就到监狱去看望那里在押的因说真话而被划为右派的同志，有太平村的冯海成、岗刘村的刘毛、坡岳村的岳洪瑞等150多人。当时刘毛已冤死在狱中，冯海成也被内定为死刑。习仲勋为冯海成及时平反并与其他同志一起释放，冯海成当天就回了家，激动得思绪万千不能入眠。4月14日，当他知道那位解救他的干部是习仲勋副总理后急忙赶去拜望。这时习副总理下乡了，冯海成没见到他。等习仲勋回到办公室时，工作人员向他汇报有位前天从监狱里出来的同志来看他，他马上吩咐工作人员去把人追回来。冯海成见到习仲勋副总理后，情不自禁地跪在地下，习仲勋随即搀起他，扶他坐在凳子上，和他亲切交谈起来。

那时樊楼村三餐难继，全村共49户人家，习仲勋走访了46户，农家没有凳子，他就随地搬块石头或砖头当凳子，每到被访的人家都是称兄道弟称嫂道妹。樊楼的群众自豪地说，大总理都称我哥了、弟了、嫂了、妹了。

习仲勋跟抗旱群众一同摇辘轳，农民说，习副总理还是摇辘轳的行家，习说我也是农民出身。

习仲勋在宗寨（今八七村），看见抗旱浇麦推水车的一位妇女腿瘸的无法走路，就把她搀扶到井台边上，他知道这是因为浮肿所致，就用手按了一下她的小腿，陷的坑久久不能复原，习仲勋潸然泪下。有一次习副总理找大队干部郭银朝和老农蔡丙戌座谈后，留他们吃饭，他俩一左一右坐在习仲勋身边。吃饭时习副总理亲自为他俩盛饭，还风趣地对蔡丙戌说："老蔡，听你的名字，就知道你是属狗的，比我大两岁，你就是老大哥，咱们是一家人，不要客气。这糊涂面条不算好，但一定要吃饱肚子。"这事虽然过去50年了，但老蔡至今回想起来还犹如昨日。

习仲勋到长葛以后，长葛县委派张继增副书记专职负责配合中央调研事宜，他与习仲勋、侯亢、范民新、和尚桥公社书记孔宪瑞等同志一起，4月16日来到和尚桥公社杜村寺大队。张继增向大队书记张大力分别介绍了中央工作组成员，说今天到这里主要任务是调研群众的口粮问题，并要亲眼看看粮仓。张大力一听要看粮仓，吓得话都说不囫囵，又搪塞不过去，只有强打精神领着工作组看粮仓。习仲勋看了看宽一米多、高一人多的粮囤，想着报上那些大吹成绩的报喜文章，对比在村里看到的饿成浮肿病的群众，觉得很费解。他让张大力打开囤子要亲眼看看，张大力非常为难，习仲勋就让工作人员打开粮囤，原来是用竹竿片儿撑了个拱，用布盖住，只在上边摊了不足一寸厚的粮食。习仲勋看后又气又恼地说："你们杜村寺大队，把党中央制定的多、快、好、省建设社会主义的'多快好省'这四个字学精了，用妙了，这个粮囤如果用土填满它得用土两方多，一个好劳动力担土得用两天时间，嗨，这下子好了，半个小时就能把假造出来。"张大力满腹委屈："不瞒你说，习副总理，1959年庐山会议之后，这里到处都搞卫星田，瞎指挥种麦下种量几十斤，更甚者还有下种量二百斤的，瞎指挥又遇上1960年大旱，麦子产量连种子都顾不住，可吹产量一个比一个高，上边下来检查工作没办法，只有造假这条路了。上边压下来的事只能听指挥照办，否则就得挨批斗还得在毛主席像前作检讨。"

张继增说："你们村有位同志叫孙启宇是大学高才生，听说被划为右派下放在家，我们想到他那里了解点儿情况。"张大力说："别去了，半个月前他跳井自杀了，要想了解他的情况到他本家

的侄子孙守德老师家问问吧。"习仲勋同意了张大力的意见,一同来到孙守德家。张大力介绍了工作组成员和来意,孙守德说:"我们祖上几辈为落魄秀才,胆小怕事,我五叔前些日子跳井里自杀了。这些还是不说为好吧,不知哪句说错了,就是犯纲犯线了,就得挨批斗祸及自身了。"这时大家沉闷起来,习仲勋说:"你大胆尽情地说吧,一切由我负责。"孙守德说:"您去看粮仓了没有,1959年庐山会议反右后到处都搞卫星田,您去看我们这里的三块卫星田,一号卫星田是公社主要领导的,二号卫星田是县里主要领导的,三号卫星田是地区主要领导的,他们只以农业八字宪法(土肥水种密保管工)中的'种密'为增产依据,以播10斤种能打800斤,播100斤种就能打8000斤的逻辑,强迫农村干部种麦下种100斤,更有甚者下种200斤,然后按照这个逻辑公式,以麦播量200斤产出15000斤作为成绩上报。麦子大减产,结果连种子都顾不住,可是把产量吹出去了,上边到下边检查怎么办,只有一条路造假囤。我县坡胡公社(镇)孟排大队马同义,发明了深翻土地的办法,这项技术确实能让小麦和玉米增点产,吕炳光县长汇报到党中央毛主席那里了,可到了下边硬是强迫用在种红薯上,把土地翻挖深达一米多,再一层肥一层土去填平,搭个高架子让红薯秧往上爬。可红薯不喜高肥地,深翻一米多的地很虚。红薯只长根秧,就是不长茎块,但领导们只依据红薯秧就报喜说,一棵红薯能吃半年。瞎指挥与强迫命令是劳民伤财,怎能不出现今春的大饥荒呢。"习仲勋连连点头,侯亢、范民新都记录下来。

习仲勋(前排右四)在长葛调研时留影

习仲勋又问:"你五叔跳井寻短见是怎么一回事?"孙守德眼泪欲落沉默不语,在座的同志沉闷起来,习仲勋又一次说:"尽情地说,还是那句话,由我负责。"孙守德说:"我五叔不管学识多高,打成什么派,他千不该万不该也不能跳到那口井里寻短见啊,那是全村的一口吃水井,这不是作践全村老少爷们吗?嗨,习副总理啊,还是不说吧。"习仲勋说:"老孙啊,你是胆小怕事,尽情地说,还是我开头给你说的那句话,一切后果与责任由我负。"孙守德这才激动感慨地说:"我三叔把我五叔从井里救出来后,把我五叔搭在牛背上,是想把五叔憋在肚内的水给晃荡出来施救,那得牵着牛在路上走吧,那些运动红人就说我三叔这老地主把他家右派死人搭在牛背上沿街行走,是地主右派对党对社会主义不满,是向党中央毛主席示威,这样的救人方法无法进行了,我五叔就这样命归黄泉,用三块薄板捆送到土里了。"习仲勋感慨地说:"知识分子出了问题,这个社会随之就也要出问题的。"

孙守德说:"大食堂一年比一年问题大,到后来除了炊事员与司务长能吃饱饭,其余的人都别想,也由此导致了民风日下,这里有这样几句民谣:干板直正饿得头疼,敲敲捣倒吃得傻饱,十个人七个人手长(小偷)。民风败坏了。"习仲勋说:"民风不好是有根本原因的,那些弄虚造假、让群众吃不饱饿成浮肿病的人不是民风问题吧。人快饿死了让他谈道德谈修养,谈人格顾面子可能吗?用你的逻辑那些不顾面子去偷点吃的就是小偷坏人盗贼,而那些老老实实不去偷吃的,他把榆树皮揭吃了,那他就是山羊了。这都是那些瞎指挥干部弄虚造假给害的,这才是问题的本质。"孙守德说:"上边的干部都像您这样到群众家了解实情,还会有啥问题解决不了?"时间很晚

了,孙守德不好意思地说:“中央大干部到农家,可我无能为力管您几位一顿饭,这么晚了还得让您几个各自回家吃饭。”习仲勋一行人异口同声地回答说:“出现这些问题我们有责任,也无颜到您这些老农民家吃饭。”

曾一凡等在太平村调研的几位同志完成了一天的工作,也回到习仲勋的住处汇报工作。

习仲勋完成了这天的调研回到驻地宗寨村时,天已晚了,他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今天的调研见闻让人心里沉重,这些问题的症结是弄虚造假的结果,而它的病根,第一是共产风把私人的东西归了大堆,可没有有能力的人士去经营管理出效益,放到一堆烂掉了。第二是一平二调挫伤了群众发展生产的自主性与积极性。第三是干部特殊风,败坏了党群干群关系,制造了民怨。第四是瞎指挥风,外行领导内行,只用主观意志不讲科学性,使生产受挫折。第五是强迫命令风,使政策在执行中一刀切,没有灵活性,同时也制衡与压抑住了说真话的人。第六是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管理社会这种基层的体制制度,对经济上的利弊没人弄清。大跃进这种主观意志与急切愿望所形成的,从面上看是热火朝天,从本质上讲是无理性的浮躁。我们在长葛调研工作中,要以事实为依据,围绕上述几项观点进行反思,向党中央提出切实可行的参考意见与思想观点,今天调研的心得就这些,眼下要紧的是向总理请求拨救灾粮的问题。”

于是当晚赶紧写了一份向周总理请示给长葛人拨救灾粮的材料,这时天已接近午夜了。

习仲勋在长葛调研,爱到清潩河河堤上散步。4月16日这天很劳累,17日清晨,他与秘书范民新一同到河堤上散步时对范说:“咱们调研的这和尚桥公社的名字由来,就是清潩河上有座和尚桥,桥名物化出地名,可见它的神圣性。更神圣的是古人建这座桥时的科学思维,桥上行车走人,桥栏柱上的瑞兽瑞物可做美学艺术欣赏,桥孔内能蓄水,蓄满水后可自流灌溉土地服务农业生产。看看古人,可我们现阶段出了如此多的问题,我们如何不感慨啊。”范民新说:“请示报告写成了,怎样才能让总理尽快拨救灾粮?”习仲勋说:“先打电话给总理,然后用快件信寄去,就这样去办吧。”

(责任编辑 杨继绳)

SIEMENS
西门子助听器
Hearing Aids
服务热线 :010-84608877
SW 声望听力
www.sw-tl.com
请认准西门子听力集团授权证书 西门子听力仪器(苏州)有限公司
数字型耳背式助听器 苏食药监械 (准)字2010第2460986号 数字型耳内式助听器 苏食药监械 (准) 字2010第2460987号
注:请认准西门子标识/请详细阅读产品说明书或在医务人员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苏医械广审(文)第2010040048号

由“何朗明案件”引发的大冤案

○ 贾志珍

裴仰山文革前是河北省委书记处候补书记兼省监委书记。1965年的夏天，省委通知仰山去北戴河参加“省委书记处生活会”。从北戴河回来后，像是变了一个人。原来就很瘦的他更瘦了，原来爱说爱笑的他，变得沉默寡言了。更奇怪的是，他不再去上班，整天待在家里写东西，而且秘书一来，两人就关在屋子里，秘书一走，他把所有的东西，一股脑儿锁进抽屉里。

种种反常现象让我忐忑不安。可问到他，他却什么也不说。直到有一天，我发现锁着的抽屉里露出一个纸角，把纸抽出来，上面几个字跃入眼帘：唐山问题的检查。这让我下决心要问个明白。

“这是工作中的事情，组织上不让说。”他拿组织纪律搪塞我。“不管是什么事情，你一定要告诉我，我也是几十年的老党员了，你还不相信我吗？”

当时仰山沉默良久，满头满脸渗出黄豆般大小的汗珠，突然说道：“他们说我背着省委反省委，反林铁，我没有啊！”说着，委屈的泪水和着汗水一起流下来。待仰山稍事平静后，他开始把在北戴河书记处生活会上，如何以何朗明案件牵扯到林铁为由，给他定罪的情况说了出来。

何朗明案件的经过：1964年间，中监委组成调查组，复查何朗明案件（何朗明已被定为反革命分子）。当时，由河北省抽调了四名干部参加中监委调查组，在中监委领导下独立办案。按照中监委的意见，这次办案，不需要向地方党委打招呼，并一再叮嘱参加调查组的河北同志，对调查结果严格保密。由于调查取证等工作也离不开河北省的配合，所以，中监委的有关领导还是再三叮嘱参加调查的同志们只向仰山汇报。汇报的结论是：林铁同志有包庇何朗明之嫌。

林铁同志是省委第一书记，因省监委是在省委领导下，仰山认为事关重大，经慎重考虑之后决定，将此情况向省委一领导人作了当面汇报。该领导指示仰山不要对任何人提起此事。不久后的一天，林铁的夫人到我家来找仰山谈话时说到：我们的书记当不成了，有人想当一把手了……表达了极其不满的情绪。仰山明白林铁同志知道了，于是立刻将此情况汇报给省委那位领导人。那位领导人听后“哦？”了一声，表情十分紧张。

仰山说，可在“北戴河生活会”上，省委那位领导人否认了曾两次向他汇报过此事的事实。

仰山说：“没想到事情会变成这样，以后的结果还很难预料，你要相信，我是被冤枉的，就是砸碎我的骨头，我也不承认反党、反省委。但想澄清事实，恐怕不那么容易。我不知道如何面对孩子们。在他们心中爸爸是个老革命，如今犯了错误，怎么说得清呢？肯定会影响到他们的，我对不起他们。”仰山哽咽得说不下去了。

事情要从1958年说起。

1958年以后，唐山地区刮“五风”，特别是“浮夸风”严重，出现了饿死人的现象。那时来我家的保姆说：我们家乡的老百姓饿得连枕头里的秕子都吃了。出来做保姆，我不要钱，只要有口饭吃就行了。

原唐山市市长马仲华在向仰山汇报工作时，在电话里边哭边说：下边的老百姓太苦了，发生了卖儿、卖女、卖老婆的事情，广大人民群众和干部怨气非常大（这些事，仰山曾在党的会议上说过）。

1959年反右倾运动中，又将许多敢于说真话、为民请命的好干部，打成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结果一错再错，造成了无可挽回的巨大损失。

1961年5月，中央工作会议决定，对几年来受批判处分的党员和干部，进行实事求是的甄别平反，并规定以后在不脱产干部和群众中，不再开展反右反“左”的斗争，也不许戴政治帽子。翌年1月，在中央扩大的工作会议（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主席在讲话中作了自我批评，强调必须健全党的民主集中制，必须在总结正、反两个

方面的经验的基础上,加深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同年4月,中共中央根据这次大会的精神,制定下发了关于加速进行党员、干部甄别工作的通知,批评一些地区或部门贯彻中央指示不力,进度很慢。要求各地甄别平反工作要加强领导,加速进行。河北省由于某些领导人的抵触情绪,甄别平反工作迟迟推不动。为此,仰山多次向中央反映了这一情况,中监委书记王从吾专门来河北了解情况,并要求河北加速甄别平反进度。在此情况下,河北省的此项工作才得以展开。

1962年4月,省委那位领导人代表省委,派张承先为组长、仰山和李子光为副组长,带队去唐山解决问题。中间,李雪峰、李楚离也到唐山提出过指导意见。仰山及时向省委作过汇报,他们的工作始终是在省委各级领导的指示下进行的。工作组到唐山时,华北局书记李雪峰已先期到达,正在搞调研。见面后,李就让转告省委那位领导来唐山时,不要急着讲话,务必坐下来听听。以后省委那位领导也到了唐山。工作组完成了省委交给的任务,为在反右倾中被错整了的同志们平了反。

但事后表明,唐山的甄别平反工作只是表面上完成了。实际上,唐山地区的某些领导,心存不服。尤其那些曾经整过人的人,骨子里是不满意的。碍于当时的形势,又不得不同意为受错误处理的同志平反,这就为后来仰山的蒙冤埋下了伏笔。

北戴河会议以后,仰山被剥夺了一切工作权利,只是交待问题,等候处理。同时,由省委那位领导亲自主持搞“何案”的反调查。调查的结果是:林铁没有包庇何朗明,与中监委的结论完全相反,并向中组部及中监委多次汇报。就这样,省委将北戴河生活会上给仰山定的罪名公布于众。不久,仰山被派往石家庄市附近的肖家营村搞四清,还专门派了人看管,不能和家里人联系。

同时,省委召开了省直政法系统(仰山分管政法口)处级以上干部大会,会议长达一个月,公开点名批判仰山。罪名一是:在何朗明问题上,“背着省委反省委,反林铁”。罪名二是:在唐山问题上“背着省委反省委,反省委某一领导人”。根据之一是:唐山的张达、赵衡和赵光曾经给毛主席写信反映省委某一领导人工作中的一些问题。仰山对此并不知情,却硬把他说成是其后台。为此,还特意将在甄别平反工作中持不同意见,且并不是书记处成员的唐山地区个别领导人请到会上,让他们发泄对甄别工作的不满。由此,将省委在唐山已纠正了的错误,又颠倒了过来。

1966年5月21日至7月23日,华北局在北京前门饭店召开工作会议。其中河北会议上先是对仰山、李运昌(时任交通部党委书记)、胡开明(时任省委常委)、王力(时任副省长)及一些地、市负责人进行揭发批判。尤其对仰山以所谓确凿的事实而罗织的罪名:“背着省委搞省委、搞林铁”,不遗余力地进行批判。但很快,风云突变,华北局第一书记李雪峰在会上点了林铁的名,于是林铁被揪出来批判,仰山反林铁的罪名魔术般地变成了林铁的“黑干将”。

1966年8月,河北省委在保定召开省直机关十七级以上干部大会,会上,因所谓“林、裴、胡反党集团的黑干将”、“老右派”、“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等在华北局会议上定调的诸多莫须有的罪名,仰山再次被抛出,在干部、群众中揪斗。

一直被封杀的仰山决心不再沉默,将何朗明案件的前前后后,实事求是地公布于众。于是,省委机关一片哗然！这触动了原省委主要领导的神经。

自1968年2月省革委会成立以后,对仰山的迫害升级了。

仰山在批斗大会上被踢断了左腿,不但不给予及时正确的治疗,反而被放在装煤的筐里,由监委其他同志抬着接受批斗,造成了终身的残疾。

5月31日,河北日报上公开点名,将仰山定为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将省监委定性为反党集团,并解散了省监委。

1969年党的九大后,军宣队、工宣队依照党的政策,将仰山从牛棚里放了出来。但省革委会的领导人,却在省直干部大会上讲:别人可以既往不咎,只有林(铁)、阎(达开)、裴(仰山)、胡(开明)不行,他们是坏人。他批评军、工宣队是右倾,全部撤换。将仰山再次关进牛棚,并要求把批斗温度烧到800度、1000度！要实行“群众专政”。

五十年代初仰山因胸膜炎积水曾做过一次开胸大手术,之后专家叮嘱一定不能太过劳累,

不能遭受外力击打，但在文革中，造反派专门打他手术过的左胸，造成严重的脓胸，不仅没有应有的治疗，每天还要坚持超负荷的体力劳动以及轮番的批斗。不久，仰山咳血了并伴有高烧，情况相当严重，这才不得不将他送进了省医院。那些年我已很长时间看不到仰山了，此时他们把重病的仰山推给了我。看着他瘦得皮包骨，奄奄一息，我心如刀绞。人虽然进了医院，但并无有效治疗，还是家属发现胸片有明显的液面，向院方提出，这才确诊是在原陈旧的病灶处变为脓胸并做了引流。医院多次下达病危通知书。心急如焚的我向省革委提出转院的申请。可是申请长时间拖着不批，眼看仰山就不行了。有的医生同情仰山的遭遇，偷偷告诉我：省委那位领导每天来按摩，终于有一天，在医院堵到了省委那位领导，我问他仰山可以转院吗？医生也向他讲了仰山病情危重，医院已经没有办法了。那位领导只好同意放行了。1972年初春，我们离开了河北。在火车上，我长长地出了一口气：仰山得救了！

我们到北京协和医院后，省革委就派人向院方交待：此人是“敌我矛盾”。所以医院不敢采取有效的措施。很多老同志闻讯（包括从外地专门赶过来的）前来看望。他们看到仰山时，无不难过地掉下眼泪。原中监委常委的袁任远同志向王震同志汇报了仰山的情况后，王震同志非常难过，也前往医院看望，他对医院说：“这是我们陕北的模范县委书记，历史上我清楚，贫农出身，立场坚定，工作成绩突出。”并要求医院要想尽一切办法给予治疗。随后，他又向周总理作了汇报，总理也作了批示。此后，医院开始采取相应的治疗措施，仰山的身体状况才日渐好转。后来在老同志的帮助下又转到北京结核病研究所，1973年在仰山60岁时，由辛育龄所长执刀成功地做了第二次开胸手术，在已经失去了九根肋骨的情况下又被切除了三根肋骨，病灶切除了，从此他的左胸完全塌陷了。

粉碎四人帮后，我和仰山到王震同志家去看望。王震见到康复后的仰山非常高兴，并说：“你的老婆可真是个好老婆啊！没有她，你早就死了！”

仰山生于1913年，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家里祖祖辈辈都是穷人。自从参加革命后，就一心扑在革命工作上。积劳成疾，战争年代医疗条件差，1950年不得不切除半边肺和九根肋骨。但这并没有影响他的工作热情。

1956年到河北省委后，一直主要负责省监委做纪检工作。有人说，纪检工作不好干。仰山认为：纪检工作是保证党的组织纯洁、作风正派和健康发展的忠诚卫士，只要忠于党的事业，严格遵照党的政策，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就能作到定案准确公正，经得起历史的检验。既能同形形色色的违纪现象和行为作坚决斗争，又能对犯错误的人严肃谨慎、区别对待，惩前毖后、治病救人。

在反右运动中，原省委常委刘洪涛被错误地划为右派。省委开大会宣布此决定时，刘洪涛当时就哭了。仰山回家后心情异常沉重，难过地落了泪。对这位大革命时期参加革命的老同志遭受到的政治灾难深感痛心。在刘洪涛精神、生活最艰难的日子里，仰山无时无刻不在惦念着这位蒙冤的老同志，担心他会不会从此消沉下去，主动关心他、鼓励他：千万不能灰心丧志，要振作精神，并对刘说：“相信你一定能重新回到党的怀抱中来，要有信心。”刘洪涛离开省委机关的时候，省委宿舍大院只有仰山一人送他到大门口，对于仰山给予的关爱，刘洪涛深受感动。每当回家探亲时，都要来看望仰山。

当年，一位领导干部因犯错误受到降级处分，多年后，他提起这件事情，还对别人说：“我的问题是裴书记处理的，但我一点也不记恨他，他是按照组织原则，同时给了我极大的鼓励和帮助，既铁面无私又满怀热情，让我心服口服，我一辈子对他心存感激。”

对犯错误的干部，特别是普通干部，仰山一直坚持批评教育从严，处理从宽。他常说：这些干部的工资本来就不高，降几级工资会给他们的生活造成困难。所以每遇到此类情况，他都是慎之又慎，在不违反原则的前提下，能拉一拉的，绝不推出去。

文革中，仰山被造反派定为漏网老右派，理由之一就是：总是对犯错误的人充满同情。

正当仰山以满腔热情投入工作时，灾难却离他越来越近。从1966年之后，我们全家的噩梦由此开始，被抄家十几次，1968年省革委派人来抄我们的家，那是一次彻底的扫荡，抄过之后，家

里只剩下两块床板，连做饭用的刀、锅都拿走了。至此，我们的家彻底没有了。直到1979年河北问题得到解决，这中间度过了漫长的十三年无家可归的日子！

由于在文革中遭受种种非人的折磨，仰山感到自己的身体更差了，所以，待情况稍有好转，就开始了漫长的申诉之路。

1973年手术前，仰山给省革委及主要负责人写了一封十分诚恳的信："动手术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了，当然希望手术能根治好疾病，就是残废了也还能做一点轻微的工作，以补偿因病给党造成的损失。可是，万一发生意外，就可能去见马克思了，对此我并不害怕。唯一的顾虑，是组织上对我的问题，尚无明确的结论，如果发生了意外，家属和孩子们就无法弄清我的事。为了避免给孩子们遗留麻烦，我希望能在我活着的时候，看到结论。我相信群众，相信党，会做出正确结论的。"

但问题一拖再拖未能解决。仰山只好再次给主要负责人写信："我曾给你和书记处写过多次检查、病情汇报以及要求解决问题的信，但一直未见到片纸只言的回答……自从1965年到现在，已经整整过去十年了……在这十年中间，什么问题都能够搞清了。"同样没有收到任何答复。

1975年邓小平同志恢复工作后，仰山给小平同志写信，反映他的情况。仰山在信中申明，他被革职审查十余年，多次向河北省委及主要负责人写信要求尽快解决问题，然而写信不回，去人不见，年复一年，一拖就是十年！

仰山在信中写道："是我的问题太复杂吗？不是。我的历史清楚易查，各历史时期的老同志大都健在，档案材料齐备，完全不难搞清；是我不认识错误吗？也不是。我对自己在工作中的错误进行过多次检查、汇报，并不止一次向省委征求意见，但从未得到回音；是我的问题在省委挂不上号吗？更不是。原省委书记处中我一直是被打击的重点对象。是我不等待吗？时光已经过去整整十年了，人生能有几个十年！"

由于四人帮的干扰破坏，小平同志再次被打倒。仰山的信被转到河北省委，结果是泥牛入海。

1976年四人帮被粉碎以后，仰山又给省委主要负责人写信："在目前一片大好形势下，我再一次给你写信，并通过你向省委表示我的心情和要求：迫切要求尽快解决我的问题，以便在晚年再为党做些工作，贡献出自己的全部力量。急切等候回音。"结果仍然没有下文。

1977年3月，仰山又给华国锋主席写了报告。此报告很快就批给了河北省委，而且中央催办要落实的结果。直到1977年11月4日，河北省委终于派人给仰山送来了1976年3月30日（时隔580天后）所做的《关于裴仰山同志几个问题的审查结论》，此结论仍是犯走资派错误。

1978年1月，仰山又给中组部部长胡耀邦同志写信："我耐心等待了十二年之多，而且华主席、邓副总理都做过批示。党的十一大召开以后，仍然不给我一个正确的结论，迫使我感到河北省委少数人不想、也不可能认真解决我的问题，特恳请中央组织部直接给予解决。"

中组部对仰山的申诉极为重视，在了解了仰山无家可归的现状之后，将他安排到中组部招待所，并在生活等方面给予了极大的关照，让我们重新感到久违了的党组织的温暖。

从1972年到1978年近七年间，仰山共给河北省委及主要负责人写过十余次申诉请求，希望落实政策，改善医疗条件，解决子女的上学问题，但都一直未能如愿。无奈，只能向党中央反映情况，周总理、邓小平、华国锋、胡耀邦、王震等领导同志都及时地向河北省委及有关部门下达过明确的指示和要求。

粉碎四人帮以后，1978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过后，河北广大干部群众对河北工作的转机抱有过很大希望。但是由于省委某些领导迟迟不觉悟，不检讨，改正错误不力，致使他们的希望变成了失望。

仰山坚信自己的清白，以坚定的信心，摧不垮的意志，在等待中，做一次又一次的努力、争取。

仰山的黎明曙光是从1979年开始的。

1979年3月16日至20日，中央在北京召开了河北汇报会，出席会议的有李先念、余秋里、王任重、胡耀邦、宋任穷等部分中央领导同志。

在1979年3月20日的会议上，河北省和中央机关参加会议的同志全部到会。李先念、胡耀邦、宋任穷同志出席会议并作了插话。曾任河北省委书记处书记，时任国家科委副主任的张承先

同志在发言中专门谈到仰山的问题，他说：“裴仰山同志原是河北省委候补书记兼省监委书记。这个同志作风是正派的，过去省委一直认为不错。1965年中监委调查何朗明案件。何朗明抗日战争中投敌，此人作风很不正，拉拉扯扯，吹吹拍拍，刘秀峰同志把他搞到建筑工程部当副部长。当时有人揭发他的问题，牵连到林铁同志的夫人弓彤轩，因而触动了林铁同志，由何朗明事件又联系到1962年处理唐山问题，说他背着省委搞林铁、背着省委搞省委。查何朗明、弓彤轩的问题，当时是由中监委负责组织的，只是让省监委派人参加了调查组。说裴仰山‘背着省委搞林铁’根本不是事实。唐山是早已解决了的问题，张达三人给中央上书告××同志与裴仰山无关。张达给中央写信，这是党章规定的党员权利。因此而大批裴仰山是错误的。在这个问题上林铁同志负有主要责任，××同志也有责任，省委让我主持批裴，我也是欠了账的。到1966年，华北局前门饭店会议批林铁同志时，又说裴仰山同志是林铁的‘黑干将’，说裴仰山在何朗明案件上包庇了林铁。这样随意今天把白的说成黑的，明天把黑的又说成白的，完全违背了党的实事求是的原则。我们党内切忌这种不讲原则的实用主义做法。在文革中又在监委搞了个‘裴、张反党阴谋集团’，使裴仰山同志受了不白之冤。”

听了张承先的发言，仰山异常激动。这是自1965年8月被突然袭击以来，十四年第一次听到原省委书记处成员讲了公道话。

仰山积压在心里十几年的话终于有了一吐为快的机会。由何朗明问题到唐山问题，最后，仰山当着中央领导同志的面，向省委那位领导提了一个问题：“河北省委两条路线斗争是怎么形成的？”省委那位领导涨红了脸说：“是我人为划分的。”听到此话后，仰山表示今后不会再提此事。王任重同志则指着那位省委领导说：“你总是改不了你的那一套。”

在和胡耀邦、宋任穷等中央领导同志多次谈话后，为了顾全大局，仰山同意了中央的决定，回河北出任省委书记兼省纪委第一书记。知道了仰山要回河北工作，我们全家都反对，因为在河北这十几年的遭遇是不堪回首的岁月，令我们想起都会不寒而栗！如果说当年从河北省离开是死里逃生的话，再次回河北则是凶多吉少了。正源于此，我们全家才一致反对。但仰山说：“我是个老党员，在工作需要的时候，个人生命和党的事业哪个轻、哪个重？就是粉身碎骨也报答不完党对我的关怀和信任！”

1980年7月13日，河北省委印发了为仰山平反的决定。恢复名誉，推倒一切污蔑不实之词……

8月11日河北省委又下发了《关于为原省委监察委员会负责同志所谓背着省委搞省委以及反党集团问题平反的决定》。指出：经复查，省委认为：调查何朗明案件是中央监委主持进行的，根本不存在裴仰山同志借此背着省委搞省委、搞林铁的问题；所谓唐山事件，是裴仰山同志受省委指派，按照华北局和省委领导同志的指示，去解决唐山地区的问题，根本不存在借此反对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总路线，更不是什么企图夺左派的权；1962年的甄别平反，省监委在省委的领导下，严格按照中央的指示，做了大量的工作，解决了一大批1959年反右倾斗争中的错案，这是正确的，根本不是对几年的政治运动采取完全否定的态度；所谓反党集团是根本不存在的，纯属污蔑不实之词。省委本着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原则，推倒一切污蔑不实之词，予以平反，恢复名誉，消除影响。历史终于还了仰山政治上的清白，压在我们全家人心头的巨石，终于被推倒了，虽然已经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仰山十五年的蒙冤，被河北广大干部群众称为河北省第一大冤案。

仰山回到河北后，拖着病弱的身躯，夜以继日，废寝忘食，渐渐地他感到身体的问题越来越大，此时癌症在无情地吞噬着他的生命，为了拨乱反正的具体工作，他在与生命抢时间，1982年5月他不得不再次住进了医院。

在生命进入倒计时的日子里，他关心的仍然是工作，他嘱咐我和孩子们说：“如果高扬书记来了，我在睡觉的话，你们一定要把我叫醒，我要和他谈一谈。”（此时中央为解决河北问题，调高扬到河北省任第一书记）。

仰山于1982年6月29日走完了他艰难的一生，也是他无怨无悔的一生。■

（责任编辑　杨继绳）

《200位老人回忆张闻天》读后

○ 萧 扬

《200位老人回忆张闻天》一书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这是一本采访录。但这不是个人的单独采访，而是多人采访的多篇记录，是围绕张闻天这个人物的采访记录汇集。200位老人，有张闻天的老同学、老战友、老同事、老下级以及他的学生、亲属、警卫服务人员，讲述张闻天的故事，谈论各自心目中的张闻天。

与已有的传记、年谱及评论文章不同，采访录是当事人的亲身经历和独自看法。他们对张闻天的印象，得自同张闻天的亲身接触。他们谈论张闻天的事迹，就是重温跟张闻天在一起时的经历和留下的印象。他们的讲述，渗透着对张闻天的情感，产生于他们当年同张闻天接触而一直保持至今的感情。采访录所展现的，可以感到是受许多人爱戴与尊敬，也有些事令几位老人不满的张闻天，因此是可以触摸到体温的鲜活的张闻天。

与由当事人或旁人帮助撰写的回忆录不同，这是一本集众多人们回忆和评论的采访录。讲述者同张闻天接触的时期有早晚，期限有长短，他们的身份不同，职务各异，同张闻天所处的地位上下高低不一，观察角度自然也有差别。每个人讲述的，除少数人有简要概括外，大多也只是一个片断，一个侧面。但所有这些聚在一起，便是一幅绚丽多彩的完整人生画卷。从少年学子，到留学生的青年共产党人，到全党的总书记，一直到沦为个人崇拜统治下的牺牲品。从学者风范，理论家品格，战略家的视野，党政领导人的魄力和实干精神，以至为人处世的道德操守，这是全方位视角下的多棱镜中的张闻天。

与张闻天本人的自述不同，也与既有的政治结论不同，采访录是讲述者对张闻天真实看法的自由表达，是对张闻天客观的社会评价。现存的张闻天的自述材料，多是不正常时期的不正常交代和检讨。虽然也提供了许多基本材料和线索，但总不免有自我批判过头之处而不完全真实。至于为个人崇拜所强加和抱有成见的既有结论更不可信。其中极端的是延安整风时的批判和1959年庐山会议时所作完全颠倒黑白的批判。后者已由中央在事过20年后正式决定推翻。其他的结论也不在少数。采访录中的讲述者摆脱既有偏见的束缚，如实讲述他们眼中的真实所见（不排除偏见对某几位老人还有一定影响）。采访录仿佛是200位老人不受干扰的问卷答案，200份答案形成了公论，虽然当年的访问并不是在做民意调查。

200人心目中的张闻天，究竟是什么样的呢？人们有何共同的印象？又有何各自独特的视角？

几乎所有被采访者谈到对张闻天的印象，都说他举止文雅，谈吐谨慎，温和稳重，和蔼可亲，从来不发脾气。不像威严而令人生畏的大首长，更不像既有结论中搞“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宗派主义者。确实，莫斯科中山大学相互对立的两派同学，不论与张闻天是否同属一派，都说他“是搞学问的，不是搞派别的”。经过延安整风的统一思想，许多老人，包括曾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的老人，仍然认为张闻天“为人正派，不搞权术”。毛泽民的夫人钱希

钧讲述亲眼所见张闻天在中央苏区同毛泽东、谢觉哉、毛泽民等人在工作上生活上充满同志情谊的相处细节。毛泽东的这位弟媳像其他人一样，并未感到张闻天有丝毫拉帮结派的宗派主义和在党内斗争或同志相处中实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

党史上重大事件的亲历者，澄清了一些历史真相。例如，耿飚说，是张闻天在遵义会议以前最先提出要改变领导，让毛泽东出来，经王稼祥向将领们透露，得到大家赞成，才促成会议的召开。又如，杨尚昆说，在遵义会议上已经形成比较一致的意见是，由洛甫代替博古担任总书记。这就澄清了所谓洛甫是会后常委分工中才被确定为负总责的悬案。

周恩来与张闻天(右)

张闻天的同事或下级们，历述亲眼所见张闻天处理的党政要务，涉及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各个领域。其中军事将领们所谈张闻天在合江、牡丹江领导剿匪的故事，平日少为人知。张闻天不仅安排军事指挥干部，确定剿匪方针，统一干部思想，还具体制定作战计划，甚至在合江当土匪乘我主力不在而突袭攻陷萝北时，他还亲率军区直属部队从佳木斯驰往前线迎敌。可见将领们眼中的张闻天，显然不是传闻中丝毫不懂军事的书生。

张闻天的警卫服务人员的讲述，从另一个角度展现了张闻天作为成熟的领导人(而非所谓书生)不畏艰险、冷静沉稳的品格。在解放战争初期的东北，土匪和国民党特务活动猖獗，张闻天在残酷的对敌斗争险恶环境中开辟根据地，下乡常靠双腿，跋涉于茫茫雪野。做报告的讲台下曾被安放爆炸物，住所曾被扔手榴弹和夜间枪袭，暗藏土匪也曾携带手枪毒药混入内部充当厨师准备暗害。警卫人员担心首长的安全，张闻天却镇定自若，“一再鼓励我们要冷静，要坚持”。

张闻天的子女亲属和服务人员讲述了许多点滴事务、生活细节，从中可以看出，张闻天是个廉洁奉公、自律甚严、拒绝任何特权的老共产党人。他不仅拒绝制度规定以外的任何特殊待遇，甚至拒绝按制度规定应该享受的在住房、用车、家具配置、公务员配备等方面的许多待遇，还多次以个人节余工资交公。他决不利用权力地位为子女亲属谋利益，子女近亲都是普通百姓，没有一个当官和做生意的。另一方面，他善待服务人员，常支援他们粮票、钱物。罢官以后，他时间富余，买了课本、字帖，给他们上课，教写字、记账，还买一些书鼓励他们自学。他仍然赢得了他们的尊敬，同他们建立了深厚情谊。

这些就是本书展现的张闻天多维图像中的一些侧面。这就是张闻天，一个实实在在的张闻天。

追寻张闻天足迹的采访，是张闻天选集传记组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开始在张闻天文献的编辑研究过程中展开的。这本集子则主要是组内的张青叶采访整理的记录并由她初步编就。其他人也做了不少采访，记录未能全部收入。一些采访内容已经写入有关文章，遗憾的是另一些记录没有及时整理。本书付梓以后，又找到几篇原始记录，这里只将吴亮平和柯柏年两人的谈话整理刊出于后，使读者可以由此及彼，联想到本书中其他采访录的基本样式。

附一：吴亮平谈张闻天

1983 年 7 月 6 日，吴亮平在刘英家向萧扬、张培森谈对《怀念中央研究院院长张闻天同志》文稿的意见。记录由萧扬整理，整理时参照了张培森的记录。

纪念张闻天，纪念一些什么？对于我们党说

来，他最为珍贵的有几点。

他是在遵义会议紧急关头挽救红军挽救党的英雄。在毛主席领导的克服王明路线的斗争中，他是把党从危难中挽救出来的英雄。如果没有张闻天、王稼祥帮助毛主席，红军还不知道怎么样，后面的历史如何发展，中国革命的前途如何，都难于估计。张闻天敢于站出来，敢于拥护毛主席，光这一条功劳就很大，就了不起。毛主席常常记住这一点。我因为翻译了斯诺，毛主席就说我有大禹治水之功。我同张闻天根本不能比，张闻天的功劳就更不用说了。

第二，张闻天对毛泽东很忠实，在建立抗日统一战线、抗日、建国等方面为革命出力很大。但是他的特点是忠心耿耿为党、为革命，对毛主席的缺点错误敢于提意见，不计较个人得失名誉地位，在庐山会议上就是如此。对党对革命负责，杀头也要讲话，这种精神是对革命忠，对人民忠。庐山会议以后的后半生，是17年的坎坷。他是否想到这些？他是想到会挨整的。但是为人民利益，他至死无怨。这种革命精神，应该用以教育后世党员。他在经济研究所时我们在路上偶遇，他说，形势非常险恶，但我有话还要讲。他还在研究中国经济问题。后来他的作用已经不大，但他对人民对革命仍忠心耿耿。我们不以成败论英雄，而是以忠心论英雄。他在挨整时的态度，值得教育后世党员。

张闻天在遵义会议以前的错误是严重的。但是他与博古不同，他是对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错误没有认识，理论与实践结合得不好，路线、政策有错误。但是他这时就同博古有分歧（如对红军打仗的方针）。他的转变不是投机。他是为革命，一旦认识错误，便勇于承认，勇于改正。我们党内这样的领导同志并不多，所以说，他是勇于改过的模范。他思想上转过来了，所以才当总书记。

张闻天对毛泽东一直很好。就是在犯错误时他对毛泽东也尊重，不是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在苏区我是国民经济部长，政府开会时，他总是要毛主席讲话，讲完后将毛主席的正确意见吸收进去。在毛泽东处境不利时，他对毛的态度是比较正确的。相比而言，博古的态度就是讽刺。

（刘英插话：博古对我说，老毛看什么书？孙子兵法！马列的书不看。还说，今天到我这里借了两本。那时候毛主席还到闻天那儿坐坐。1934年9月，毛主席在于都看地形，领导扩红，得了疟疾。赣南省委打电话给洛甫，洛甫叫傅连暲连夜赶到于都，三天之内将毛主席的病治好。傅连暲对毛主席说，“是张主席叫我赶来的”，傅连暲老记得此事。）

所以，即使在错误路线时，张闻天还是爱护毛主席的，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不一样。

张闻天犯错误，与王明、博古不一样，有历史原因，认识原因。王明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打击我。他搞资产阶级的拉拉扯扯，我看不惯。张闻天则正派。在所谓二十八个半当中，我同洛甫好，就因为他正派。他有教条主义，但没有宗派主义，没有野心，这一点同王明不一样。他主要是认识问题，不是资产阶级野心问题。博古有野心，王明更不用说。张闻天一旦认识，就起来造王明路线的反。他的正义感使他拥护毛主席，所以张国焘要打倒他。这也可以说明他后来在庐山为何敢于讲话。他是诚心诚意革命，所以能有庐山会议的表现。他虽然列为二十八个半，但不是王明分子。博古可说是王明分子，凯丰也是。

在理论与实践关系的问题上，他有一个从脱离到结合的过程，一生贯穿着这种结合日益紧密、发展的一条线。他后来非常注意调查研究，将它当做党的第二生命。在合江时，他经过调查研究，提出好多好的意见。土改就搞得好。毛主席对他的一套也是欣赏的。那时我是东安地委书记。许多人说，东北的知识分子是日本人培养出来的。他说，不能这样看。经济构成的文件就是理论结合实际的文件。

张闻天改正错误是模范，教条主义被批后时刻以此为戒。所以，他的后半生不能说是教条主义。

最后，张闻天的人品高尚。王明就品质恶劣。无论对人对事，张闻天是中国人说的好人。他不会投井下石。他认为不对的才反对，他没有故意讲人坏话。他不搞故意陷害，阴谋诡计，他是明打明来。犯错误，摔跤，但不用卑鄙手段陷害人。

我第一次碰到闻天同志是在1925年去莫斯

科的火车上,一直到最后,有50年历史了。

(刘英插话:建国后还收到你寄来的合作翻译《法兰西内战》的100元稿费。闻天说,这是吴亮平翻译的,怎么给我?让退回去。)

附二:柯柏年谈张闻天

(柯柏年,1924年入党,延安时期曾在马列学院编译部、中央研究院和中央军委外事小组工作过,建国后曾任外交部美澳司司长、国际关系研究所副所长、驻罗马尼亚和丹麦大使。1983年2月10日上午,柯柏年接受萧扬和张培森访问。记录由萧扬整理。)

我是1938年5月到马列学院的,那时刚刚成立第一班。我对洛甫的印象深刻。

首先,他对所使用的人比较放手,这个特点比较突出。当时上级很多,比较起来,他的特点是相信别人,相信了就放手。所以在他手底下工作的人,至少是我,觉得愉快,也不大怕他。这并不是说,我对别人就怕。

第二,他是真正读书,真正研究问题的。他领导马列学院,就是把大家组织起来一起读书,读《资本论》等等。好多人把读书当作一种软任务。可是洛甫不是可有可无,规定每两个礼拜开一次会,到时候就硬是开会,把读书当作雷打不动的任务,坚持不懈。这对我影响很深。

第三,他不迷信。这不容易。一般的人,懂俄文的人,例如张仲实,对俄国杂志上每篇文章都当作圣旨一样,不敢违背。洛甫就不以为然。他说,应当独立思考。不能苏联放个屁也是香的。恩格斯的这本书(指《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苏联有一段时候把它批为二元论。传到我们这里就有两种意见。其实,家族首先是组织生产的。布哈林、德波林、米丁,过两天一个人下去了,说的话就变,我们就跟着人家变,莫名其妙地跟着人家犯错误。这是第三国际时期,大家是出于对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尊重。但洛甫说,要经过自己考虑。所以,他领导的讨论会比较活跃,不是一边倒。你苏联有什么了不起,不过是多做几张卡片。敢怀疑,就不犯错误。整风时德波林在我脑子里也没有地位,这就是洛甫对我的影响。

还有,洛甫敢于负责,犯了错误不向下推卸责任。他不溜。这也使人愉快。

还有,他比较平易近人,很少摆出一贯正确的样子,而是采取商量的态度。我在罗马尼亚当大使,路过莫斯科时都去找他,向他汇报工作,他也容易接近。罗迈(即李维汉,1940年任中宣部副部长兼中央研究院新闻研究室和教育研究室主任)就使人害怕,不过他是阎王面孔,菩萨心肠。洛甫是把你摆在平等的地位上。

洛甫看问题较远,对知识分子的特点抓得更深一层。对他们的毛病、优点、缺点,都抓得比较准。

马列学院编译部组织翻译马列著作。当时苏联出版有《马恩选集》两卷,《列宁选集》12卷。其中一些他们已经有了中文译本,但不全。凡是苏联没有翻译过来的,我们都要翻成中文。他的办法是,规定每天翻译一千字。这个数字不多,定额不高,也不低。因为翻译是个无底洞,有时为了一个名词,可以推敲一个月。

用脑子的人需要营养。延安不富裕。洛甫决定发津贴,一千字一块钱。当时延安各单位都发工资性的津贴,规定部长每月五块钱,科长三块,副科长两块,科员一块五,工勤人员可能是一块。延安没有稿费。但他增发津贴。有人一个月能拿到30元。能下这个决心不容易。没有眼光不会下此决心。无非知识分子多吃几个鸡蛋嘛。洛甫就说,人家搞了那么多业务,给点钱怎么不可以。徐(特立)老有津贴,一个月二三十块,但他自己不拿,都归教育厅了。洛甫也有一条,翻译的书将来出版了,有了稿费,现在给的要扣回来。

到了反彭黄张周,我们也莫名其妙。一个人在党的会议上讲话为什么不能听,不对可以批评么。不是事后诸葛亮,我当时就想不通。有人说他的笔名“思美”是想美国,这有什么意思?像洛甫这样敢顶逆风的人少。

读书人喜欢书,自己的书不愿丢。但洛甫不吝惜书,他如果认为他的某本书对你有用,就可以给你,而且不再要回去。他还送给我一本书。■

(责任编辑　杨继绳)

民国思潮：中国思想史的又一个高峰

○ 窦海军

这几年为什么冒出来“民国热”？我想很可能有这样一个逻辑：对于民国史的禁锢扭曲，在国民心中埋下了好奇、求真的种子，这几年环境有意无意的宽松，令这种子萌发，而民国真相让人觉得新奇、有趣的同时，还使人们产生了恍然有悟、“原来如此”之感，甚至现实的困惑、无奈和愤懑，竟然也能在“民国回味”中得到一些启示、排解，于是，萌芽便长成了“民国热”这样一棵时尚文史之树。

不过，当我们仔细观察一下就会发现，民国趣味和民国价值，远没有挖掘到应有的深度和广度，“民国热”至此，也只能算是“浮热”。

“民国热”的过程应该由表及里，也就是由民国的名人趣事到民国的风范情怀再到民国的思想魂魄，提升到“民国思想热”的阶段，并且对民族、国家的文明发展产生较深层的作用。我们讲“继往开来”，必须先要“知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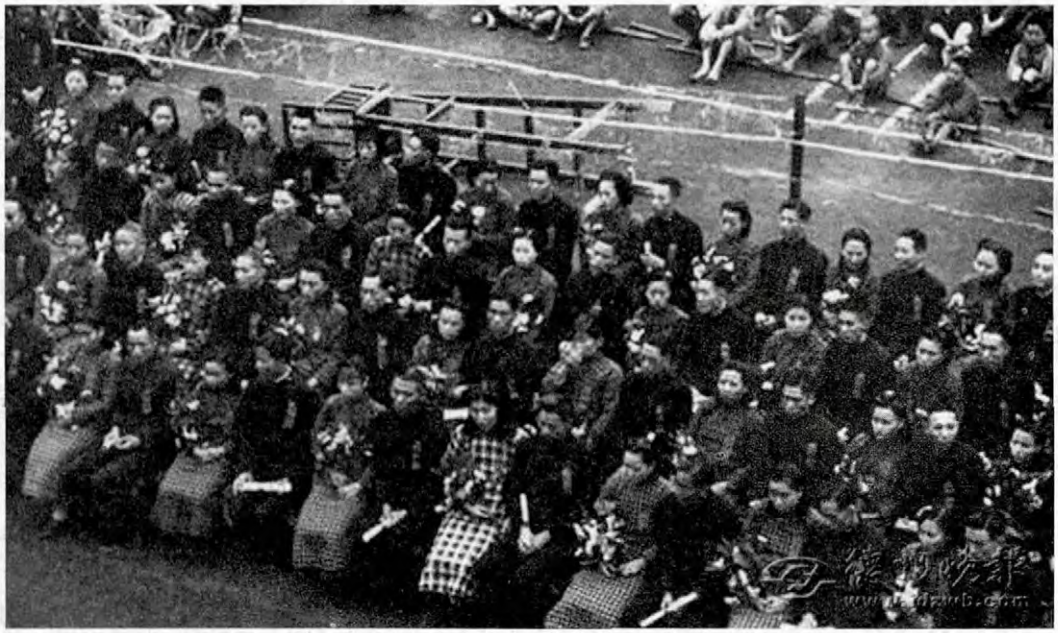
民国时期的报纸

民国的奇闻趣事，我原来也知道一些，民国知识分子的气质情怀也打动着我，但是只有在阅读《民国思潮读本》(《作者出版社》出版)这套书稿的过程中，我才感受到了思想深层的触动，并使我的思绪走向深远。我甚至认为，民国是中国思想史上继春秋战国“百家争鸣”之后的又一个思想高峰。不同的是，春秋战国主要是中国内部诸子百家思想学说的大活跃，而民国则是中国传统文明与西方近现代文明大碰撞背景下的思想大活跃。民国，是在西方近现代文明的无情冲击下，中国封建统治的终结点，也是古老中国分娩新文明的剧痛期。可惜的是，这个转折，这个分娩，没能顺利完成。表面原因，是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兴起，更复杂更深层的，可能还有文化根性、民族根性层面的原因。

编阅270万字的《民国思潮读本》，令我感慨万千。例如，我更加确信，所谓的“历史的上坡期下坡期”只是一种大致的趋势，而不是全方位的具体表现。北洋军阀和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虽然离 Republic(共和，即民国)甚远，但总的来说还是走向共和的。特别是活跃的民国思潮，还是蔚为壮观的。到了20世纪后半期，中国思想领域的活力，便迅速跌入了中国历史上罕见的低谷，只是到了八十年代才又见一点点新的起色。正是中国这样一个百年思想史脉络，才导致了民国思想在今天还大有现实意义。今天的许多困惑、无奈及愤懑，竟然可以在我们领

略民国思想的峰峦时，获得启蒙及排解，这便是我们预测、期待“民国思想热”即将到来的主要根据。

活跃的民国思潮，必然涉及文化、政治、经济、科学、宗教等各个方面，其中关于政治文明及具体政治制度的思辨，最为引人瞩目。事实上，这个时期关于民主宪政的思辨不但很活跃，而且在思想界也基本上达成了共识。包括当时的中国共产党，也是高举着民主宪政的大旗与独裁专制的国民党政府展开斗争的，并因此赢得了民心，尤其获得了广大先进知识分子的同情、支持甚至追捧，进而得到了时代动力的助推，并在1949年夺取了整个中国大陆的政权。这是一个关节点，随着马克思主义在新中国取得指导一切的绝对统治地位，民国思潮在大陆宣告终结，而民国思潮中的诸多“弄潮人”也发生了分化。



民国时的集体婚礼

当独裁专制的蒋家王朝开始崩塌的时候，当崇尚现代政治文明的中国共产党创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大厦拔地而起的时候，当广大知识分子为民族和国家的春天欢欣鼓舞的时候，只有胡适、傅斯年这样少数的知识分子既对国民政府表示痛恨、惋惜，又不相信中共。性格火爆的傅斯年在北平解放前夕，面对国民政府的崩溃，他悲伤、绝望、痛不欲生，几近自杀。但他同时又认为共产党很可能会毁灭文化研究，断送学术前途。于是他向蒋介石建议，将一批珍贵文物资料运走，同时设法劝一些学者离开北平赴台湾，并亲自主持了“抢救行动”的实施。然而大多数学人都痛恨独裁腐败的国民党，看好共产党，不愿意去台湾或别的国家，就连陈寅恪这样的大学问家，也没有接受国民党的“抢救行动”，选择了留在新中国。温和理性的胡适，则毫不犹豫地去了美国。

思想、思潮远不等于现实的果子，即使它是对的，是符合文明发展潮流的。国民党虽然在1947年就宣布了行宪，但当时内战正在进行，宪政名不副实。国民党退到台湾以后，又继续实行戒严，宪政也是一纸空文。直到三十多年后，民国思潮中民主宪政的思辨，才在台湾结了果子。我想这与蒋经国有着国民党大陆政府腐败、崩溃的切肤之痛有关，甚至可以猜测这与蒋介石兵败后的晚年反省也不无关系。台湾的路径，一定会对中华民族的文明发展具有重大的意义，它不仅证明了在中国文化范围乃至黄种人范围实现民主政治的可能性，还可能具有火种的作用，只是我们无法预测这个意义能够在何时、以何种形式，得以大力度地具体呈现罢了。

中国大陆到底会不会出现“民国思想热”呢？其实，民国思想的涵义和价值，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早已心知肚明了，至于社会上没有表现出“民国思想热”，只是因为大多数知识分子出于种种原因的苟安及噤声造成了内热外冷的局面罢了。我们甚至怀疑，以中国当下普遍浮躁、粗陋、堕落的时尚及脆弱的环境，本就不会产生任何的“思想热”，也不会有什么“民国思想热”的到来。■

（责任编辑　杨继绳）

从“三分疲楚”到朱毛“十六字诀”

○　沈建洪

伍子胥献“三分疲楚”策略，吴国以小搏大

公元前506年，吴王阖闾亲自率领3万精锐部队伐楚，五战五捷，长驱直入，一度占领楚国郢都。楚国上下在灭顶之灾中团结起来，反抗吴军暴行，秦哀公发兵援楚抗吴，吴国内部发生了夫概叛乱，还受到越国重兵袭击，结果吴军大败而归。

关于伍子胥向吴王阖闾奉献的攻楚之策，《左传·昭公三十年》记载，吴王阖闾问伍员：“‘伐楚何如？’对曰：‘楚执政众而乖，莫适任患。若为三师以肄焉，一师至，彼必皆出。彼出则归，彼归则出，楚必道蔽。亟肄以罢（疲）之，多方以误之。既罢而后以三军继之，必大克之。’阖闾从之，楚于是乎始病。”这就是伍子胥提出的“三分疲楚”策略，事在公元前512年。

在这里，“楚执政众而乖，莫适任患”，是伍子胥对楚国政情的判断，意思是说，楚国执政的官员多，他们互相不和，没有一个敢于承担主要责任。伍子胥认为，针对楚国政情，如果把吴军分为三部分，轮流骚扰楚军，吴军一部分出击，楚国必定调动全部兵力应战；等到楚国军队开过来，吴国军队主动避让，让楚军扑空。然后组织第二轮进攻，迫使楚军处于持续紧张状态之中，陷入疲于奔命、劳累不堪，将士将普遍厌战，战斗力受到极大削弱。“亟肆以罢之，多方以误之。既罢而后以三军继之，必大克之”，使楚国及其军队极度疲乏，无法弄清我方意图，然后集中兵力，发动总攻，必定大获全胜。

伍子胥画像

荀罃首倡“三分四军”，加强晋国防御

伍子胥的“三分疲楚”策略，受到晋国方面军统帅荀罃“三分四军”战术的启示。

晋楚两大诸侯国战争不断，郑国夹在中间，成为双方争夺的目标。在争夺郑国的战争中，楚国运输线很长，晋国后勤供给线较短。公元前564年，晋国中军帅荀罃提出：“吾三分四军，与诸侯之锐以逆来者，于我未病，楚不能矣，犹愈于战。暴骨以逞，不可以争，大劳未艾，君子劳心，小人劳力，先王之制也。”大意是说，把晋国的四军分为三部分，联合诸侯的精锐部队，用以迎击楚军；我军以逸待劳，将士精力充沛，而楚军远道而来，体力和给养不能与我军相比，因而不能投入战斗，这样，（战争减少）比两军不断地交锋好得多。长期用大量人命来拼，不可以作为争夺胜利的策略，那样做的话，后面更大的劳苦和伤亡，永远没完没了。（减少战争和伤亡）自古以来的法则，要依靠君子的智谋。按照荀罃“三分四军”的主张，晋国把上军、中军、下军、新军分为三部分，并设立总预备队，总预备队用以应对前线不时之需，为前线补充兵员，所以称为“三分”而不称为“四分”。“四军”是指当时晋国的四个方面军，即上军、中军、下军、新军。“三分四军”策略重点在于轮流出动三分之一的兵力骚扰楚军，诱使楚军不得不常年处于被动应战状态，加剧楚军所处劣势地位，使其将士疲倦厌战，消耗其主动进攻能力。而晋国军队积极主动、坚持不懈地骚扰、挑战，但不与楚军决战。同时，军队的三分之二正常训练，养精蓄锐。贯彻这个策略，

晋国加强了对楚国的防御。郑国虽然仍然在晋楚间摇摆，但明显偏向晋国。

晋悼公采纳“三分四军”之后不久，提出予民休养生息政策，两者结合施行，收到积极效果，晋国一度恢复霸主地位。“三分四军”是春秋晋国历史一个亮点。

范仲淹画像

吴国的战略战术

伍子胥的“彼出则归，彼归则出”，“亟肆以罢之，多方以误之。既罢而后以三军继之，必大克之”，颇有运动战战略战术思想，在冷兵器时代，可以算得上一个战略战术构想了。其一，“彼出则归，彼归则出，亟肆以罢之，多方以误之”，表达的是在保存自己的前提下，积极寻求战机，骚扰敌人，打击敌人，迷惑敌人，削弱敌军的战斗力，具有战术性质；其二，“既罢而后以三军继之，必大克之”，主要是表达想要达到的目标，具有战略性质。伍子胥的设想，在反复、接连、持久地进行攻击、骚扰之下，使楚国及其军队极度地疲乏厌战，紧接着集中兵力，组织大规模进攻，必定能够大获全胜。这当然只是伍子胥的战略期待。

从实战来看，公元前584年到公元前504年，80年间，吴楚争战25场，吴胜17场，楚胜5场，兵锋未交3场（均因楚国内部原因，或发觉吴军戒备严整而退兵）。吴楚之间的二十多场战争，吴国失利次数较少，证明伍子胥概括的战术正确反映了吴楚数十年交战的经验，是成功的。

但是，作为战略，吴王阖闾和伍子胥、孙武子，没有能够创造实战支持。公元前506年吴国军队破楚入郢，烧毁库存的粮食，砸碎象征楚国王权的九龙之钟，首领们“以班处宫”，霸占楚王宫室和大臣妻妾，总之，吴军一夜之间变成了凶神恶煞，战争性质发生了质的变化，各诸侯国对于吴国的态度也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破楚入郢作为一个成功战例，存在时间很短。

而公元前505年秦楚联军打败吴军却具有战略意义。

吴军暴行激发了楚国军民的反抗，君臣团结起来，普通百姓人自为战。吴军处处受到袭击，3万人无法有效占领郢都。秦哀公应楚国使臣申包胥之请，决定派五百乘兵力援楚抗吴。秦楚联军夹击吴军。吴国内部又发生了夫概叛乱，再加上越国重兵袭击，阖闾不得不退兵回吴，以彻底失败结束这场战争。伍子胥“三分疲楚”策略的战略目标“必大克之”最终落空，一败涂地。

范仲淹抗辽“十六字诀”

《范文正公文集》卷二十《乞修京城劄子》（一、二），是范仲淹分别于庆历二年、四年（公元1042、1044年）向宋仁宗的两次建言，主要论述修建汴京（开封）城防工事的重要性、必要性。当时北宋面对两股强敌，一股是西夏，一股是东北契丹人的辽国。汴京远离西夏，但与辽国距离比较近。范仲淹非常担心契丹对汴京安全的威胁。契丹是一个强悍的民族，在俄罗斯民族看来，契丹就是中国，俄语直到现在仍然用“契丹”两个字的谐音称呼中国。

北宋经常辩论首都选址问题，有多个备都，汴京也称东京，还有南都（现在的商丘），河北大名为北京，洛阳是理想中的都城。范仲淹《乞修京城劄子》（二）认为，洛阳的地望适合作为都城，应该从长计议，把洛阳城防建设好，并在洛阳建设国家府库，储备粮食，等待适当时候定都洛阳。但是，迁都兹事体大，未可轻举，当时最现实、最紧迫的问题是要加强汴京城防，确保朝廷安全。把汴京城防修好，高城深池，朝廷安全才有保障；即使兵临城下，也有时间调兵遣将，可以拒绝辽方岁币、割地等无理要求；然后对入侵辽军实施“锐则避之，困则扰之，夜则惊之，去则蹑（追踪）之”的“十六字诀”，即对入侵辽军进行骚扰，使之不得安宁，难以立足，疲惫不堪，战斗力日渐消耗，无法纵深侵犯。如此，契丹将不敢觊觎汴京。范仲淹认为，这是“保社稷安四海之全策”。范仲淹《乞修京城劄子》（二）结尾特别强调，这是“因其隙而图焉，皆须京师大固然后能行其策。”修好东京城防，实施抗辽“十六字诀”的机

朱德、毛泽东

会也创造出来了。

范仲淹抗辽“十六字诀”是对付契丹的辅助策略。范仲淹抗辽“十六字诀”继承了伍子胥以弱胜强，骚扰敌人，使敌人疲惫不堪的思想，也包含持久战思想，不求速胜，贵在坚持，拖垮敌人，等待时机，战而胜之。在文字表达上，把“彼出则归，彼归则出”，“亟肆以罢之，多方以误之”加工润色为“锐则避之，困则扰之，夜则惊之，去则蹑之”，句子工整、排比、上口，便于言说，便于记忆，便于传授，便于将士掌握运用。到此，“十六字诀”已经成型。

朱德毛泽东游击战争“十六字诀”

朱德、毛泽东著名的游击战争“十六字诀”“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是中国共产党军事理论建设第一块基石，是灵活机动战略战术的最初建树。

古今两“十六字诀”源于“三分疲楚”

中国几千年经历了无数战争，也积累了丰富的战争经验，“十六字诀”源远流长，是中国数千年战争经验的继承和发展。贵刊曾发表文章争论“十六字诀”的发明人是朱还是毛，我觉得没有意义，在云南讲武学堂受过正规军事教育的朱德和饱读中国古籍的毛泽东应当知道我这里说的情况。笔者认为，朱德、毛泽东游击战争“十六字诀”的源头，是伍子胥的“三分疲楚”策略。

首先，伍子胥的“三分疲楚”取攻势，积极寻求战机，削弱敌人，壮大自己。范仲淹抗辽“十六字诀”对入侵辽军也是取攻势，取驱除鞑虏态势。朱德、毛泽东游击战争“十六字诀”同样取攻势。三者有共同的灵魂。而荀罃的“三分四军”取守势，是防御性策略；因此，朱毛游击战争“十六字诀”的源头是伍子胥的“三分疲楚”，而不是荀罃的“三分四军”。

第二，当时吴楚相比，无论国力、兵力，不仅吴小楚大、吴弱楚强，而且相差相当悬殊。而晋楚两大国长期势均力敌，无论经济、政治、军事还是文化，都是春秋时期南北争霸的主角，“三分四军”使晋国在与楚国的强强对抗态势中稍胜一筹。而吴国实施“三分疲楚”，靠灵活机动的战术以小搏大、以弱胜强，用智慧和创造精神战胜敌人。范仲淹抗辽“十六字诀”、朱德、毛泽东游击战争“十六字诀”都含有以弱胜强的意义。

第三，在文字表达上，荀罃的“三分四军”没有名言警句的光彩，而伍子胥的“三分疲楚”初步具备了名言警句必备的思想之光、语言之玉、文字之珠的品格，含义丰富，读来上口，易于传播。古今两个“十六字诀”具备了名言警句的特征，透露出对于“三分疲楚”思想和表达形式的继承发扬。

第四，尤其重要的是，伍子胥提出“三分疲楚”战略战术之后，公元前511年、公元前508年对楚国打了两场胜仗，紧接着公元前506年的破楚入郢之仗几乎使楚国灭亡。破楚入郢，虽然昙花一现，毕竟短暂闪现了“必大克之”的期待，成为历史上著名的战例，强化了“三分疲楚”的内涵和影响力，所以认定“三分疲楚”为源头理由更加充分。

透过范仲淹抗辽“十六字诀”，可以看到伍子胥“三分疲楚”的影子，而朱德、毛泽东的游击战争“十六字诀”则与范仲淹抗辽“十六字诀”非常接近了。把三者放在一起，它们的源流关系就显而易见了。■

（作者为苏州市新闻传播研究会常务理事、副秘书长）

（责任编辑　杨继绳）

目击“天鹅绒革命”

○　刘天白

我在离开捷克斯洛伐克9个月之后，受新华社总社的派遣于1988年12月底重返布拉格分社任首席记者。我这次赴任经历了捷克斯洛伐克的巨变。

纪念帕拉赫掀起风暴

我重返布拉格后不久，便目睹了这里风云激荡的一周。1月16日是布拉格查理大学哲学系学生扬·帕拉赫为反抗苏联入侵自焚20周年。帕拉赫目睹祖国的主权惨遭苏联的践踏，当局又无力对抗，满腔悲愤。这位在1969年1月16日只有21岁的大学生，便采取了自焚的行动，表示对苏联侵略的抗议。广大人民群众深为这位青年的爱国行动所震撼，在民族蒙受外强欺压的情况下，帕拉赫成了人民心目中的英雄，每年这一天都举行悼念他的活动，表达对苏联占领的不满和抗议。早在1月16日之前，一个署名“集体自杀组织委员会——火炬1号”的青年人，给不少组织写信，表示要在这一天为纪念帕拉赫而自焚。连日来，布拉格气氛紧张。15日达到高峰。为了报道实情，我上午9点多钟就来到瓦茨拉夫广场观察情况。这时，在整个广场和与其垂直的普什科普大街上，布满武装警察。12点后，有上万人涌到这里，悼念这位年轻的爱国志士。捷通讯社和电视台在当日的新闻广播中称这次集会“是西方颠覆中心和某些西方电台伙同‘七七宪章’运动策划的挑衅，目的是煽起反社会主义情绪。为了维护首都的安宁，公安部队逮捕了91人。”

警察对群众动武的消息，顷刻传遍全城。从16日起，数以万计的群众又到瓦茨拉夫广场悼念帕拉赫，群众示威一直持续了1周。示威者除呼喊“自由”、“人权”，“要戈尔巴乔夫和杜布切克”的口号外，还呼喊打倒捷共中央总书记雅克什的口号。示威人数之多，持续时间之长，为二十多年来所没有。当局逮捕了包括著名作家、“七七宪章”运动领导人哈韦尔等上百人，对他们进行公开审讯，以“煽动罪”判处哈韦尔9个月的徒刑。

对哈韦尔等的审讯并没有平息事态，相反地在国内外引起更大的抗议浪潮。捷克斯洛伐克文艺界、科技界和宗教界人士上书联邦总理阿达麦茨，谴责当局的镇压行动，要求释放哈韦尔等被捕者，并希望同当局就社会问题进行对话。

在一月风暴之后，捷克斯洛伐克国内的形势更加动荡，反对派与当局之间的斗争更加激烈。当局动员一切力量谴责示威活动。捷共中央主席团、民族阵线中央主席团、工会中央理事会均明确表示支持保安部队的镇压行径，指责示威的组织者为反国家分子，得到西方的支持等。雅克什等捷共领导人，死抱着关于1968年的“布拉格之春”是反革命的结论不放，他们意识到，在这个问题上的任何松动，他们的政治生涯就要完结。他们把维护自己的地位和维护捷共的领导作用及社会主义制度等同起来，因此广大群众更把他

1989年布拉格群众示威

们和捷共视为一体,把攻击的矛头对准捷共。在3月底举行的中央全会上,雅克什表示,决不能向反对派和教会势力让步,不能改变在1968年问题上的立场。捷共党报《红色权利报》在3月底发表长文,批判1968年“布拉格之春”的领导人杜布切克,指责他“完全和有意识地站到了修正主义立场上,积极实施修正主义纲领,把国家引入严重的危机之中”,重申1968年苏联等5国对捷克斯洛伐克的入侵是为了“制止反革命”,是“国际主义援助”。

引人注目的是,在一片对示威的谴责声中联邦政府的态度却不同。与1968年事件牵连较少的阿达麦茨总理2月16–18日赴苏联访问。2月17日受到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的接见。戈尔巴乔夫向他详细了解了捷国内的情况,并向他介绍了苏联的改革经验。这是近4个月来他同戈尔巴乔夫的第二次会见。他在18日结束对苏联的访问时向捷克斯洛伐克记者发表谈话说,“必须习惯某些我们过去不习惯的新做法。我们愿同一切真诚地、想以创造性方式帮助社会主义的人进行对话。”阿达麦茨回国后在斯洛伐克同青年会见,坦率交谈。他在会见中谈到了捷克斯洛伐克人民关切的两大问题:一是对历史的评价,也就是对1968年“布拉格之春”的评价问题;二是对话问题。他强调指出,“评价历史不容拖延,因为社会需要客观真实的看法”。他还说,“对历史问题要从个人的立场超脱出来是不容易的,但必须这样做,对此应该理解。如果昨日的经验不打开我们的眼界,我们就不能摆脱过时看法的束缚”。

《几句话》宣言吹响号角

在一月风潮之后,各种组织纷纷建立。特别引人注目的是捷共1968年时期的一些领导人重整旗鼓,于2月份建立了“社会主义复兴俱乐部”,表示拥护1968年4月《行动纲领》中所提出的杜布切克的政策,拥护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主张,并愿同一切改革力量联合。

6月底,曾在1977年1月1日组织起来的“七七宪章”运动、“社会主义复兴俱乐部”联合青年、宗教等组织联合发表《几句话》宣言。宣言的中心思想是为1968年的“布拉格之春”改革运动平反、重新评价五十年代的历史冤案、承认反对派组织合法等要求,并广泛征集签名。宣言准备在国内争取100万人签名,并把这一签名运动作为支持其纲领的公民投票。宣言在国内广泛流传,签名者从初期的7000多人增至2万人。其中有著名艺术家、科学家、工人、大学生,甚至还有两名军官,52名警察。《几句话》宣言还号召在8月21日苏联入侵21周年时举行大规模示威活动,以支持上述要求。与此同时,捷共前领导人杜布切克和杜布切克时期的总理切尔尼克联名致信捷共中央和苏联等5个对捷克斯洛伐克入侵的国家的党中央,要求他们承认和宣布1968年对捷克斯洛伐克采取的行动非法。

针对“七七宪章”运动等组织就1968年问题发动的攻势,捷共中央主席团不仅号召全党共诛之,并下令党员不得签名。一些领导人还亲赴各地,动员领导干部,对《几句话》宣言组织批判。报刊发动攻势,称此文件“旨在推翻捷克斯洛伐克的社会主义制度,复辟资本主义”,为1968年问题翻案。公安部门严密监视反对派的活动,搜查了一些人的住宅。当局公开发出警告,如“七七宪章”运动人士胆敢在8月21日采取行动,当局将用武力镇压。

反侵略:八、十两月大示威主题

8月20日,即在苏联侵略捷克斯洛伐克21周年前夕,布拉格市中心的瓦茨拉夫广场上,笼罩着一片肃穆紧张的气氛。

上午9点钟,我到达了广场,看到所有通往广场的道路皆被武装警察封锁。虽然行人可以穿行,但车辆,除公车外,一律不得通行。在这个长680多米,宽近61米的广场上,没有昔日熙熙攘攘的人群,手持报话机,腰系手枪和警棍的警察以及一些便衣特工,格外引人注目。广场两侧的建筑物和电线杆上已经架好了摄像机,穿梭般的警车,疾驰而过。

8月21日,即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21周年纪念日,布拉格市的群众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要求宣布苏联入侵非法和为“布拉格之春”平反。

从下午3时起,数以千计的人们,从四面八

方向瓦茨拉夫广场汇集，其中多数为年轻人。5时许，广场上的人群肃立，为反抗苏联入侵而牺牲的人们默哀。

示威者高呼“自由万岁！”“杜布切克万岁！”“波兰和匈牙利万岁！”等口号，并高唱捷克和斯洛伐克国歌。

全副武装的警察包围了整个广场，他们用高音喇叭宣布示威非法，号召人们散开。示威群众没有听从，这时警察便排成人墙，把人群挤出广场和与广场垂直的步行街。晚上8时许，被驱散的示威群众，又汇拢起来，警察又调集了大批警车，重新包围了广场，并用警棍再次驱散了示威群众。

8月21日过后，动荡的捷克斯洛伐克又迎来了本国历史上的又一重要纪念日——10月28日。它是捷克和斯洛伐克民族在奥匈帝国的废墟上建立独立的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71周年国庆日。这一天下午，数以万计的人群涌向市中心的瓦茨拉夫广场、老城广场、红军广场和伏尔塔瓦河畔，高呼“自由”、“民主”、“雅克什、胡萨克下台”等口号。警察驱赶人群，并抓了数百人。

这次示威和8月21日的示威相比，规模更大，呼喊的口号更为激烈，矛头直指1968年苏联侵捷后被扶持上台的捷共领导人。它预示着更大的风暴将会来临。

急风暴雨11日，捷共丧失政权

在捷克斯洛伐克形势越来越严峻的情况下，布拉格又迎来了11月17日，它是捷克大学生反对希特勒暴行的纪念日，也是反对派计划向捷共领导地位发起最后攻击的日子。为纪念11月17日50周年，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青年联盟、布拉格高等学校组织和国际学联联合在布拉格阿尔贝尔托夫举行了纪念会。大约有3-4万人参加，除大学生外还有一些教授和当年反抗德国法西斯暴行的参加者。游行者高呼要“自由”“民主”、“要新政府、雅克什下台”，“哈韦尔万岁”、“杜布切克万岁”、“释放政治犯”等口号。当集会结束后一部分大学生向市中心进发，在民族大街警察、警车、装甲车出动干涉，封锁游行队伍前进的路线，打伤167人，144人被捕。捷通社称这次大学生的和平游行被1968年“布拉格之春”时期的著名人物利用“破坏社会生活，治安部队被迫采取措施确保平静和秩序”。但是警察对学生动武，激起人们对当局的愤怒，犹如导火线点燃了长期以来积压在人们心头的不满和怒火，从而引发了持续11天、席卷全国的抗议风暴，最终冲垮了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40年之久的执政地位。

公民论坛成立，局势急转直下

11月19日，布拉格又有数万人举行示威。示威者高呼雅克什下台、取消“一党执政”、“自由选举”等口号。号召罢工、罢课的传单比比皆是。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主席团委员、捷克政府总理皮特拉发表电视讲话，呼吁公众保持安定，谴责国内外的某些集团把捷克斯洛伐克视作眼中钉，破坏其社会稳定。他的讲话并未使局势平静下来，相反事态继续扩大。在布拉格建立了大学罢课协调委员会，其他城市也建立了类似的组织。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青年联盟主席团和该市高等学校委员会主席团举行会议，在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书记处成员、社会主义青年联盟中央主席瓦·莫霍里塔的参加下，通过声明，谴责公安部门对大学生采取的行动，要求成立议会委员会对这一事件进行调查。

在这一天，在布拉格掀起的示威风暴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七七宪章”运动、“复兴俱乐部”、捷克斯洛伐克赫尔辛基委员会、争取公民自由运动等12个反对派组织，宣布成立公民论坛，领导这场运动，哈韦尔成为核心人物。次日，公民论坛的姊妹组织“公众反暴力”在斯洛伐克成立。这两个组织成为全国示威活动的指挥者。在以后的日子里，在布拉格每天都有数十万人示威，示威并扩展到全国各大城市。公民论坛强烈要求那些支持1968年苏联干涉的捷共领导人——胡萨克、雅克什、福伊季克、扎瓦吉尔、英德拉和霍夫曼立即下台；布拉格市委第一书记什捷潘和联邦内务部长立即辞职；调查11月17日警察镇压学生的情况，处罚责任人，释放所有政治犯。还表示支持大学生提出的11月27日举行总罢工的呼吁。继而又提出代表人民同当局会谈，解决当前的局势。

面对激化的形势，捷共中央主席团举行会议，讨论国内的政局。总书记雅克什在会见捷苏友好协会领导干部时发表讲话，呼吁人们采取理智和审慎的态度，强调破坏稳定、煽起混乱和无政府主义的企图，只能将社会引入后果无法估计的危机之中。捷共中央主席团委员、布拉格市委第一书记什捷潘会见布拉格各大工厂党委领导人，要他们争取工人和技术人员，支持党的政策，号召所有共产党员对示威活动表明坚定的立场。当局以“安全”为名，从全国各州把5000名工人纠察队调集到布拉格。

在局势不断发展的形势下，捷共领导内部进一步发生分化。联邦政府和两个民族政府表示不能容忍破坏宪法和法律的行为，但不愿走冲突的道路，主张政治解决问题。国防部长瓦茨拉维克发表电视讲话，一方面谴责反社会主义运动，但同时又表示，军队永远同人民站在一起。拥有147万成员的社会主义青年联盟公开站在大学生一边。捷共中央书记处成员、社会主义青年联盟中央主席莫霍里塔参加了游行，并宣读了社会主义青年联盟中央书记处的声明，提出了调查警察施行暴力问题、同反对派进行对话和实行彻底改革等要求。他本人还向公众保证，如果再发生镇压罢课学生的事件，他将辞职。政府总理阿达麦茨同布拉格大学生、艺术家及公民论坛代表进行首次对话。阿达麦茨保证不会再对群众使用暴力，说他已经要求总检察长对警察干预情况进行调查，并表示当局将继续同反对派对话。

针对当时的局势，捷共中央主席团举行会议，决定24日召开中央全会。

反对派步步紧逼，捷共丧失政权

11月24日，在政治风暴愈刮愈烈的形势下，从这一天上午起至深夜，捷共中央一直举行全会，经过激烈争论，以雅克什为首的领导班子全体辞职，由原中央主席团委员乌尔班内克出任总书记。莫霍里塔进入书记处。乌尔班内克在讲话中表示，要解决当前的紧张局势，只能通过政治解决办法来实现。捷共愿走一条新的道路，愿同所有愿意合作的人包括以前被清洗的人进行协商。他愿意在民族阵线的基础上建立赞成社会主义的各政党和社会团体的广泛政治联合。

下午时分，布拉格市中心的瓦茨拉夫广场上，又有40多万人在寒冷的气温下举行示威。在瓦茨拉夫的塑像上悬挂着杜布切克的巨幅画像。杜布切克首次在布拉格发表讲话，他说，“过去二十多年，我们一直在黑暗统治下生活，今天我们总算又看到了光明。在捷克斯洛伐克出现的危机状况，是对过去和现在都只属于我国人民的事务进行的暴力军事干涉造成的。因此必须无条件地消除它留下的恶果和整个所谓的正常化政策，这一政策的代表者必须无条件地离开。在瓦茨拉夫广场上发出的声音，代表全体捷克和斯洛伐克人民的呼声和希望。”他呼吁工人纠察队、军队同人民站在一起，团结起来，为争取民主、自由和具有人道面貌的社会主义而斗争。群众对他的讲话报以热烈的掌声，并齐声高呼“杜布切克万岁”，“杜布切克当总统”。

11月25日，捷共在文化宫召开基层党的干部会议，传达中央24日的决定。干部们在会上对党的领导进行了严厉批评，要求被选入捷共中央主席团的一些成员辞职，召开中央全会和非常代表大会。公民论坛代表哈韦尔在群众大会上发表声明，对新选举出的捷共领导成员不满意，认为那里还有一些臭名昭著的人物。

在公民论坛的压力下，联邦政府决定向总统建议，在政府中补充民族阵线其他政党的成员以及非党人士。11月26日，哈韦尔等公民论坛的代表同政府和民族阵线的代表团举行会谈。阿达麦茨总理和恰尔法部长代表政府，联邦议会副主席库切拉和捷克斯洛伐克社会党中央书记什科达代表民族阵线，莫霍里塔代表捷共和社会主义青年联盟。哈韦尔、克劳斯等人代表公民论坛。哈韦尔重提在公民论坛成立时提出的要求：让那些臭名昭著的领导人辞职；总统在1989年年底前辞职；释放政治犯；组成有公民论坛代表参加的议会委员会，审查11月17日事件。在会晤后，公民论坛又在列特纳广场举行有50万人参加的大会，动员群众参加27日举行的总罢工。阿达麦茨在大会上讲话，他呼吁尽快结束罢工和示威，以及把27日两小时的罢工缩短为几分钟。他表示要满足大家的要求，实现全民谅解，赞同党和政府应开始同公众对话。杜布切克

也在会上发表讲话,他要求苏联、民德和保加利亚就1968年出兵侵捷进行道歉,并要求捷共现领导为“布拉格之春”和当年被清洗的人平反。

公民论坛公布了它的夺权纲领,主要内容是制定新宪法,取消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在国家中的领导作用,以及实行市场经济等。

从11月28日起,公民论坛开始在捷克斯洛伐克发号施令。当天,公民论坛和“公众反暴力”组织的代表同政府和民族阵线的领导人再次举行会谈。以哈韦尔为代表的反对派组织提出以下通牒式的要求:

——联邦议会必须于29日取消宪法中关于捷共在社会中的领导作用、关于马列主义是国家官方意识形态和关于民族阵线的第4、第6和第16条款。

——联邦议会主席英德拉必须辞职。

——联邦议会立即谴责苏联1968年对捷进行的军事干涉和5国出兵破坏国际法准则。

——联邦议会必须取消1989年1月对刑事法进行的修改。

——联邦议会通过法律,撤消那些“不关心人民的意愿和利益,背弃誓言的议员”的资格,补选由民族阵线、公民论坛、“公众反暴力”组织提出的候选人为新议员。

公民论坛还威胁说,如果政府不能履行这些要求,公民论坛和“公众反暴力”组织将要求政府辞职,并自己推出总理,否则将重新宣布总罢工。在公民论坛步步紧逼的形势下,以阿达麦茨为首的代表团就上述要求同公民论坛达成协议。联邦政府当日召开特别会议,批准阿达麦茨同公民论坛达成的协议。联邦政府还通过了宪法修改草案,准备29日提交给联邦议会。上述要求实际上确认了公民论坛的胜利。

公民论坛在28日晚间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除重申上述要求外,还表示,它已经致函总统胡萨克,要他为了国家局势的平静发展,至迟于12月10日前辞职。

面对这一严峻形势,捷共中央主席团在布拉格召开全国党的干部会议,总书记乌尔班内克发表讲话,号召全党行动起来,保卫社会主义。他说,一些势力利用群众运动反对社会主义。他们鼓吹民主,却不让共产党人说话,他们的目的实际上不是对话,而是要一言堂,实现权力垄断。共产党人不能对此无动于衷,否则就要失败。他还强调说,“社会主义理想虽为错误的实践而受到损害,但它依然保持着它的威力和有效性。它表达了劳动人民的利益和对社会公平的追求,捷共将继续为实现这些理想而斗争”。捷共虽然发表这一声明,但它已无力扭转当前的局势。拥有68年历史的捷共实际上已经失去了执政地位,陷入无力自拔的困境。

11月29日,联邦议会开会经过6个多小时的讨论,通过宪法法律,取消1960年的社会主义宪法中关于共产党在社会中的领导作用,关于民族阵线和关于用马列主义精神进行教育的第4、第6和第16条款。议会支持政府尽快向总统提出改组政府的建议。议会主席英德拉辞职。虽然拥有350名议员的议会有3/5的共产党人议员,但他们也无力扭转潮流。虽然捷共有七十多年的斗争历史,拥有170多万党员,但它已不是昔日社会的领导力量,只是捷社会中的一个政党。总书记乌尔班内克一再要广大党员承认和习惯这个现实,用行动争取恢复党的威信。

法新社记者在报道中,描述捷克斯洛伐克人民群众的大规模示威活动,“秩序井然,犹如天鹅绒一般温柔”,因此把反对派这种夺权方式称作“天鹅绒革命”。这一用语被各国媒体广泛采用。

阿达麦茨总理被迫辞职,公民论坛组建新政府

在议会宣布取消捷共在社会中的领导作用的宪法条款之后,公民论坛继续采取夺权行动。

12月3日,政府改组,但公民论坛立即发表声明表示不满,认为新政府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因为在21名部长中有15名共产党员,非党人士只有5人。声明要求政府进行彻底改组。声明还要求胡萨克在12月10日前释放全部政治犯和辞去总统职务。如果上述要求不能实现,则将于12月11日再举行总罢工。公民论坛继续组织大规模群众示威,逼迫新政府辞职,按照它的意愿重组。

12月7日,阿达麦茨在压力下辞去总理职务,由原第一副总理恰尔发出任总理,组成民族

谅解政府，在21名成员中，共产党人有10位，其中包括总理和国防部长等，这是四十多年来捷共首次处于少数地位。它表明捷共失去了政府这一重要决策机关中的领导作用。

公民论坛把哈韦尔推到总统宝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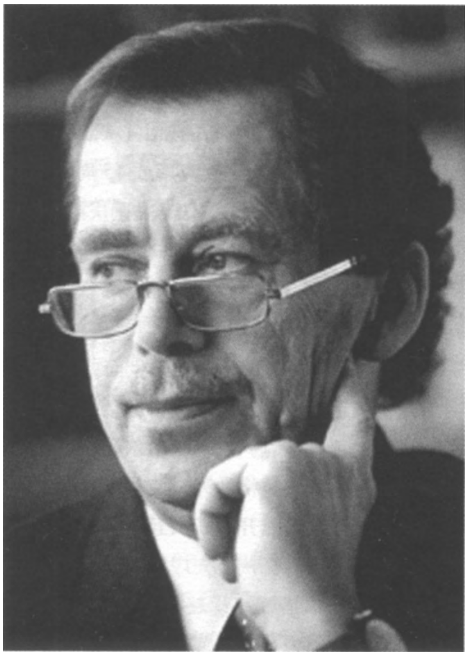
在新政府成立之后，公民论坛在进一步夺权，彻底摧毁捷克斯洛伐克现有的政治体制。下一个目标是总统。

在新政府成立的当天晚上，在记者招待会上，哈韦尔这位不善言辞的公民论坛的核心人物，在记者的一再追问下表示，就职业来说，他是一个作家，无政治野心。但是公众的利益高于个人利益，如果形势发展要他担任总统，他愿意去做。这是哈韦尔首次公开表示他将出任总统。这表明，这位坐过多年监狱的“持不同政见者”，将从牢狱之门直奔总统宝座。

12月10日胡萨克被迫辞去总统职务。空缺的位置由谁入座，被提名的总统候选人有4个。公民论坛宣布推举哈韦尔为总统候选人。

在这一时期一组志愿者就谁应该成为总统问题进行了民意测验，有3万人回答。其中2.5万人（约85%）回答说不知道。其余的人，多数表示拥护杜布切克。拥护哈韦尔的人只有1%。就是在大学生中进行的类似民调，哈韦尔也没有得到更多的支持。但是公民论坛通过种种运作，在12月19日的议会选举中把哈韦尔推到总统的宝座。

捷克斯洛伐克的这位总统，1936年10月5日出生在布拉格一个显赫的资产阶级家庭。从小博览群书。他在化学实验室当了4年学徒和实验员，在夜校完成了高中的学业。由于出身缘故，不得学习人文学科，因此他在大学攻读了两年技术专业。从20岁起，开始在文学和戏剧杂志上发表文章。他在军队中服役两年后，在布拉格两家剧院当舞台技术员。1963年创作的《花园盛会》由于针砭当时的社会名扬一时。此后他发表了一系列作品。他是1968年“布拉格之春”改革运动的积极参加者，他坚决反对苏联入侵。在苏联侵捷后，他的剧作被禁演。在所谓正常化的年代，他作为“持不同政见者”，曾三次入狱，在监狱中度过5年的时光。



哈韦尔：从阶下囚到总统

哈韦尔曾就他出任总统一事发表感言说，他一生一直与原政权对抗，从未想过自己要担任任何公职，更未想过会担任国家的总统。当他听到要推选他任总统时，惊讶至极，但他别无选择，是“天鹅绒革命”把他推上了政治舞台，使他一夜之间成为了代表这个国家的总统。

杜布切克出任议长

杜布切克终于度过二十多年被管压的漫漫长夜，虽然他为之奋斗的“布拉格之春”改革运动的理想尚未能如愿地在他的祖国实现，但他亲眼看到捷广大人民群众掀起的“天鹅绒革命”推倒了依附苏联的雅克什、胡萨克集团的统治，驱逐苏联的占领军，恢复了国家的主权和独立。

在11月风暴中，群众呼喊的口号中，最多的是要杜布切克当总统。但是这位“布拉格之春”的代表人物关于建设“人道、民主的社会主义”的主张与公民论坛的意愿相悖。在各派的协商下，12月28日，杜布切克当选联邦议会主席。他在当选后发表讲话说，在时隔二十年之后，他又重新担任当年曾不得不离开的职务。他认为，捷今天的事态发展，是1968年“布拉格之春”改革运动的继续。联邦议会作为国家的最高权力机构，今后将捍卫公民的正当利益，确保捷今天的社会进程不再逆转。在新的政权机构中，他庄严地站在最高立法机构的岗位上，坚决捍卫法律的尊严，直到1992年9月因车祸不幸去世，结束了他为人民的利益，为在捷克和斯洛伐克的大地上实现社会主义理想而甘洒热血的一生。

新外长丁斯特贝尔谈对外政策

丁斯特贝尔出任新外长。他曾是捷克斯洛伐克广播电台的著名国际评论员。曾在印尼和纽约担任常驻记者。他作为新闻工作者,利用电台这块阵地,为1968年的“布拉格之春”改革运动呼喊。他坚决反对苏联入侵。在8月21日苏军占领布拉格,坦克向电台挺进的危机时刻,他和电台的同事们,冒着枪林弹雨,把捷共中央、政府和议会谴责苏联入侵的声明向全国播出,之后又建立地下电台,号召人们起来反抗苏军占领。为此他失去工作,靠打工为生,做过夜间看守,烧过锅炉。他也是“七七宪章”运动的重要成员之一。由于参加捍卫人权,反对当局迫害正义人士,于1979年被捕入狱,直到1982年方才获释。他在监狱中的日日夜夜,分析欧洲和东欧国家的形势,思考欧洲和东欧的未来。梦想有朝一日,推倒在欧洲的两大集团,东西德实现统一,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出现变革,原本统一的欧洲重新统一起来。他曾和同在一个监狱中的哈韦尔一起讨论这一当时看起来很难实现的梦想,共同做着欧洲统一梦。1985年,他把自己对欧洲的愿景写成一本禁书《关于欧洲的梦》。他说,他不曾想到,他的梦想那么快地在东欧和整个欧洲的大地上逐渐变为现实。在1989年的风暴中,丁斯特贝尔也是公民论坛的支柱。他说,目前他们正对捷的对外政策进行分析,努力确定重点,提出新的方针。关于捷苏关系问题,随着对苏联等五国的侵略已经受到公开谴责,捷苏关系中的主要障碍已经消除。当年强加给捷的莫斯科协议和苏军暂驻条约,从国际法角度来说是无效的,捷已经就此问题同苏联进行了会谈,关于苏联从捷撤军问题,两国在短期内就会达成谅解。

前外长哈耶克解析“天鹅绒革命”

1989年12月9日晚,我如约到1968年时期的捷克斯洛伐克外长、“七七宪章”运动创始人之一的哈耶克教授家采访。

他是有名的法学专家,曾任捷克斯洛伐克文化教育部长、外交部长、常驻联合国代表。1968年苏联等五国军队入侵捷克斯洛伐克时,他作为外长和当时的副总理希克以及其他两名部长正在国外,他们四人在南斯拉夫发表了一项声明,谴责苏联等国对捷的侵略。接着他又到联合国安理会这个国际组织的最高讲台发言,代表1500万捷克斯洛伐克人民,怒斥苏联等五国破坏国际法准则,践踏捷的主权。

当我走到他的寓所前叩门时,给我开门的是一个弯腰驼背的老人,只有从他厚厚的眼镜中射出来的坚毅和智慧的目光,我才认出这就是当年的哈耶克外长。他连忙请我进去。他说,他很高兴见到我,他还记得当年我们多次见面。他告诉我,他的夫人经不起折磨,已离开人世,儿子因他而受到株连,流亡瑞典。现在只有他一人在布拉格。我环顾客厅四周,除了书柜外,还卧着一条与他朝夕为伴的黑狗。我告诉他,中国严厉谴责苏联1968年出兵侵捷。当年8月23日,我们敬爱的周恩来总理发表讲话,义正词严地谴责了苏联的霸权主义行径。我们明确表示站在捷克斯洛伐克人民一边。新华社做了大量抨击性报道,我们知道他在联合国安理会的讲台上,代表1500万捷克斯洛伐克人民,怒斥苏联的侵略,也知道他和其他反抗侵略的人士一起建立的“七七宪章”运动,我还把我当年写的有关“七七宪章”运动的消息送给他。他说,他们清楚地知道这一切,对中国人民深怀感激。

哈耶克向我谈起他同希克等一起发表的声明以及在安理会的讲话时,仍不无激动地说,他的这些正义行动使他陷入二十多年的厄运之中。1970年他被开除出党,失去工作,人们给他戴上了各种帽子。但他熟知法律,坚信五国的干涉是不义的侵略。就是在最困难的时刻,他和数十万正直的捷共党员也没有屈服。1977年,他以及一大批反对苏联军事干涉和坚持“布拉格之春”改革思想的人,联名组织了“七七宪章”运动,主要是根据捷签署的人权公约——《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揭露当局违背欧安会文件,迫害反对苏联侵略的爱国者,并要求就保障基本人权问题进行对话。他们名义上要求保障人权,实际上矛头直指苏联侵略。十多年来,宪章运动的签名者逐渐增多,最多时有1400多人。虽然不少人为此坐监

狱，失业，但他们始终坚信正义必胜。

哈耶克接着和我谈起了对捷所发生的11月风暴的看法。他说，他从未想到风暴来得如此之快。他认为，“捷出现的这场风暴是一场平静、文明的革命。虽然全国几百万人游行，工人罢工，学生罢课，但到处秩序井然，连一块玻璃也没有打碎。甚至工人罢工造成的损失自己也抽时间补上。群众主要是对雅克什为首的捷共领导长期以来所奉行的僵化、专制政策不满。他们不顾国家的主权和独立，坚决支持苏联对捷的侵略。为了维护自己的地位，抱着对1968年‘布拉格之春’的错误结论不放，由他们领导的捷共已不能代表国家和人民的利益，这使他们丧失党心民心。导火线是警察干预11月17日布拉格大学生为纪念捷克大学生反法西斯斗争50周年而举行的游行，这燃起人们心头的怒火，从而在这场全民的风暴中，短短几天内就把雅克什等撵下台了，也使捷共丧失了在国家中的执政地位”。

哈耶克说，社会主义离不开民主，离不开保障基本人权，这些问题，从“七七宪章”运动建立起，就向当局再三申述，并希望对话。但当局的回答是，只有在审讯时才同我们这些人对话。

哈耶克告诉记者，他也是“社会主义复兴俱乐部”的成员。“社会主义复兴俱乐部”的纲领，也就是他的奋斗目标，即希望把捷建成一个富裕的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他说，他不会再回到捷共之中，但他希望捷社会中的左派力量联合在一起，建立一个强大的左派党，同西欧的左派力量联合起来。

捷共反思失掉政权之痛

捷的国家政权改变后，捷共新领导反思失掉执政地位的原因。它在一份文件中说，人民曾三次把希望和信任赋予了捷共。第一次是在资产阶级共和国时期，由于捷共坚决捍卫劳动人民的利益，共产党人在罢工浪潮中冲锋陷阵，在议会选举中，得到工人阶级的支持，赢得在议会中的合法地位。第二次是1945年以后，由于捷共在反法西斯战争中英勇战斗，许多共产党员流血牺牲，出现了大批反抗法西斯的英雄，人民又把信任给予了共产党，使它成为领导国家的执政党。第三次是1968年，杜布切克领导的“布拉格之春”改革运动，敢于向苏联强加给捷人民的模式宣战，开创符合本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又赢得全民的支持。但是胡萨克和雅克什等捷共前领导人，皆是1968年苏联侵捷后上台的，他们为维护自己的地位，秉承勃列日涅夫集团的意志行事，背叛民族利益和国家主权，坚决捍卫苏联入侵，坚持关于1968年的错误结论不变，不仅不为当年的受害者平反，而且一直把他们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为了和1968年的改革划清界限，他们阻碍改革，独断专权，丧失了党心和民心。在11月风暴中被群众赶下台，也使捷共丧失了领导地位和国家的社会主义制度。

苏联大兵长期驻扎在捷，人民时刻感受到国家主权遭受践踏之痛。许多党员坦言，是苏联的坦克碾碎了他们对社会主义的信念。还有许多党员参加11月份的游行示威，是希望能纠正捷共领导人执行的错误政策，但没有想到，会使捷共执政权旁落，社会主义江山变色。

捷克群众用表示胜利的“V”字欢送苏军

捷共新领导在分析捷共遭到重大挫折的原因时还指出，二战前，捷属于世界上十个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列。但在苏联入侵后，国家处于高度封闭状态，生产状况大大落后，和周围资本

苏德同盟时期苏联的一些事

○　龙　飞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斯大林与希特勒为了各自的利益——避免过早发生战争并划分在东欧的势力范围，1939年8月23日苏联和纳粹德国于莫斯科签订了一份秘密协议《苏德互不侵犯条约》。一周后，9月1日清晨，希特勒对波兰实施闪电战，第二次世界大战正式爆发。

互不侵犯条约签订后，苏联国内，尤其在文艺界，一些荒诞不经的事件便接连发生。

《女武神》登台，《亚历山大·涅夫斯基》遭禁

斯大林极力要向希特勒表示友善，首先想到应在莫斯科演出一部德国大作曲家的作品。而最适合为苏德友谊配乐的作曲家莫过于瓦格纳了——希特勒是瓦格纳的狂热崇拜者，对这位19世纪的音乐天才顶礼膜拜。斯大林得知希特勒的“瓦格纳情结”后，亲自下令，将瓦格纳的歌剧《女武神》作为立即在莫斯科大剧院演出的剧目，并指定由享誉世界的电影导演爱森斯坦担任该剧导演。

爱森斯坦是电影导演，为什么忽然让他执导歌剧呢？除了因为他声名显赫外，还有更深层次的缘由。爱森斯坦出生于拉脱维亚的里加，母亲是俄罗斯人，父亲的祖辈为德国移民。十月革命后，父亲反对革命，移居德国，成为德国公民。爱森斯坦是个俄德混血儿，身上流淌着俄国人和德国人的血液。由这样一位身份特殊的人士出任导演，岂不更足以表明苏德两国亲密无间的友好关系吗？

《女武神》首场演出，苏联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全体隆重出席，并盛情邀请德国驻苏大使作为贵宾参加。演出后，报上对这部歌剧发出一片热情洋溢的赞美声。

尽管爱森斯坦导演《女武神》受到了热烈得近乎肉麻的吹捧，但他也并非一帆风顺。正值这出歌剧风靡全莫斯科的时候，他的历史巨片《亚历山大·涅夫斯基》却遭当局禁映。影片拍摄于1937年至1938年间，内容反映13世纪的俄罗斯，在爱国英雄亚历山大·涅夫斯基大公领导下击溃德国侵略者的故事。该片放映时受到广大观众热烈欢迎，其声誉甚至超过他的成名作《战舰波将金号》。当斯大林看完影片后，拍着爱森斯坦的肩膀，大加称赞道：“谢尔盖·米哈依洛维

主义邻国相比，人民的生活水平差距极大。这也引起群众的不满。由反对派利用各种纪念日掀起的示威风暴，得到广大社会阶层的支持，使捷共不可避免地失去了在国家中的执政地位。国际气候也是捷共丧失政权的重要原因。戈尔巴乔夫提倡改革,波兰、匈牙利和民德国内政权的变化，使捷犹如处在孤岛之中。西方的渗透和对反对派的大力支持，加速了捷局势的剧变。

捷共新领导还认为，经过捷克斯洛伐克人民多年的斗争，苏联、波兰、民德、保加利亚和匈牙利五国领导人终于在1989年12月4日在莫斯科宣布，“他们国家的军队1968年进入捷克斯洛伐克是对主权的捷克斯洛伐克国家内政的干涉，应当受到谴责”。苏联同日发表声明承认1968年出兵的做法是“不慎重和不适当的”。1990年2月6日，哈韦尔总统访苏期间，两国外长签署了苏联从捷撤走7.35万驻军的协定，确定在1991年7月1日前分三个阶段撤走全部驻军。捷克斯洛伐克人民终于结束了历史上一个屈辱的篇章，夺回了国家的主权和尊严。■

（作者为新华社原驻捷克首席记者）

（责任编辑　杨继绳）

《亚历山大•涅夫斯基》电影海报

奇(爱森斯坦的名字及父名),你毕竟是个好布尔什维克!”

然而如今形势变了,苏联同德国在一夜之间突然成为友好国家。再放映这部影片便犯了大忌,生怕触怒希特勒,必须将它拿下。爱森斯坦直到自己的影片被打入冷宫,才对官方为什么那样起劲地将《女武神》搬上舞台有所领悟。

把德军改成白匪军

遭遇同样命运的还有著名作曲家普罗科菲耶夫。这位很有天赋的作曲家于十月革命后侨居国外,但生活和创作都不很顺利。他在三十年代中期“大清洗”时回国定居,努力遵循“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原则。“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委员、书记日丹诺夫于1934年全苏作家第一次代表大会上提出的。

二十年代,国外当代艺术作品大量涌入苏联。列宁和开明的教育人民委员卢那察尔斯基鼓励创作自由,这是苏联文艺界各种创作流派争奇斗艳的时期。一批富有创新精神的艺术家在各自的领域进行大胆探索。但自1934年后,先锋派的实验便告结束,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成为创作的唯一准则。斯大林开始亲手干预文学艺术。普罗科菲耶夫先后完成两部大型声乐套曲《纪念十月革命20周年》、《为斯大林干杯》。他正踌躇满志,想紧跟形势,尝试创作一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歌剧。1939年他将著名作家卡达耶夫的小说《我是劳动人民的儿子》改编成歌剧《谢苗·科特科》。作品描写1918年德军占领乌克兰时青年英雄谢苗·科特科的战斗事迹,剧中的德国侵略军全都是令人发指的屠夫。

普罗科菲耶夫请戏剧家梅耶荷德担任导演。当时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是被斯大林认可的、唯一正宗的演剧体系。而梅耶荷德的艺术主张和斯氏体系有所不同,因此被视为“形式主义”。斯大林早就对他恨之入骨。梅耶荷德除了艺术思想不安分,还在不经意间卷入政治斗争。布哈林一向赏识他,而布哈林1938年作为反党分子被处死。梅耶荷德同托洛茨基也有交往,曾把自己的一个剧本题献给他。托洛茨基是十月革命的第二领袖,列宁逝世后成了斯大林的头号政敌,1927年被开除出党,1929年被驱逐出国,1932年被剥夺苏联国籍,1940年在墨西哥遭暗杀。他的家属几乎全被镇压,亲朋好友普遍受株连。梅耶荷德自然在劫难逃,1938年他的剧院被勒令关闭。赋闲在家后他应普罗科菲耶夫之邀执导《谢苗·科特科》。但剧排到一半,他便因“组织反革命集团”罪锒铛入狱。

普罗科菲耶夫请爱森斯坦完成歌剧,但长了教训的爱森斯坦不肯接受。普罗科菲耶夫不得不又另寻导演。斯大林得知这出剧的内容后,认为如此描绘德国人是不能容忍的。每次排演都派官员来“指导”,官员逼着艺术家们修改。总检察长维辛斯基指示:只要把德国人改成白匪军不就可以了吗?最后将剧中德军通通改成国籍不明的入侵者。

“另一种政策”

1940年7月,著名作家、记者爱伦堡从被德国法西斯占领的巴黎归来。巴黎撤退时的那些可怕情景仍历历在目,因此他深信纳粹德国不久即将进攻苏联。但他发现莫斯科一片太平景象,

报纸宣称苏德两国友好关系已经巩固了。爱伦堡对此十分担忧，上书苏联第二号人物兼外交人民委员莫洛托夫，想同他谈谈自己的看法。莫洛托夫派助手接见他，听了他的讲述，那位忧郁的助手无可奈何地苦笑道：“我个人同意您的看法……但您要知道，我们执行的是另一种政策。”

爱伦堡后来才明白，自己当时太天真，以为真实的情报有助于政策的制定。而实际恰恰相反，政府需要的却是能证明所执行政策正确性的情报。遇到一些作家和记者，当他谈起对纳粹德国的刻骨仇恨时，竟有朋友说，由于他在巴黎居住时间太长，与那座城市结下深厚感情，所以对德国法西斯的个人色彩过于浓重了。他听到这些话十分愤慨和惊讶，决定把自己在法国的亲身见闻全部写出来，说明法国军队的崩溃源于精神的脆弱和怯懦，而并非由于德军攻无不克。因为苏联很快就要同纳粹德国打仗了，这是无法回避的现实，必须把这些写下来，以警示世人。同年9月，他开始创作长篇小说《巴黎的陷落》，描写1939年法国遭受希特勒侵略的惨痛经历。作品共分三部，第一部描写1935年至1937年间的巴黎，此时德国人尚未出现。这一部完成后，《旗》杂志同意发表，但编辑提出条件：书稿中凡出现“法西斯主义”的字眼得删去，凡遇到“打倒法西斯分子！”的口号要改成“打倒反动分子！”，等等。爱伦堡不同意，同他们争执了好久。

《巴黎的陷落》第二部写的是1937年至1938年间的事件，完成后却没被通过。爱伦堡情绪沮丧，但仍坚持接着写，开始创作第三部。

斯大林的判断

苏联上演了希特勒酷爱的瓦格纳歌剧，控制了对德国“不友好”的电影、戏剧和文学作品。斯大林以为这样就能笼络住希特勒，苏联便可以赢得一段天下太平的日子。

自签订《苏德互不侵犯条约》一个多月后，也就是从1939年10月开始，德国侦察机在乌克兰和白俄罗斯地区上空飞行达数百多次。对于这些情报，斯大林不以为然，他相信希特勒会遵守条约。1941年4月3日，英国首相丘吉尔给斯大林发来一份秘密情报，说有事实证明德国即将入

斯大林（右）、莫洛托夫（左）与德国外长里宾特洛甫（前）1939年签订苏德协议。

侵苏联。斯大林却认为丘吉尔是在唆使苏德之间相互敌视。

斯大林每天都收到这类情报，但他并不理睬。当然，德国肯定要入侵苏联，这点他深信不疑。但根据自己的分析与判断，德军目前的重心在英国，只有结束西线战事才会把兵力东移到苏联。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历史已经证明，德国人选择两面作战只能自取灭亡。斯大林认为希特勒不会在东西两线同时作战，德国的入侵将于1942年春天，而不是1941年。因此他计划到时候要先发制人，进攻德国。

斯大林感觉此时的苏联还是安全的，若说令他心绪不宁的反倒是自己身边的两位军事将领：总参谋长朱可夫和国防人民委员铁木辛哥，因为这两个人同他对局势的看法大相径庭。

面对种种军事情报，1941年6月14日《真理报》刊发政府声明称，德国未向苏方提出领土要求，苏联也在认真遵守互不侵犯条约。声明澄清了苏德即将发生战争的传言。

多疑的斯大林认为下属背叛了自己。6月份在军内搞清洗，300人被捕，其中20名是获得金星奖章的高级军官。

6月21日晚，一名德国士兵投奔到苏联边防

分队。据这个德国兵说，他因喝醉酒，打了一个军官，怕被枪毙，逃到这边来。他提供了一个重要情报："6月22日凌晨德军将在德苏边界全线发动进攻。"朱可夫将此紧急报告斯大林，斯大林仍然不相信。

战争爆发，斯大林精神崩溃

果然，正如那名德国士兵所言，22日凌晨希特勒向苏联发动闪电进攻，兵分三路同时轰炸苏联大片领土。朱可夫马上打电话向斯大林要求开火反击，斯大林不准开火，说这是德军的挑衅行为，否则事态将会升级。朱可夫心急如焚，敌人入侵，人民倒在血泊中，而国家领导人却按兵不动。直到莫洛托夫去会晤德国驻苏大使后，回来说："德国已经向我国宣战了！"斯大林才不得不接受这个严酷事实。

据赫鲁晓夫披露，贝利亚后来告诉他：当时斯大林精神几近崩溃，他对政治局委员们说："战争爆发了，它的发展将是灾难性的。列宁给我们留下了无产阶级的苏维埃国家，而我们却……"随后又说："我辞去领导职务。"然后乘车回郊外别墅。政治局委员们去找他，他惊恐万状，以为大家是由于他放弃职责而来抓他的……经政治局委员们劝说，斯大林才重返克里姆林宫办公室。

不管贝利亚说得是否准确，反正斯大林的确已经被吓垮。他承认，自己没有勇气向全国人民宣布战争开始了，只好委托莫洛托夫在当天中午12点向全国人民发表广播演说。

莫洛托夫在演说中称此时苏联伤亡200多人，但实际伤亡数字至少是这个数字的一百倍。

忧心如焚的苏联人民围坐在收音机旁。希特勒发表了演说，丘吉尔也讲了话，而莫斯科电台却一直在播放歌曲。由于事先没做任何战争准备，只好反复播放歌曲……

斯大林刚愎自用，对希特勒充满幻想，错误估计形势，并且不相信任何人，听不进别人的意见，完全依靠自己的直觉。战争前夕，理应争分夺秒积极备战，他却满腹狐疑，以莫须有的罪名处决了一批经验丰富的高级军官，大大削弱了自身的战斗力，让亲者痛仇者快。战争爆发，他无论在思想上还是在军事上全都缺乏准备，以致惊慌失措。所以战争初期，苏方处于被动地位，伤亡惨重。

重新调整

战争发生，局势骤变，文艺界那些事也得重新调整。

德国鬼子是头号敌人，瓦格纳的《女武神》立即从保留剧目中删除。吹捧过它的那些评论家们，反过来又对它口诛笔伐。

马上放映《亚历山大·涅夫斯基》。影片在抗击敌人、鼓舞士气上起到了巨大作用。

重排《谢苗·科特科》。只是它已无力起死回生了，剧本被改得一塌胡涂，其灵魂人物——第一任导演梅耶荷德已在1940年遭枪决。

立即推出全本《巴黎的陷落》。尤其它的第三部具有强烈的反德情绪，正适合此时的政治气候。作品还在排版，各报刊杂志已纷纷发表小说的片段。书一问世便获斯大林奖金。

自1939年8月23日签订《苏德互不侵犯条约》起，至1941年6月22日希特勒进攻苏联止，"苏德同盟"（有漫画称之为"荒唐的伴侣"）仅仅维系了一年零十个月。回眸这段短暂历史所发生的那些事，值得后人深思。■

（作者为南开大学外语学院教授）

（责任编辑　杨继绳）

本刊稿件选用标准

一、本刊重点关注重要历史人物和重大历史事件，特别关注亲历者的叙述。

二、内容真实可靠，不可有任何虚构。文中重要引语，请注明出处。

三、篇幅不要过长，一般四五千字，长篇最好在八千字之内。

四、原则上一稿一投。如一稿多投请予说明。

五、投稿三个月以上，未接到采用通知，请作者另行处理。作者请自留底稿，本刊无力退稿。

本刊社址：　北京西城区月坛南街69号
邮政编码：　100045
本刊电话：　010-68534879
传　　真：　010-68532569
编辑部邮箱：yanhcq@sina.com
yanhcq@gmail.com

关于要求更正不实信息的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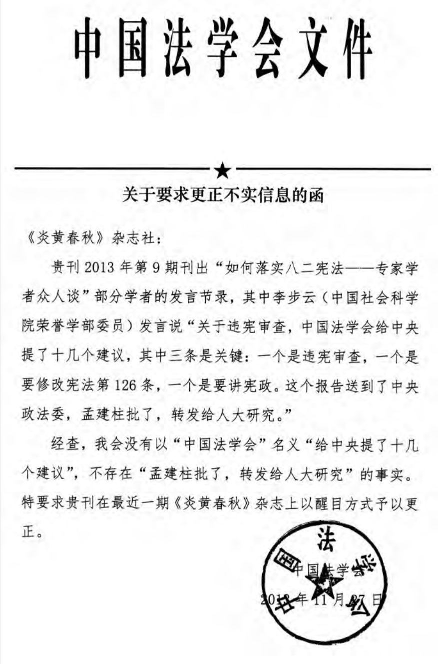
《炎黄春秋》杂志社：

贵刊2013年第9期刊出“如何落实八二宪法——专家学者众人谈”部分学者的发言节录，其中李步云（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发言说“关于违宪审查，中国法学会给中央提了十几个建议，其中三条是关键：一个是违宪审查，一个是要修改宪法第126条，一个是要讲宪政。这个报告送到了中央政法委，孟建柱批了，转发给人大研究。”

经查，我会没有以“中国法学会”名义“给中央提了十几个建议”，不存在“孟建柱批了，转发给人大研究”的事实。特要求贵刊在最近一期《炎黄春秋》杂志上以醒目方式予以更正。

中国法学会

2013年11月27日



中国法学会文件

★

关于要求更正不实信息的函

《炎黄春秋》杂志社：

贵刊 2013 年第 9 期刊出“如何落实八二宪法——专家学者众人谈”部分学者的发言节录，其中李步云（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发言说“关于违宪审查，中国法学会给中央提了十几个建议，其中三条是关键：一个是违宪审查，一个是要修改宪法第 126 条，一个是要讲宪政。这个报告送到了中央政法委，孟建柱批了，转发给人大研究。”

经查，我会没有以“中国法学会”名义“给中央提了十几个建议”，不存在“孟建柱批了，转发给人大研究”的事实。特要求贵刊在最近一期《炎黄春秋》杂志上以醒目方式予以更正。

中国法学会

2013 年 11 月 27 日

读者来信摘登

对邓拓辞世传说的澄清

我们是邓拓的子女，近见2013年11月的《炎黄春秋》第一篇文章，是邢小群、丁东采访高锴整理出的一篇《高锴：我在全国人大的见闻与杂感》。其中有四行字的内容有错误，我们在此指正，以免以讹传讹。

文章中写到“文革开始，邓拓是第一个自杀的著名人士。听说他是服水银死的。水银可以使尸体笔直，表示刚强不屈。还听说，他留下了一封遗书给彭真、刘仁：‘我牵连了你们，对不起你们了。’”

首先我父亲不是服水银去世的。第二，在他临终前写给彭真、刘仁的报告中也没有“我牵连了你们，对不起你们了”这样的话。

我家里人都知道，父亲因长期夜晚伏案工作，睡眠不好，入睡难，长期使用安眠药助睡。当年最先看到我父亲过世的人是我母亲和姑姑，之后机关工作人员到达，送往医院后为他做最后尸检的医务人员都明确地断定了，他是因为服用过量安眠药身亡的。这是历史的事实真相。

在“文革”拉开序幕的时候，这场殃及全国的劫难乌云压城，父亲面对报纸和广播中的诬陷与“口诛笔伐”，他没有申辩的权力，为保持一个共产党员的尊严、一个知识分子的清白，父亲临终留下两份文书。一份是写给当时北京市委领导彭真、刘仁同志的报告，在花城出版社出版的《邓拓全集》中，已全文刊登，其中没有这样的句子。同一夜晚写的另一份信只有一页，是写给我母亲丁一岚的。其中有这样的几句话：“你们永远不要想起我，永远忘掉我吧。我害得你们够苦了，今后你们永远解除了我所给予你们的创伤。永别了，亲爱的。”这几句话在许多书刊文章中被引用。

为了不使错误的传言给历史造成误导，我们特在此予以更正。

邓拓子女：邓小岚　邓小虹　邓壮

2013年11月29日

代购代邮

书　名	作者或主编	定价	邮费
庭院深深钓鱼台——我给江青当秘书	杨银禄	46.00	7.00
杨虎城与西安事变	杨　瀚	35.00	6.00
故国人民有所思——1949年后知识分子思想改造侧影	陈徒手	32.00	6.00
勃列日涅夫时代	[俄]列·姆列钦	56.00	9.00
蹉跎坡旧事	沈博爱	48.00	8.00
政商中国:虞洽卿与他的时代	冯筱才	38.00	7.00
叛逆者——塑造美国自由制度的小人物们	[美]撒迪厄斯·拉赛尔	39.00	7.00
张发奎口述自传	张发奎口述　夏莲瑛访谈及记录	56.00	9.00
南非的启示	秦　晖	78.00	9.00
思痛录	韦君宜	35.00	7.00
陈独秀全传	唐宝林	128.00	11.00
斯大林的战争	杰弗里·罗伯茨	69.00	10.00
国史札记(人物篇)	林蕴晖	40.00	7.00
国史札记(事件篇)	林蕴晖	40.00	7.00
国史札记(史论篇)	林蕴晖	38.00	7.00
昨天的中国	袁伟时	42.00	7.00
我的朝鲜战争 一个志愿军战俘的自述	张泽石	23.50	6.00
1949 我不在清华园	张泽石	23.00	6.00
回忆与研究(上下)	李维汉	75.00	12.00
蒋介石的1949:从下野到再起	刘维开	48.00	8.00
蒋介石与国共合战:1945–1949	蒋永敬　刘维开	48.00	8.00
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	戴　煌	49.00	8.00
难忘的非常岁月	陈瑞生	26.00	7.00
启蒙与中国社会转型	资中筠	29.00	7.00
雾霭　俄罗斯百年忧思录(内部发行)	[俄]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	280.00	12.00
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上、中、下)	陶菊隐	148.00	18.00
共同的底线	秦　晖	48.00	8.00
古拉格:一部历史	[美]安妮·阿普尔鲍姆	78.00	9.00
邓小平时代	傅高义	88.00	12.00
我眼中的改革	[德]汉斯·莫德罗	45.00	8.00
亲历苏联解体:二十年后的回忆与反思	李慎明主编	59.00	9.00
处在十字路口的选择——1956–1957年的中国	沈志华	58.00	9.00
逃向苍天:极端年代里小人物的命运沉浮	雷　颐	32.00	7.00
官僚主义的起源和元模式	孙越生	35.00	7.00
决战:毛泽东、蒋介石是如何看待三大战役的	金冲及	32.00	7.00
蒋介石:一个力行者的思想资源	陈铁健　黄道炫	48.00	8.00
蒋介石初上台湾岛(1949—1953)	李庆　根志优	58.00	9.00
倒转“红轮”:俄国知识分子的心路回溯	金　雁	68.00	10.00
苏东剧变之后:对119个问题的思考	陆南泉　左凤荣等	246.00	20.00
超越左右激进主义——走出中国转型的困境	萧功秦	48.00	8.00
金正日与朝鲜	高秋福	36.00	6.00
陈布雷与陈伯达——历史转折点上的两个“秀才”	张希贤	56.00	8.00
一个大国的崛起与崩溃	沈志华	148.00	18.00
长河孤旅:黄万里九十年人生沧桑	赵　诚	38.00	6.00
托洛茨基论中国革命	托洛茨基著　施用勤译	58.00	8.00
敬畏民意:中国的民主治理与政治改革	俞可平	45.00	7.00
直言——李锐六十年的忧与思	李锐著	29.50	7.00
苏北利亚	于　疆	22.00	6.00
《转折》《起点》:亲历中国改革开放	吴思　李晨主编	72.00	12.00
亲历记(一)(二)	吴思主编	58.00	11.00
天下得失　蒋介石的人生	汪朝光等	42.00	6.00
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	119.00	12.00
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	150.00	12.00
国家记忆(一)	章东磐	98.00	10.00
国家记忆(二)	章东磐　晏　欢　戈叔亚	88.00	9.00
可操作的民主	寇延丁　袁天鹏	28.00	7.00
西安事变新探:张学良与中共关系之谜	杨奎松	48.00	8.00
求索中国:文革前十年史	萧冬连、谢春涛等著	88.00	10.00
读史求实	杨奎松	38.00	7.00
历史的碎片:侧击辛亥	张　鸣	26.00	7.00
二十世纪中国史纲(共四卷)	金冲及	128.00	12.00
绝密档案背后的传奇(全七册)	北京电视台卫视节目《档案》栏目组编	216.00	26.00
母亲杨沫	老　鬼	45.00	6.00
血色黄昏	老　鬼	39.00	6.00
血与铁	老　鬼	39.00	6.00
烈火中的青春:69位兵团烈士寻访纪实	老　鬼	38.00	6.00
亲历民主　我在美国竞选议员	龚小夏	28.00	6.00
天安门:知识分子与中国革命	史景迁	19.60	6.00
李锐反左文选	李　锐	22.80	6.00
中国当代社会阶层分析	杨继绳	42.00	7.00
通往立宪之路	刘刚　李冬君	60.00	8.00
苏联真相——对101个重要问题的思考	陆南泉　黄宗良等	246.00	20.00
走向革命:细说晚清七十年	雷　颐	29.80	7.00
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	杨奎松	88.00	10.00
底层的叩问——肖复兴人生笔记	肖复兴	25.00	6.00
地狱门前——与李真刑前对话实录(内部发行)	乔云华	58.00	8.00
大国悲剧:苏联解体的前因后果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雷日科夫	49.00	8.00
苏共亡党十年祭	黄苇町	26.00	7.00
三野名将	吴东峰	28.00	7.00
四野名将	吴东峰	28.00	7.00
找寻真实的蒋介石:蒋介石日记解读 Ⅰ	杨天石	60.00	8.00
找寻真实的蒋介石:蒋介石日记解读 Ⅱ	杨天石	38.00	6.00
“中间地带”的革命	杨奎松	54.00	9.00
烙印——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的集体记忆	林贤治主编	38.00	7.00
1957年的夏季:从百家争鸣到两家争鸣	朱　正	26.00	7.00
走出个人崇拜	冯建辉	16.50	5.00
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	薄一波	88.00	11.00
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始末	沈宝祥	39.80	8.00
夹边沟记事	杨显惠	34.00	7.00

图书介绍

《故国人民有所思　1949年后知识分子思想改造侧影》:毛泽东曾于40年代在延安整风报告中,批判知识分子在阶级斗争和生产斗争两大知识门类上,是“比较地最无知识的”一语,以及后来他的“唯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名言和“书读得愈多愈蠢”却成为后来“知识分子改造”的理论指导。

1953—1954年,国内国际形势中某些因素激发了毛泽东终止新民主主义进程,开始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灵感,在意识形态领域高调提出向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斗争,从那时起,“资产阶级唯心论”成为教育界、学术界以至整个知识界最流行的一顶思想政治帽子,在上有不断革命论思维定式的倡导,下有各类积极分子高举“改造”大旗对知识分子尤其是高级知识分子的歧视和蔑视,打击和追击下,高校校园便无宁日。本书讲述在文化大革命前的历史背景下,11位有代表性的全国一流教授、学者、专家的生存处境。不管是“思想运动”、“思想斗争”、“思想批判”、总之是以知识分子为靶子,而后经过反右派斗争、社会主义教育“四清”运动,通往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

《昨天的中国》:本书分为上下两篇,上篇是近代中国的轨迹,回顾了晚清何以在立宪中走向灭亡,并分析了大国盛衰的五大枢机,在作者看来,一向被我们斥为晚清“假立宪”的清末宪政,若用一个“假”字全盘否定清政府的立宪,未免过于简单。事实上,清政府的确为立宪做了不少准备,相反,最后导致清王朝的速灭,也与这场宪政有关。下篇则是对辛亥革命及革命后的一些独特思考,作者眼里的袁世凯,是近代中国少有的干才,若不是宋教任被刺后,革命党人断然发起二次革命,中国极有可能走上宪政之路。袁伟时教授著述以思想深刻、见解独到著称,崇尚“说真话,说自己的话”、“历史在哪里扭曲,就要在哪里突破”。发人深省、给人启迪的观点可从另一个角度更加深切地了解昨天的中国,从而更清楚明天将要走的路。苦难的过去,理应换来宽舒的未来。引颈以望,还要多长时间?

《勃列日涅夫时代》:曾为苏联党政军最高领导人的勃列日涅夫,在去世多年后人们对他的了解依然很少。一些人认为,勃列日涅夫是一个毫不中用的领导人,他把国家引向衰亡;另一些人则相信,其他任何一个人处于他的地位,都只会给国家带来更大的不幸,而他并不暴虐,信奉一条原则:你活,也要让别人活;第三类人认为,他比后来那些葬送了一个伟大国家的继承者要好得多。在他去世之后数年,苏联开始崩溃。究竟是勃列日涅夫时代导致了这种崩溃,还是继承者们滥用了他们所得到的东西?

本书作者曾任俄罗斯政治周刊《新时代》和《消息报》的副总编辑,与苏联及俄罗斯时代许多高层政要有着近距离接触和深层次关系,他查阅解禁档案、官员日记,进行私人采访,书中披露了大量新鲜真实的史料,给读者带来前苏联由“升平”到衰败的真相。

地　址: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南街69号

邮　编:100045　收款人:北京炎黄春秋杂志发行部

(注:邮购三本书以上,可按总书价的10%付邮费)

炎黄春秋QQ在线:2368298257

个人出书 家族出书

——三千元五十本起编辑出版文集自传、家史家谱

定制出书

文集自传
家史画册
家谱族谱

采编创作

修改润色
录音整理
专题创作

写作培训

邮购教材
半年函授班
半月上课班

010-6892 0114 6252 5116

展馆：北京中关村海淀图书城25号“家谱传记楼”

单位：北京时代弄潮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邮编100080**

网址： 《个人出书网》www. grcsw. com

《家族文化网》www. jzwhw. net

人人出版

全国免长话费咨询
400-668-0650

愿人人都有作品传世

北京天禾佳诚国际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是国内一家从事图书合作出版的文化公司，公司成立以来与多家出版社建立了密切业务关系。

A类出版套餐优惠
（新华书店发行销售）

32开1000册23800元起
16开1000册27800元起

代理出版：

个人出书：诗歌、散文、小说、生平传记、学术著作等。
老人出书：回忆录、自传、诗词、散文、思想理论著作、书画图册等。
家庭出书：家庭照片画册、家史档案、家谱族谱、先辈遗文、家族音像等。
学生出书：优秀作文集、书画作品集、学生纪念集、孩子成长图册等。
学校出书：教学经验谈、教研论文集、名师纪念集、名校成就图册等。
博客出书：个人博客作品集、网络专题作品合集、社区网文合集等。
旧书翻印：旧书急用少量翻印、书刊资料整编重印等。
电子音像：音乐、戏曲、录像摄影、光盘复制、磁带复制等。

另有：合作出书 常规出书 宣传推广 合作教材 录入排版设计 著作/署名/挂名/编著

出书类型：

A类：国内出版社出版，国家标准书号，可在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备案查询。可在国内主渠道（新华书店等）发行销售。
B类：无书号出版，用于交流与赠送，不进入书刊发行渠道，数量一般在300册以内

基本价格：

1、大32开本：封面用250克铜版纸，赠送勒口，内文用70克蒙肯纸或胶板纸。200页印刷100本３千元，300页印刷100本４千元；排版、设计与增加彩页费用另行计算。
2、16开本：封面用250克铜版纸，赠送勒口，内文用70克蒙肯纸或胶板纸。200页印刷100本5千元，300页印刷100本6千元；排版、设计与增加彩页费用另行计算。
（注：A类型代理出版的书，1000册起印；所有书籍无论开本印量越大越便宜。）

服务流程：

作者来电说明书稿详情（如需要公司寄送参考样书）→公司报价→签约支付定金→电脑录入编排校对→报送出版社(如需正规出版)→出版社三审三较(如需正规出版)→邮寄样书→作者终审签字付款→回邮样书→印刷送书（附赠成书光盘）。

欢迎　“组稿代理”与“项目合作”

目前，中国中产阶层不断发展壮大，传统文化精神逐步回归，民间文化、家族文化的搜集、整理与出版渐成热点；本公司大力开拓民间文化、家族文化的网络数字传播与纸质书代理出版业务。尤其自（学校出版网）（老人出版网）（人人出版网）（出版发行网）开办以来，深受离退休老人与各地文联、作协、民间作者、学校老师和家长的欢迎，每年代理出版作品近百余部；为方便作者就近洽谈与交稿，我公司设立“地方组稿代理”与“编辑出版分站”，请有写作经验与组稿能力的单位或个人洽谈合作。

出版热线：010-57223540　58426176　58608409
传　　真：010—58608407　　投稿邮箱：5805191@163.com
登陆网址:（人人出版网）www.rrchuban.com（自费出版网）www.51isbn.com
（老人出版网）www.lrchuban.com（学校出版网）www.xxchuban.com
公司名称：北京天禾佳诚国际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邮编:102218
联系地址：北京市朝阳区立汤路188号北方明珠大厦三号楼1509室

A类出版作品展示

B类出版作品展示

实事求是　秉笔直书　以史为鉴　与时俱进

炎黄春秋

http://www.yhcqw.com

2014年

全年　120元
单本　10元

订阅方式

1.全国邮局网点均可订阅：
邮发代号：82-507

2.直接向本刊订阅和邮购：
通过邮局或银行汇款到
本刊发行部邮购。

汇款方式

1.邮局汇款：
收款人：炎黄春秋杂志发行部
收款地址：北京西城区月坛南街69号
邮政编码：100045
2.银行汇款：
开户名：北京炎黄春秋杂志发行部
账　号：01090324900120109064325
开户行：北京银行复兴支行

联系办法

发行部：010-68532048
编辑部：010-68534879
　　　　010-68539058
　　　　010-68523512
财务部：010-68525374
办公室：010-68522852
传　真：010-68522852
电子信箱：yhcqfxb01@126.com

炎黄春秋 YanHuang Chunqiu 2014年第1期

平型关战役与平型关出击战斗

李震自杀前后

“四个伟大”的由来

《200位老人回忆张闻天》读后

临桂县的“群众专政”

苏德同盟时期苏联的一些事

ISSN 1003-1170
01>
9 771003 117002
国内统一刊号：CN11-2817/K
国内邮发代号：82-507
定价：10.00 元